

武大校友通讯

2018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	行	编	陈东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张晶	陈东华
		金诚	胡庆方	徐毅
		涂上飙	涂险峰	潘迎春



目 录

卷首语

倾情逐梦新时代

——2018 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 3

特别报道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我校 19 个学科排名 A 类 9

QS 世界大学排名武大居第 257 名，较去年上升 25 位 11

我校 4 项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13

武汉大学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15

藏诸名山 传之其人

——“冯氏捐藏馆”开馆 18

八人当选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 22

校友总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25

凝聚校友力量 推动共赢发展 28

总额 3.23 亿元！校友再捐 1.8 亿元助力人才强校 32

同一天，“同城双星”校友企业家捐资助建的两栋大楼启用

再捐 1.3 亿元，注入武汉大学人才强校基金 35



武汉大学 2017 年十大新闻及新闻人物	40
武汉大学 2017 年度新闻人物：朱英国	
——为中国粮食安全奋斗一生	45

珞珈风采

校友活动演讲集锦

(按姓氏拼音排序)	校友总会 / 49
徐红星 窦贤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丽霞 / 55
毛明：以责任引领兵器科技创新	陈志茹 / 59
探索科学·理解人生	
——“校友鹄鹄大讲堂”演讲	付向东 / 64
杰出校友王小凡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李 佳 / 71
让“患者至上”成为一种精神感召	
——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	李阳和 / 75
追求精彩人生	
——“校友鹄鹄大讲堂”演讲	于 刚 / 80
艺术点燃想象 执着成就梦想	
——杰出校友阎志在 2018 年武汉大学新生开学	
典礼上的发言	阎 志 / 85
传奇企业家当选阿拉善第七任会长，一篇文章读懂	
艾路明	袁治军 / 89

珞珈记忆

躬耕七十载 毕生珞珈情

——追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谭崇台	成 蹊 / 103
永远的纪念 温馨的回忆	
——中文系“五老”二三事	傅治同 / 109



刘永济与程千帆的交谊	巩本栋 / 115
深切缅怀唐明邦老师	郭齐勇 / 119
蝶楼旧时光	珈 言 / 123
老去的时光	李福信 / 129
与苍生同梦	
——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 ...	李国龙 / 133
解不开的珞珈情结	
——记我的老师廖孟扬、覃家美教授	李亚相 / 139
曾经在武汉大学工作学习过的宜昌名流们	李云贵 / 144
樊锦诗与彭金章伉俪的故事	刘 畅 / 155
珞珈三女杰之凌叔华	刘怀俊 / 164
百岁漫画家方成仙逝，“漫坛四老”最后一位大师	
也走了	刘双平 / 180
有诗的青春	卢圣虎 / 188
缅怀老师的老师	
——纪念刘永济先生	莫砺锋 / 192
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聂作平 / 196
一场关于下雪的记忆	申思婕 / 212
改革初年的启蒙老师	田 源 / 215
说说被淡忘的民国武大工学院	涂上飙 / 221
我为什么上武大	汪晓清 / 232
七七忌日缅怀萧先生	吴根友 / 236
烽火 8 年，珞珈文脉在这条老街上绵延	杨 琳 / 243
白首丹铅，自具光华	
——记恩师宗福邦先生	于 亭 / 250
难忘那一夏的青春	张海利 / 259
我的导师陆耀东先生	张箭飞 / 263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周 玲 / 268
深切怀念刘绪贻先生	赵 林 / 274



珞珈文苑

江城子·珞珈秋	陈 卫 / 285
忆珞珈秋	陈应松 / 286
从乐山东望珞珈山	陈 勇 / 287
毕业 60 载回校参加同学聚会有感	陈仲培 / 289
你的样子，我的芳华	邓莎莎 / 290
珞珈石	方书华 / 292
秋天，坐在东山头	方长安 / 294
忆武大	傅 贺 / 296
桂花碎	龚航宇 / 297
樱花与少年	洪 烛 / 299
忆旧诗两首	孔令仁 / 300
珞珈山的早晨	李立屏 / 301
珞珈山的秋天	李桑梓 / 302
珞珈美学课	李少君 / 303
珞珈在此	
——1994 级 20 年聚会题记	李万刚 / 305
说好青春不散场	林红燕 / 307
临江仙·樱花时节重返母校	刘继成 / 309
七律·毕业季感怀	刘鲁颂 / 310
毕业聚会诗两首	刘 征 / 311
思念	卢 絮 / 312
从珞珈山到乐山	梅 朵 / 314
枫叶上的拥抱	牧 南 / 316
今年秋天的岁月感	邱华栋 / 317
致我们美好的时光	阮 怡 / 318
珞珈五吟	



——献给母校的歌	苏会玲 / 320
珞珈之秋	索 菲 / 322
文庙前一棵孤独的树	
——谨以此诗致敬武大的嘉州岁月	水 浅 / 323
武汉行	谭任杰 / 325
咏珞珈中秋	陶佳珞 / 327
归帆 归梦	陶嘉瑜 / 328
相聚珞珈	汪彩华 / 329
回珈路上，每人都有侧身让过的灵魂	
——纪念母校武汉大学西迁嘉州八十周年	王法艇 / 330
初秋	王家铭 / 332
西迁	汪剑钊 / 333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八十年	王新才 / 335
凌波门	谢春枝 / 336
樱花 你是我整个的青春	姚 勤 / 338
寻梦珞珈	叶国源 / 340
再别珞珈	殷青山 / 341
珞珈思	俞峻勇 / 343
听说	袁 恬 / 344
七律·又是一年春风绿	曾世竹 / 345
从珞珈山到乐山	张彩雯 / 346
武汉大学原经济系 6511 班部分同学在汉聚会	
诗草	张文元 尹莲英 / 348
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	
——献给母校武汉大学	张用满 / 349
再见珞珈	周金萍 / 352
穿越	
——献给亲爱的武大校友们	周中华 / 354
捧着一寸心来	孙 雪 / 356



第二故乡	孙志翔 / 359
但见樱花开	王晓莉 / 361
最好的时光	肖珊珊 / 365
武大风物	许 锋 / 369

校友活动大事记

——(2018. 01. 01—2018. 12. 31)	373
-------------------------------------	-----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374
征订征稿启事	375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登记的通知	376

卷首语





倾情逐梦新时代

——2018 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2018 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皇皇武大即将迈入她的第 125 载光辉岁月。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回望 2017，武大人同心筑梦、砥砺前行，在学校 124 年的历程中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我们专注内涵提升，将高水平人才作为助推学校发展的核心要素。

万里揽才，求贤若渴。我们远赴大洋彼岸，向海外才俊发出殷切的呼唤：回祖国去，加盟武大，在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在武汉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的征程中找到自己的舞台！

引凤筑巢，多措并举。我们大力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我们以行动承诺：只要是金子，就一定会在武大发光！

珞珈新绿，群英荟萃。我们新增两名院士，“杰青”“优青”全国排名第六，“长江学者”全国排名第五，“青千”全国并列第四。“珞珈人才方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巨星”“新星”“未来之星”！

我们始终坚信：学者为立校之本。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尊重学者、崇尚学术，是我们不变的理念和追求！

这一年，我们一如既往地关爱学子，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



我们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升级改造宿舍，让起居更有幸福感；优化就餐环境，精心打造整洁明亮的学生食堂；完善奖助体系，惠及每个有需要的学子。

我们重视学生的成才条件。优化课程设置、强化通识教育，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鼓励高水平人才走向课堂，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最优秀的人；科研反哺、鼓励创新，为学子开拓更广阔的成长之路。

我们挂念学生的身心健康。响应诉求、重视个体，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让学生在最美校园里健康快乐地成长成才。

也是第一次，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参加 2017 年毕业典礼。我们通过这份仪式感、庄重感和荣誉感，进一步彰显对学生应有的重视、对知识应有的尊重、对学术应有的敬仰。我们始终笃定：学生是大学最具生机活力的源泉。关爱学生、培桃育李，是我们永恒的天职和使命！

这一年，我们倍感振奋，也深感责任在肩，武汉大学被国家列为“双一流建设”A 类高校。

这是对未来的鼓舞，也是对过往的肯定。近年来，学校内外环境焕然一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社会美誉度蒸蒸日上。ESI 一流学科连年递增，前 1% 的学科增至 16 个，学子在国内外重要赛事中力拔头筹，一批泰斗才俊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重大成果，人文社科位居前列，自然科学锐意进取，生命医学势头强劲；南海争端响亮发声，水稻育种科技兴农，南极科考履冰卧雪，测天绘地享誉全球。

如今的武大，已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的实力！站在新年的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接近梦想。

这个梦想，是“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百年来，武汉大学将梦想融会于国家发展的时代进程，激荡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浪潮，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不懈地追求着“武大梦”。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整装待发、斗志昂扬。

梦想指引方向。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担当。展望



2018年，“四个服务”为我们明确方向，“内涵式发展”为我们指明路径，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和“人民满意的教育”！

梦想提振精神。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从来没有一马平川。展望2018，改革发展的脚步决不能停歇。我们将着力提升服务老师、服务学生的意识和水平，努力把“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人才制度、校院两级管理等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地推进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梦想汇聚力量。梦想很大，任重道远；梦想不难，有你有我！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要靠千千万万武大人携手前行。展望2018，勤勉苦读的学子，耕耘讲台的教师，醉心科研的学者，爱岗敬业的员工，心系母校的校友，关注武大的各界，都是同心筑梦的重要力量。我们将积极拓展“共兴武大”的平台，不断完善“共享武大”的机制，大力弘扬“共荣武大”的文化！

百廿武大，梦想不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站在2018年新起点上，让我们每一个武大人都向着梦想奔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最后，再次祝愿大家新年纳福，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7年12月31日）

特别报道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我校 19 个学科排名 A 类

12 月 28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我校 51 个参评学科中，19 个学科排名 A 类，26 个学科排名 B 类，6 个学科排名 C 类。A 类学科数居全国高校第七。

19 个 A 类学科中，A+ 学科 4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地球物理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A 学科 4 个：法学、生物学、软件工程、公共管理；A- 学科 11 个：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水利工程、工商管理。

据悉，学科评估由教育部学位中心自 2002 年首次开展，平均四年一轮，至今已完成四轮。第三轮学科评估完成于 2012 年。我校在第三轮评估中，排名前 1（含并列）的 4 个，前 5% 的 8 个，前 10% 的 18 个，前 20% 的 26 个。第四轮学科评估于 2016 年 4 月启动，在 95 个一级学科范围内开展（不含军事学门类等 16 个学科），共有 513 个单位的 7 449 个学科参评（比第三轮增长 76%），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有 94% 申请参评。

本轮评估首次采用“分档”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 70% 的学科分为 9 档公布：前 2%（或前 2 名）为 A+，2%~5% 为 A（不含 2%，下同），5%~10% 为 A-，10%~20% 为 B+，20%~30% 为 B，30%~40% 为 B-，40%~50% 为 C+，50%~60% 为 C，60%~70% 为 C-。我校第四轮学科排



名前 2% 的有 4 个，前 5% 的有 8 个，前 10% 的有 19 个；前 20% 的有 29 个。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本轮前 2% 与前 5% 学科数保持不变，前 10% 的比上轮评估增加 1 个，前 20% 的增加 3 个。表明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我校学科建设注重内涵式发展，稳步发展中取得新成绩。

本次评估的目的主要是贯彻落实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方针，展示学科发展成就，服务研究生教育“提高质量、优化结构、鼓励特色、内涵发展”的大局；通过对学科建设成效和质量的评价，了解学科优势与不足和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促进学科内涵建设，提高学科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教育质量的知情需求，为社会各界了解和分析学科水平与质量信息提供服务。我校将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总结学科建设经验，居安思危，持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2 月 29 日）



QS 世界大学排名武大居第 257 名， 较去年上升 25 位

6 月 7 日，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 15 届世界大学排名，武汉大学居全球第 257 名，中国内地高校第 8 名。相较于去年的全球第 282 名，排名上升 25 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比去年上升 1 位。这是我校连续第四年稳居 QS 世界大学 300 强。

今年的榜单共评估了来自世界 85 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1 000 余所高校。中国共有 65 所高校上榜，包括内地高校 40 所、香港高校 7 所、澳门高校 1 所、台湾高校 17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2019 年总分
1	清华大学	17	25	87.2
2	北京大学	30	38=	82.6
3	复旦大学	44	40	77.6
4	上海交通大学	59	62	70.4
5	浙江大学	68	87	67.5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8	97	60.8
7	南京大学	122	114=	55
8	武汉大学	257	282	37.5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285	325=	35.3
10	同济大学	291	316=	34.9

QS2019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前十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 QS)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它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一起，被公认为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QS2019 年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和权重如下：学术声誉(权重为 40%)、雇主声誉(权重为 10%)、师生比(权重为 20%)、文献引用数(权重为 20%)、国际教职工比例(权重为 5%)和国际生比例(权重为 5%)。

QS 集团中国总监张岷博士介绍，本次评估结果基于过去 5 年全球 151 个国家顶尖的数万学者和机构的专业评议，以及对全球最大论文数据库中过去 6 年数以千万计学术期刊论文等的数据分析。张岷表示，中国大学整体在科研论文的事业发展上成绩显著，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和欧美名校的差距不断缩小。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6 月 7 日)



我校 4 项成果获 2017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隆重举行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校共 4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主持完成的 2 项成果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参与完成的 2 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水利水电学院夏军院士主持完成的“流域径流形成与转化的非线性机理”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项目基于全球海量水文数据与响应关系的识别，发现了受控于土壤湿度、降雨强度和下垫



面组合的时变非线性产汇流规律以及土壤蒸发、叶面积指数、土壤湿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揭示了径流形成与转化的时变增益产汇流非线性机理，发展了径流计算新方法与分布式时变增益水文模型，经实际应用与检验，较线性系统理论预报精度平均提高了 45%，最大提高 63%，突破了地学水文学领域的重要科学难题。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张永军教授主持完成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摄影测量网格处理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首次提出数字摄影测量网格的创新思想，突破了高可靠性影像匹配、公众地理信息辅助的多星多轨联合处理、正射影像智能镶嵌及匀光匀色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建立了完整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智能摄影测量处理技术体系，研制出我国首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字摄影测量网格处理系统(DPGrid)。项目成果是我国测绘遥感领域首个实现核心技术出口的自主知识产权软件研发成果，打破了国际软件的垄断地位，并在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突发灾害应急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参与成果获奖方面，我校作为第三完成单位，由动力与机械学院李晓红(女)教授等参与完成的“工业智能超声检测理论与应用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校作为第六完成单位，由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李斐教授等参与完成的“国家海岛礁测绘重大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悉，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予 271 项成果和 9 名科学家。授予著名火炸药学家、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院士和生物医学领域杰出战略科学家侯云德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 35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3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2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70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含创新团队)21 项、二等奖 146 项；7 名外籍科技专家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1 月 8 日)



武汉大学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入轨

2018年6月2日12点13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武汉大学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由长征二号丁火箭搭载成功发射。12点27分03秒，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截至发稿前，卫星状态正常，进入在轨测试阶段。



珞珈一号搭载于长征二号丁火箭点火升空(摄影：李霄鹏)



珞珈一号成功发射(摄影：肖珊)

该卫星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这是“武汉大学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系列的第一颗卫星，主要用于试验验证低轨夜光遥感、导航信号增强等技术。

团队选择了目前国内处于空白的“夜光遥感”及国家急需的“低轨卫星导航增强”作为卫星功能设计的出发点。分辨率为 130 米，理想条件下可在 15 天内绘制完成全球夜光影像，提供我国及全球 GDP 指数、碳排放指数、城市住房空置率指数等专题产品，动态监测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同时，它搭载导航增强载荷，开展卫星导航信号增强和星基北斗完好性监测技术验证试验，为我国开展新一代导航信号增强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一星多用”的集成化空间信息系统建设理论提供试验依据。

研发团队依托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湖北数据与应用中心等组建，由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德仁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过等牵头完成。

上级有关领导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杨保华等现场指导发射。常务副校长冯友梅、院士李德仁、张祖勋、龚健雅现场指导工作。

该卫星是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工程的第一颗星。珞珈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工程于 2015 年启动，旨在通过研制发射多颗具备星基导航增强能力的对地观测低轨卫星，开展“一星多用、多星组网、多网融合、实时服务”的天基信息实时智能服务系统研究，推动我国定位、导航、授时、遥感、通信(PNTRC)天基信息实时智能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计划在未来 5 年内，再发射两颗卫星，为实现全天时、全天候、全地域快速实时的天基信息服务助力。

据悉，本次作为主星发射的是高分六号卫星。高分六号是国家高分辨率重大专项规划卫星，是一颗低轨光学遥感卫星，具有高分辨率、宽覆盖、高质量和高效成像等特点，能有力支撑农业资源监测、林业资源调查、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需求提供遥感数据支撑。长征二号丁火箭由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研制，此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丁火箭的第 40 次发射，也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76 次发射。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6 月 2 日)



藏诸名山 传之其人

——“冯氏捐藏馆”开馆

初冬的珞珈山层林尽染、叠翠流金。2018年12月3日，“冯氏捐藏馆”正式在我校开馆。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与其兄长冯天琪、冯天瑾将一大批冯氏珍藏文物及艺术品捐赠给武汉大学。90多件珍贵藏品现场对外展出。

“冯氏捐藏馆”设于我校图书馆，展览展品主要包括冯氏两代学人所收集的珍藏文物及艺术品，既有张大千先生的山水画作，也有欧阳中石先生的珍贵墨迹，还有冯氏父子与唐醉石等名士往来信札以及古钱币，均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冯氏代表冯天瑜及其兄长冯天瑾先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喻立平，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雷文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曾婕，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刘醒龙，湖北大学党委书记尚钢，湖北美术学院原院长周韶华，湖北省美术学院原院长、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立言，武汉大学学校领导韩进、窦贤康、周叶中、沈壮海，两院院士李德仁，知名校友熊召政、阎志、方方，以及学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冯氏亲友学生等各方嘉宾，以及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系）负责人、师生代表等出席开馆仪式。校党委副书记沈壮海主持仪式。

韩进指出，冯氏两代人捐赠的这批藏品弥足珍贵，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与脉络，蕴含着中国学人的胸怀与担当，具有宝贵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冯氏兄弟决定将其藏品捐赠给武汉大学，体现了大智慧、大气魄、大格局的大家风范。今年是武汉大学建校



125周年，这批藏品是送给武汉大学的一笔厚礼、一份情谊，将为珞珈文化的积累沉淀和丰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让珞珈文脉更加充盈阜盛。

1957级物理系校友冯天瑾代表冯氏家人致辞。他讲述了父亲冯永轩在动荡年代始终坚持保护和保存这些藏品，以及冯天瑜在疾病缠身之时仍坚持整理修订文稿的情况。冯天瑾感谢武大老师对自己的培养以及同学对自己的帮助，感谢武汉大学为冯氏捐赠的藏品提供了好的条件，也为冯氏两代的努力找到了弘扬国学的归属。

刘醒龙用毛笔将感言手书于宣纸上，并赠予学校。他指出：“学界常有冯家父子情怀家国的佳话流传，我与冯天瑜先生几次交往都是因为小事情，却见大格局。”刘醒龙讲述了冯天瑜在一次会议上为其画钢笔素描像的故事。并表示：“冯氏文化至宝缘聚珞珈山前，凭后来者近贤论艺，是望莘莘学子他日当莫炫技，常记高山仰止。”

周叶中与冯天瑜签署捐赠协议。冯天瑾、冯天瑜、喻立平、雷文洁、韩进、窦贤康等共同为“冯氏捐藏馆”揭牌。冯门弟子、武汉大学张薇教授向“冯氏捐藏馆”赠送纪念银杯。

“教育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成人’，就是培养人，培养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知识渊博的人。”冯天瑜说，文物价值不可



偏以金钱衡量，最重要的是文化学术的传承和美学价值的弘扬，这也是文物收藏、典藏和传播的价值所在。把藏品捐赠给武汉大学用于修己度人，是文物的最好归属。

冯天瑜与其父亲冯永轩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冯永轩 1923 年入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冯氏两代学人虽历经战火与动乱，仍不改弘扬中华文化之初心，潜心收藏了唐人写经、明清民国书画、信札等一批名士墨迹和古钱币。冯天瑜秉承先父之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与文人学者、美术家的交往过程中，学问往还，也积累了众多现当代名家巨匠的书画和信札，斐然可观。



为更好地传承学术文化，开拓与弘扬这批藏品的历史内涵、学术价值、美学价值，武汉大学在图书馆设立“冯氏捐藏馆”，选择冯氏藏品中书画、信札、古籍以及钱币中的精品作长期展出，以供社会贤达、广大师生和文物爱好者观览利用。学校将妥善保管这批珍贵藏品，并发挥好它们在文化史研究和艺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学校还将协助冯天瑜成立“文化史研究冯永轩基金会”，助力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9 年 1 月 8 日）



八人当选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

8月28日上午，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表彰大会在校史馆隆重举行。桂建芳、胡春宏、李小林、刘亚洲、倪晋仁、解振华、阎志、周旭洲（按姓氏拼音排序）八位校友光荣当选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



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窦贤康为杰出校友颁奖，副校长周叶中介绍了本届杰出校友评选的相关情况并宣读表彰文件。往届杰出校友代表陈东升、田源、艾路明、喻杉，同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学校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生代表200余人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评选工作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各地校友会、学校各院系、学校老师和校友们的大力支持。共收到各地校友会、学校各院系及个人推荐的 29 位校友的参评材料。经向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各院系、地方校友会征求意见，并经第八届杰出校友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公示，最终产生了八位杰出校友。

这八位杰出校友，有一部分常年活跃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为推动国际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李小林、刘亚洲、解振华校友；有一部分长年专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建功立业、引领未来，用科学技术推动民族复兴，比如桂建芳、胡春宏、倪晋仁校友；还有一部分长年在商海打拼，凭借过人的智慧与眼光，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阎志、周旭洲校友。

颁奖仪式上，通过风采短片与评委会给每位杰出校友量身打造的颁奖词，向现场师生、校友充分展示了八位校友的杰出成就。校友们的获奖感言饱含着对母校的深情厚谊，一字一句让人温暖又感动，满载着来自榜样的正能量。李小林、刘亚洲、解振华三位校友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亲临现场，还专门通过视频、书信的方式表达了珞珈学子对母校的深切祝福与敬意。

韩进在讲话中指出，八位杰出校友有个性、有激情，勤于思考，乐于奉献，有强烈的使命感，是武大校友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谋求人类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为己任，生动阐释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大精神。他希望全体武大人能坚守、传承和弘扬杰出校友身上的优秀品质。

据悉，学校自 1996 年开始遴选杰出校友，迄今开展八届，共遴选出 75 位杰出校友。

又讯(记者曾文晖)“如何进一步推动校友工作发展?”“如何增强校友归属感和凝聚力?”带着这些问题，28 日下午，武汉大学地方校友会代表座谈会在校举行。

校长窦贤康出席，副校长周叶中主持。北京、上海、大纽约地区、新西兰地区以及各校友企业家联合会在内的近 30 位校友会代



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构建武汉大学“校友-母校发展共同体”实施方案和武汉大学优秀地方校友会和优秀校友评选办法进行了充分探讨。

窦贤康对校友们多年来积极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发展表示感谢。他详细介绍了学校在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外部办学环境、关爱学生、校友工作、国际化办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校友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

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中西部分会校友代表艾路明、贵州校友会代表李在文、校友企业家联合会环渤海分会代表陈作涛、北京校友会代表喻杉、浙江校友会代表赵华锋、广州校友会代表朱征夫、深圳校友会代表刘少雄等纷纷发言，为学校校友工作发展建言献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8 月 29 日)



校友总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

(记者肖珊 通讯员谢婧、张振国、潘博)11月24日,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校长窦贤康,常务副校长谈广鸣,副校长李建成、周叶中,来自全球200多个地方校友会的校友代表,学校老领导、学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大会,周叶中主持。

校友总会秘书长、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处长邓小梅作校友总会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校友总会工作报告、《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章程(修订案)》、校友总会第七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候选人名单,以及《武汉大学优秀地方校友会和优秀校友工作者评选办法》。

会上,窦贤康当选校友总会会长,陈东升当选执行会长,副会长为(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小凡、王传中、毛振华、艾路明、田源、朱征夫、阮立平、李在文、李建成、陈明、周旭洲、骆郁廷、谈广鸣、阎志、曾文涛、童朝晖。除上述成员以外,常务理事还包括(按姓氏笔画排序):方国威、邓小梅、田陆、江黎明、孙强、杜平、吴光胜、吴志远、吴尚栩、何宏葆、沙奇斌、郑泉、赵华锋、段保顺、徐东兴、殷晓红、喻杉、詹爱平、蹇宏。邓小梅当选秘书长。

220个校友组织遍布全球20个国家;成为首家建立钉钉校友信息系统的高校,收录50多万条校友数据,近5万名校友登录注册;微爱珞珈捐赠总额近400万元;校友捐赠连续三年排名全国高校第三位,全国高校中向母校捐赠100万元以上的校友人数最多,



向母校捐赠 1 000 万元以上的校友人数排名全国第二；20 多位校友先后走进学生“创业论坛”课堂，成为学生的授业导师；由校友捐资设立的人才引进基金总额超过 5 亿元；各地校友会联谊活动、文体活动精彩纷呈，微爱珞珈校园健身公益环跑、校友集体婚礼、创业论坛等品牌活动亮点频出……2014—2018 年，学校校友工作整体格局和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学校与校友的联系合作更加频繁紧密，校友对校友组织和学校的情感更加浓烈，校友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加通畅，归属感更加强烈，校友工作取得卓越成效。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校友总会将继续坚持“服务校友优先”首要原则，以校友需求为导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发扬武大独树一帜的校友文化，凝聚校友，为学校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感谢母校对我的信任，感谢全球各地方校友会会长对我的信任！”执行会长陈东升表示，一定尽力履行职责，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让全球校友们更有家的感觉，一起把武汉大学建设得更加美好。

“武大校友对母校的热爱全国闻名。武大学子的根不管植于何处，总会有一支伸向珞珈山。”窦贤康为校友对母校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其中凝聚的拳拳情意表达由衷感谢，并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学校的近期工作：一是走注重内涵式发展之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各项人才指标入选数呈良好态势，出台并实施相关的高层次中青年学术中坚支持计划；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确立 2018 年为“学生为本年”，集中力量改善学生的居住、学习、饮食、运动和交通出行条件，并推出系列本科生教育教学改革举措，加大高层次人才给本科生上课的力度，让学校优势资源和办学成果更多地惠及学生；三是树立“更加崇尚学术、更加尊重学者、更加关爱学生、更加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严格落实“院系-学部-学校”三级评审制度，提高选人用人质量标准，着力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把武汉大学办成具有武大风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卓越大学。他表示，未来既要继续做好基础服务性工作，更要开拓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为校友们搭建更好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校友们不管走得有多远，武汉大学都是大家永远的精神家园。



据悉，我校至今已有近 50 万名校友，活跃在全球各个领域，是武汉大学崭新的世界级名片。为了进一步构建学校“大校友”工作格局，促进各地校友会健康发展，努力开创校友工作新局面，学校还将启动“优秀地方校友会”和“优秀校友工作者”评选。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11 月 26 日)



凝聚校友力量 推动共赢发展

校友是高校办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积极培育和开发校友资源，对助推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校友处以为“凝聚校友力量，做好三个服务”为根本宗旨，以“抓重点、打基础、促合作”为核心思路，积极构建“大校友”工作格局，推动校友与学校共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强化服务理念，完善校友组织体系

以服务为根本，校友满意度不断提升。我们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校友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事务性服务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联谊类服务解决情感问题，通过平台类服务解决共享问题，通过咨询类服务解决发展问题，致力于为校友们提供情感交流、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大大增进了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

以组织为纽带，校友凝聚力显著增强。截至目前，学校各类校友组织已经发展至 220 余个，遍及中国的所有省级行政区和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 21 个国家。各类校友组织不仅在地域上横向延伸，发展迅速，还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行业性、功能性、特色性校友组织，组织体系更加多维、立体。2018 年正式上线的校友信息系统，更是打造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掌上校友之



家”，让 50 万校友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校友与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无缝对接、即时互动、资源共享。

深挖校友资源，助推学校建设发展

过去五年，学校高度重视校友基金工作，创新机制，广开渠道，引校友之资，聚校友之智，全面服务于学校中心工作。广大校友关爱母校、回馈母校的热情空前高涨，校友对母校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强。学校累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前五，校友影响力排名全国高校第三，校友已成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在引资方面，我们积极争取校友捐赠，支持学校发展最亟须的领域。五年来，校友为学校陆续捐资助建了博物馆、体育馆、文科楼、研究生楼、科技楼等多栋大楼，积极为母校改善办学条件和基础设施；设立讲席教授基金，支持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围绕学校人才强校战略，设立人才引进基金，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募资超 5 亿元，为学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引导校友奖学助学，在奖励资助学子成长成才的同时，也树立校友榜样，教育学子立德立仁；设立微爱珞珈公益项目，汇聚校友的点滴爱心，为在校学子提供持续资助。

在引智方面，我们充分利用校友的智力、信息和人脉资源，为学校办学增添活力与动力。发动校友力量牵头设立海外人才工作站，服务学校海外高端人才招聘和引进；将优秀校友“请进来”，打造“校友系”通识公选课——“创业论坛”；邀请校友担任校外“创业导师”，为创业学院的“自强创业班”授课，传授创业理念和实践经验；每年举办一届“校友珞珈论坛”，在武大校园内传承企业家精神，营造企业家文化；开设“校友鲲鹏大讲堂”，引入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校友大家回校讲座授课，作为学校通识教育课堂的补充，为在校学生的全面发展增添助力。



打造品牌活动，传承校友公益文化

过去五年，我们加强活动创新和品牌建设，打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和魅力的品牌校友活动和公益活动，校友参与度广，反响热烈，广受社会各界赞誉。

每两年一届的杰出校友评选，为在校学子和广大校友树立了精神的楷模和行动的标杆；珞珈山水共同见证的校友集体婚礼，让校友与母校的联结更紧密更幸福更美妙，在校友心里永远镌刻下“珈”的味道；微爱珞珈校园公益环跑，将健康和公益的理念有机结合，让千万武大人的爱心汇聚成海，传递“微爱珞珈”的公益力量；“榜样珞珈”颁奖典礼，将奖助与德育相结合，以设奖校友和获奖学生为榜样，推进优良学风建设；校友专属的公益年历，集合了广大校友记忆里珍藏的武大风物和对母校最真诚的告白，每一页都诉说着游子情深……

活动催生品牌，品牌传播文化。在学校与校友们的交流、碰撞中，大学精神逐步积累、沉淀、传承和弘扬，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将武大人凝聚在一起，为校友与母校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搭建合作平台，构建“校友-母校”发展共同体

校友和母校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发展共同体”。母校是校友发展的坚强后盾。为在学校和校友间形成发展共识，共生共享资源，创造双赢价值，我们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推动学校和校友在资讯、知识、科研成果、人才资源等领域的资源共享和全面发展。

我们推动了学校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的迅速发展，联谊会在过去五年内团结了一大批优秀商界校友精英，陆续成立了泛珠三角分会、环渤海分会、长三角分会、中西部分会等，顺利完成了全国布局，成为校友间交流合作的主阵地，在这里，校友们凝心聚力，抱



团发展；我们挖掘学科、专业、行业、领域间的内在联系，支持校友成立了健康产业联盟，并连续举办了两届健康产业论坛，联盟聚焦“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充分发挥校友与学校的协同优势，整合各界资源，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我们促成学校、校友和武昌区政府共同发起成立了首期 1.5 亿的珞珈天使基金、“珞珈创谷”和“创业投资联盟”，推动学校技术创新型科技成果、创业项目与校友资本、资源、深度孵化服务的对接，校友与学校的合作前景无限；我们首创“城市+母校+校友”发展新模式，“校友经济”开始辐射至武汉乃至中部地区，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 2017 年的“资智回汉工程”中，武大校友企业累计投资武汉签约金额 3 254 亿元，成为拉动武汉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基于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校友-母校”发展共同体的理念、模式和架构逐渐清晰。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打造就业与人才支持委员会、科技与文化创新联盟、引才顾问委员会、筹资顾问委员会、珞珈投研俱乐部等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共同体的工作机制，在促进校友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如今，武汉大学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在即，我们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迎来将武汉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时期。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迎接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继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多渠道汇聚各方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新”作为开创校友基金工作的新局面！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12 月 3 日）



总额 3.23 亿元！校友再捐 1.8 亿元 助力人才强校

323 000 000！3 月 31 日下午，第三次人才引进基金集中捐赠签约仪式举行，共签约 1.8 亿元，用于支持学校“引凤筑巢”，引进高端人才。至此，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签约规模达到 3.23 亿元。

签约仪式上，陈东升、周旭洲、毛振华、江黎明、程理财、韦奇志、喻鹏，校友之友，以及校友企业中珈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签署了人才引进基金捐赠协议。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窦贤康、常务副校长冯友梅、副校长李建成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出席，副校长周叶中主持。



冯友梅代表学校与捐赠者签署了人才引进基金捐赠协议，韩进为捐赠人颁发捐赠证书。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在 2017 年 8 月的人



才引进基金启动仪式上，曾率先捐赠 2 000 万元，此次，他再次捐赠 8 000 万元，总计为人才引进基金捐赠 1 亿元。

“我们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红利，经过 40 年的人生奋斗所取得的成绩是这个时代的成果。”陈东升作为捐赠代表说，大学是千年的事业，我们校友企业家们将全力支持学校人才强校战略。

宇业集团董事局周旭洲既是人才引进基金的发起人，也是人才引进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加上此次捐赠的 2 000 万元，周旭洲共向人才引进基金捐赠 5 000 万元。

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继 2017 年捐资 1 000 万元支持人才引进基金之后，再向人才引进基金捐赠 3 000 万元。至此，毛振华个人向学校累计捐赠金额超过 1 亿元。

利泰集团董事局主席江黎明、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程理财、敦信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韦奇志、武汉伟鹏地产集团董事长喻鹏、中珈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向人才引进基金捐赠 1 000 万元。

捐赠仪式现场，学校聘任程理财和校友韦奇志、喻鹏为董事，窦贤康为新聘董事颁发聘任证书。

喻鹏作为新聘校董代表讲话。他表示，成为武汉大学的校董是一种荣誉，更是重大责任，今后将以各种方式为母校做贡献。

活动现场，人才引进基金理事会增补 9 位常务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韦奇志、江黎明、李亦非、余仲廉、郑炜、阎志、喻鹏、程理财、楚天舒。李建成为新聘常务理事代表颁发聘书。

“今天的捐赠签约仪式，是武大和校友合作的又一盛举。”窦贤康在讲话中表示，去年是人才强校年，学校人才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人才强校战略将作为学校的长期战略之一，在不断提升高层次人才规模的同时，更加侧重基础学科、主流学科和交叉学科，依托大平台、高端平台，加强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未来 5 年，武大将力争引进 20~30 名顶尖科学家和文科知名专家、300 名左右优秀中青年人才，并为他们量身打造科研教学需要的平台。

“武大有珞珈山、东湖水，有百年积淀，有求才爱才的情怀和文化，再加上人才引进基金的支持，一定能够形成对人才的强大磁



场。”窦贤康表示，对于人才不仅要“引进来”，还要有更全面的人才观，不断推动校内人才提升，同时要切实关心学生。

在随后召开的武汉大学 2018 年董事会上，冯友梅宣读董事聘任文件，窦贤康为陈东升、毛振华、艾路明、周旭洲、高作平、蹇宏、程作涛、余仲廉、江黎明续发董事聘书。

窦贤康向校董们作了学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十三五”以来，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高水平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高层次人才服务取得新突破，校友基金在人才引进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校友的捐资，必须用好、用到位、用在刀刃上。学校将统筹好校内外人才队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齐头并进，以学生为本，着力培养引领新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使武汉大学越办越好。

据了解，周旭洲等校友率先提出设立专门的“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支持母校引进高层次人才。2017 年 8 月 26 日，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正式成立，筹款目标 5 亿元。2017 年 11 月 5 日，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理事会在南京正式揭牌。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基金总签约金额已达 3.23 亿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4 月 1 日）



同一天，“同城双星”校友企业家捐资助建的两栋大楼启用 再捐 1.3 亿元，注入武汉大学人才强校基金

珞珈山会铭记这一天：2018 年 8 月 28 日。

这一天，卓尔体育馆和当代研究生楼正式启用。郁郁葱葱的珞珈山，校园经典建筑群喜添新成员。



这一天，两栋大楼的捐资助建者又捐 1.3 亿元，注入武汉大学人才强校基金，鼎力支持学校“双一流”建设和“人才强校”战略。

两栋大楼、两笔基金的助建捐赠者阎志和艾路明校友，是一对“同城双星”武汉企业家。他们俩情深意笃的情谊，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纪念日。

共同见证这一盛事的有：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吐拉洪，湖北省副省长陈安丽，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王兆民，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刘仲初，校友代表陈东升、



田源、艾路明、阎志、周旭洲、喻杉、陈华元、曾文涛、朱征夫、阮立平、江黎明、蹇宏、吴尚栩、沙奇斌等，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窦贤康，常务副校长谈广鸣，副校长李建成、周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玉贤，捐资方代表、承建方代表和师生代表等。

大楼大师，助力师生身心兼修

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会、射击、举重、拳击、电子竞技……武汉大学，有了自己的大型室内体育馆。

卓尔体育馆位于文理学部杨家湾教学区，总建筑面积 3.72 万平方米，是国内最大的校内体育馆之一。它按照国际领先标准规划建设，能同时容纳 8 000 多名观众，可承接室内单项运动的国际性大型赛事。据了解，2019 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羽毛球项目将在这里举办。



当代研究生大楼建筑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研究生院(含研究生工作部)、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研究院等单位将入驻，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阎志、艾路明分别捐赠 6 000 万元、7 000 万元作为人才引进基金，韩进为阎志、艾路明颁发捐赠证书。



“阎志和艾路明等校友，是武大校友的缩影和代表。他们曾饱含激情和梦想，在珞珈山水中浸润成长；他们敢于追求梦想，克难攻艰，开创事业发展的辉煌；他们心存感恩，不断回馈社会，反哺母校，体现出企业家的胸怀和担当。”窦贤康热情洋溢地指出，他以拥有这样的校友感到骄傲和自豪。

“阎志和艾路明校友的慷慨义举，不仅充分彰显了校友们诚挚澎湃的爱校热情，而且也包含了对师生身心兼修、全面发展的殷切期盼。”窦贤康表示，学校将用好校友们捐资助建的人才基金和大楼，引进更多高端人才，产出更多国际一流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

一天之内落成启用两栋楼，而且是由校友捐资助建的大楼，这在全国高校发展史上是罕有的。“这再一次表明，我们武大校友是最给力的、最爱校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早已融入了血液，校友回馈母校也已成为一种本能！”被亲切唤作“大师兄”的陈东升，道出了校友们的心声。

“只有培养了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尔肯江·吐拉洪肯定指出，武汉大学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也是湖北宝贵的资源，沉淀了浓郁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雄厚的科研实力，希望武汉大学坚持立德树人，继续为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陈安丽对武大校友群体支持母校发展、情系湖北建设的行为进



行充分肯定，并表示，人才是强国的根本，也是强省的根本。湖北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武汉大学建设“双一流”高校，在人才引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进一步鼓励高层次人才回鄂来鄂工作。

“武大校友一直关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大力支持学校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引进，这也正是高等研究院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高等研究院院长朱玉贤院士指出，大楼为高等研究院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和新契机。

向善而行，爱校的心从未远离

为什么捐建研究生楼？“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创业的七人，都是同一届研究生会成员；后来加入的年轻力量，也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艾路明笑着解释。

1978年，21岁的艾路明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8年，艾路明和6位研究生同学一起，凑了两千块钱下海创业，创立当代集团。经过30年的发展，当代集团已成为根植中国、布局全球的多元化产业集团，参控股若干家上市公司，业务集中分布于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境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资产逾800亿元。

离开校园30年，艾路明仍然十分怀念在武大读书的日子。“在这里，能够自由地读书，独立地思考，深入地论辩。现在回忆起来，诸如发起多学科讨论会、上各位老先生的课，都是美好的事情。”

当代集团从成立走到今天，整整30年。回忆30年创业征途，母校是伴随艾路明一路前行的持久精神力量。

“母校带给我们的自由开放的教育，留在我们身上自强弘毅的烙印，也被传承给了我们的企业和员工。”艾路明介绍，“坚毅、责任、开放、包容、分享、守信、诚实”这七个关键词，正是当代集团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坚守。

从当年赤贫下海到如今企业做强，当代集团得益于时代之善、



大学之善和自然之善。因此，艾路明也常怀感恩之心，始终向善而行。武大是这份善心的发源地，艾路明等校友也从未远离武大。

武大是根，永远的心灵皈依

1972 年出生的阎志，是企业家中的诗人，也是诗人中的企业家。

阎志创办的卓尔企业，是一家武汉本土民营企业，涉足商贸市场、B2B 交易与服务平台、文化旅游、港口物流、通用航空、纺织加工等领域，有三家上市公司。

从空中俯瞰卓尔体育馆，犹如一本读后仍不忍合上、随手向下摊开的书，颇有文人意蕴，与阎志创办的文化载体——卓尔书店遥相呼应，“质朴而浪漫”的武大精神也在其中充分彰显和传承。

“体育馆是我们卓尔人对武汉大学和武汉市的致敬，兑现了卓尔人对武汉大学的一个承诺。”阎志期望体育馆成为武大师生和武汉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塑造矫健的体魄，也锻造坚强的灵魂。

“要记住我们的根系所在。”时光回溯到 33 个月前，在卓尔体育馆开工奠基仪式上，阎志深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在体育馆启用仪式上，阎志同样深切地告诉学弟学妹，“武汉大学是所有武大学子的心灵皈依，是武汉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守望者。”

“以热爱与感恩的名义，我们还愿意为这所大学、这座城市许下更多的诺言，并竭尽所能一件件去实现它。”阎志表示。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那里有校友魂牵梦萦的学堂、青春的热血和友谊，是他们走向世界拥抱梦想的发源地。

八月末的珞珈山，军歌嘹亮，2018 级本科新生正在军训。8 月 28 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会和军训一起，写入他们的武大故事，刻入他们的珞珈记忆。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8 月 28 日）



武汉大学 2017 年十大新闻及新闻人物

12 月 27 日，学校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认真评审，评出了“武汉大学 2017 年十大新闻”和“武汉大学 2017 年度新闻人物”。分别是：武汉大学及十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徐红星窦贤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才强校年”成果丰硕；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花落武大；六院士同上一门课，多措并举培养一流人才；7 000 毕业生集体行拨穗礼，武大学子风采卓然；校友捐资亿元设立人才引进基金，投资 3 200 亿元助推武汉腾飞；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京汉两地“生死速递”肺移植彰显大爱获社会点赞；武大首倡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零时差”“全覆盖”掀起十九大精神学习热潮；《李达全集》广获好评，获批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度新闻人物：朱英国。具体内容如下：

一、武汉大学及十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9 月 21 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武汉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 A 类名单，10 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校党委书记韩进在出席十九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树立一流标准，培养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学校核心竞争力指标持续上扬，遥感技术学科



在中外两个世界一流学科排行榜上排名全球第一，入选首批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示范项目，ESI 排名整体进入世界 400 强，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19 个学科获评 A 类。

二、徐红星窦贤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人才强校年”成果丰硕

11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公布 2017 年新当选院士名单，武汉大学徐红星、窦贤康入选，校友王小凡入选外籍院士。学校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引进力度，举办国际交叉学科论坛，校长窦贤康率团赴美揽才，系列措施“引凤筑巢”，“国字号”人才方阵不断壮大。“人才强校年”成果丰硕，新入选 12 位长江学者，并列全国高校第五；23 人入选“青年千人”项目，5 人入选“杰青”，均创历史新高；10 人入选“优青”，4 人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1 人入选“万人计划”，新增 2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三、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花落武大

11 月 17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武汉大学获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中南医院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学校以 2015 年获评全国文明单位为重要契机，进一步加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力度，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位列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 2017 年度排行榜第三。

四、六院士同上一门课，多措并举培养一流人才

教师节之际，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深度报道武汉大学院士团队 20 年坚持面向本科新生开设专业基础课“测绘学概论”事迹。六院士团队当选为 8 月“荆楚楷模”月度人物和首届“荆楚好老师”荣誉称号，“六院士同上一门课”荣获第五届全国教



育改革创新特别奖。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本，不断深化本科教育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成果丰硕，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改革通识教育，开启“武大通识 3.0”；弘毅学堂开始实体化运行，多措并举培养世界一流人才。

五、7 000 毕业生集体行拨穗礼，武大学子风采卓然

6 月 22 日，武汉大学毕业典礼首次在“九一二”操场举行，导师团为 7 000 多名身着学位服的毕业生行拨穗礼。12 月 10 日，第一届“榜样珞珈”颁奖典礼举行，学校集中为获得各类奖学金的学生代表颁奖。充满仪式感、庄重感和荣誉感的典礼，彰显大学对学生的重视、对学术的敬仰。学校以学生为本，学子们风采卓然，一年来获“挑战杯”全国特等奖、“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等多项大奖。

六、校友捐资亿元设立人才引进基金， 投资 3 200 亿元助推武汉腾飞

8 月 26 日，学校举行人才引进基金捐赠仪式，校友捐资 1.05 亿元设立人才引进基金，支持学校引进更多优秀人才。同日，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大学专场举行，“武大商帮”企业家现场签下 1 500 多亿元投资大单。11 月 5 日，武汉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理事会在南京成立，校友再捐 2 100 万元。校友们以实际行动回馈母校，并为母校所在城市献礼，两轮“资智回汉”武大专场累计签约 3 253 亿元，助力武汉腾飞。

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京汉两地“生死速递” 肺移植彰显大爱获社会点赞

12 月 14 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主导的一场挽救生命的“生死



速递”肺移植在北京和武汉之间展开。在两地医护人员和铁路、交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紧密配合下，来自北京的一例爱心捐肺被顺利移植入患者体内。此举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众多媒体和网友纷纷点赞。此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教授沈吟在 8 000 米高空的机舱内沉着挽救患者生命的故事，也感动了百万网友。

八、武大首倡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由武汉大学倡议发起的首届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论坛在校举行，20 多所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以此为起点打造中法非三方高等教育共同体。学校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服务与保障，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武大贡献。与泰国合作走向深入，授予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雅帕名誉博士学位；“留学中国”教育展上，武大印尼留学生工作受到刘延东副总理的肯定和鼓励。

九、“零时差”“全覆盖”掀起十九大精神学习热潮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同时，武大教师通过多种方式，将十九大精神与思政理论课教学内容有机融合，“零时差”带进课堂。珞珈山“十九大时光”氛围浓厚，4 项重大成果亮相国家“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十九大代表、校党委书记韩进出席十九大并持续发声，副校长舒红兵列席会议；专家学者聚焦重大理论和实践新课题，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宣讲活动持续深入，将十九大精神融入教学科研和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实际行动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及省市媒体多次报道，产生良好反响。



十、《李达全集》广获好评，获批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4月14日，汪信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李达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20卷900多万字的《李达全集》出版后受到业界高度评价，入选人民出版社2017年十大优秀学术著作。我校深入开展科研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举办首届珞珈智库论坛；重大成果不断涌现，9个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6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励，9项成果获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薄膜生长领域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获8000万元资助，内分泌代谢中美合作成果在《自然》发表，2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论文在《自然·医学》同时在线发表。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7年12月29日)



武汉大学 2017 年度新闻人物:朱英国

——为中国粮食安全奋斗一生



2017 年 8 月 9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教授逝世，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深切哀悼。

朱英国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被人们尊敬又亲切地称为“水稻候鸟”“农田院士”。他在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为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深入报道了朱英国事迹，学校成立了朱英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深入开展向朱英国同志学习活动。教育部决定追授朱英国“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2 月 29 日)

珞珈风采





校友活动演讲集锦

(按姓氏拼音排序)

校友总会

艾路明校友在当代楼启动仪式上致词

我本科硕士都是学哲学的，现在还在给学校的宗教系代课。今天既然是竣工落成仪式，我就讲讲对“仪式”这个词的一点体会。其实不论古今中外的宗教都特别强调“仪式”的重要性。基督教做礼拜，佛教的剃度、受戒，包括儒家也讲究“礼乐”“祭祀”。那么除了宗教，在现代生活中，还需要仪式吗？我觉得非常需要，而且还要适当地创造仪式。因为仪式不仅能够使某一天、某件事变得与众不同，而且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界限创造出某种精神纽带。

我这两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公益和环保的事情上。最初参加阿拉善SEE，想法其实很简单。但是后来发现，做公益对于提升企业凝聚力非常有帮助。公司大了之后，其实高层和基层员工之间的沟通是不多的，员工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想什么。而我做公益，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也很认可，尤其是每年九九公益日，全公司上下都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不掺杂任何利益纠葛，就是纯粹地一起为了某个公益项目贡献力量，像一个公益仪式，这种纽带感和崇高感是非常强大的。

其实，读大学也是一场仪式。我现在再回忆武大读书的日子，像搞多学科讨论会、上陈修斋等老先生的课、组织联谊舞会等等吧，都是美好的事情，浮现的都是自由、民主、包容、开放这样的



字眼。大学是“象牙塔”，塔里的生活毕竟是有精神属性的。武大的日子对我而言，是一场修行，是一段美丽的仪式，是一场精神洗礼。今天，不论是在政界、学界还是商界，同学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关注，这中间肯定逃不开“武汉大学”这四个字，这四个字里有类似的一段修炼，受了同样的衣钵，也有同样的归属感。我们捐建当代楼，也是希望能够让今天的学生们更好地完成这段学业，薪火相传。

——武汉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陈东升校友在北京校友会第六届理事会换届暨各分会成立 (换届)大会及当代楼、卓尔体育馆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武汉大学是一所有吸引力、有凝聚力的大学，既质朴又浪漫。珞珈山是每一位武大学子心中的圣山，武汉大学是每一位珞珈学子心中的圣城，我们就是这座圣山的使者，我们就是这座圣城的信徒。

一天之内落成启用两栋楼，而且都是由校友捐资助建的大楼，这在全国高校发展史中可能都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再一次表明，我们武大校友是最给力的、最爱校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早已融入了血液，校友回馈母校也已成为一种本能！

一路走来，艾路明校友变换了多种身份，承担了多种使命，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都是武大人，可以说，他从未离开过武大……过去的10余年来，他始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着母校的建设发展，在反哺母校的同时，也以身体力行传承给了武大的后生学子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校友和母校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发展共同体”。校友强则母校兴，母校兴则校友荣。我们武大人都心怀同一个“武大梦”，那就是“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作为校友，我们为武大近年来的发展而振奋鼓舞，也真诚希望我们挚爱的母校能早日实现这一“武大梦”！为此，我们会力争做到母校有需要，校友有响应，为母校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武大校友深受“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武大精神的浸润和滋



养，不仅爱自己的母校，也爱武汉这座城市。卓尔体育馆不仅仅是武汉大学的体育馆，未来也将成为武汉市人民全民健身的重要场馆。从书店到体育馆，阎志始终心系城市文化建设，致力于提升武汉的城市人文气质。武大校友企业家常自诩为“珞珈儒商”，什么是“儒商”？这就是“儒商”！即使身处商界也始终不改书生本色，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担当。体育和大学精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体育运动是人类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身体，同时也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武汉大学第三届杰出校友，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桂建芳校友在回忆高考《做好自己当时该做的事》中说

我和武汉大学非常有缘分，爱人张奇亚是我在武大生物系的同学，我们的两个女儿也都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高考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它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因为它，我建立了执着向上、多为社会和国家做一点事情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之后这 40 年的学习、工作中，我始终保持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点事的初心。

40 年，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我想，学习好、工作好始终是做人处世的真理。只要你把学习、工作做好，这个社会是不会亏欠你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才能。对今天的青年学子，我特别想说：无论何时何地，做好自己当时该做的事，就会一好百好。总而言之，只有认真学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节拍；只要你勤奋，时代的机会就会变成你的机遇，毕竟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亚洲校友在给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表彰大会发的视频中说

自己作为武大的学生，不管现在，不管将来，自己永远会做为武大增光的事情，不会做任何给母校武大抹黑的事情。我爱武大，武大万岁。

武汉大学给了我一切。武汉大学深刻地改变了我。离开学校几



十年，我从未一天忘记过我是武大人。我一直在为此而自豪。我努力工作，辛勤耕耘，而这一切的动力，均来自武大，均来自武大这个伟大的名字赋予我双肩的责任。我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大情结。出差到武汉的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重返武大，在过去我留下足迹的那些教室、宿舍徜徉。这些年武汉大学名声显赫，创新颇多，已领跑中国诸大学，这是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雷军校友在第五届校友珞珈论坛上的演讲

今天，我们的手机做得好不好，我不想做广告，我也不想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苹果做得好，我也不想证明我们比友商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世界第四，我们做了 100 多种产品，有十几种中国第一，也有几种做到世界第一。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硬件的人，是怎么把硬件做到这个水平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武大会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今天想跟同学们分享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其实你有了学习能力，你做什么都能成功。武大教给大家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一种能力，这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武大对我最大的帮助。

有梦想太简单不过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武大同学都有梦想，难的是什么？是这梦想怎么落地。我们的梦想是要办一个伟大的企业，要做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武汉大学第三届杰出校友，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毛振华校友在第五届校友珞珈论坛上的演讲

到了 2007 年，公司成立 15 周年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再次转身去当老师。我在公司一直参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凭借在这方面的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有了合作的机会，此时好奇心促使我选择回归学术。这之前的 1995—1998 年我去了香港工作，通过股票、工资和股权激励我有了一些积累，拿着这些钱我有机会购买了我自己所创办公司的股权。这当然也是我放弃公司管理岗位的基础，正



是好奇心促使我不断地放弃和选择。

回首自己这40年的成长历程，我对母校武汉大学充满了感激之情。要感谢的人和事很多，特别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图书馆，我每天都要从樱花大道一步一步爬上去，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去朝拜神殿，当时就觉得每天都有仪式感。我不仅只学经济学课程，也读了大量文学、历史、哲学的著作，接触到许多伟大的思想，它永远地改变了我和我的后代。第二个是老师，我感谢我们的老师，他们教会我们知识，让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掌握了学习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永葆了一颗好奇心，并让我拥有实现好奇心的能力。我的梦想就是，我们的后代能够在平常中拥有一颗好奇的心。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重任，也作为对大家的建议献给在座的各位。

——武汉大学第七届杰出校友，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阎志校友在卓尔体育馆启动仪式上致词

记得两年多前，我带着孩子来参加卓尔体育馆的开工奠基仪式，我告诉他们，要记住我们的根系所在。今天，我还是要说，武汉大学是所有武大学子的心灵归依，是武汉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守望者。这里滋养了我们包容、开放的心胸，铸就了我们积极、执着的人生态度，让我们友善乐观地对待生活，让我们真诚拥抱并勇敢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卓尔体育馆的落成，是我们卓尔人对武汉大学、武汉这座城市的致敬，兑现了卓尔人对武汉大学的一个承诺。以热爱与感恩的名义，我们还愿意为这所大学、这座城市许下更多的诺言，并会竭尽所能一件件来实现它。我期待这座体育馆成为武大学子和武汉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塑造矫健的体魄，也锻造坚强的灵魂。我相信，同学们在最美校园、最美体育馆，和最美的老师、同学一道碰撞激情、挥洒汗水、激扬青春，一定会收获快乐、丰盈、精彩的人生！

——武汉大学第八杰出校友，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解振华校友在给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表彰大会的来信中说

我 1991 年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一直从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工作。能够参与这项关乎全人类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福祉的事业，非常感谢党和国家给我提供了从事这一崇高事业的机会和平台，我感到十分荣幸。从母校学习到的环境法专业知识，给我所从事和负责的国内政策法规制定、国际谈判等方面工作提供了很多启发和指导。我要由衷地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特别是感谢我的导师韩德培先生、肖隆安先生对我的教诲。

作为一名校友，我为母校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获得母校的奖励，更是对我的鞭策。我将再接再厉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母校和导师对我的知遇培养之恩，为推进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周旭洲校友在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表彰大会及人才引进基金理事会揭牌仪式上发言

在我心目中，武汉大学杰出校友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对于我来说，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学术成果不少，但这仍是其中至高无上的一项荣誉……我经常想起东升理事长的一句话“身体回老家，精神归母校”。我从此将更加以不断地对母校、对社会的回报来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激之情。

武汉大学历中国百年之兴衰，薪火相传，英杰辈出。武大是“珈”，校友有缘。武汉大学给了我一生的荣耀与梦想，我愿以东升、雷军为榜样，竭尽全力，别无旁骛，尽我余生回馈母校，给武汉大学创造哪怕一丝丝的光彩。

——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宇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美瑞健康国际董事局主席



徐红星 窦贤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丽霞

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新当选的61名院士名单，我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徐红星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校长窦贤康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

此外，中国科学院今年新增选外籍院士16人，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78级校友王小凡入选。



徐红星，1969年5月生，江苏灌云县人，201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瑞典查尔莫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获博士学位。2002—2004年任瑞典隆德大学固体物



理系助理教授。2005 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任物理研究所研究员；2006—2008 年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9—2014 年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纳米物理与器件实验室主任。2012 年 6 月任武汉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14 年任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副院长，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2016 年任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2006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 年和 2014 年分别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10 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2013 年获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同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 年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6 年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徐红星长期从事等离激元光子学、纳米光学、单分子光谱和纳米光芯片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和系统性的工作。他在实验上发现成对金属纳米颗粒在光场作用下能够在其纳米间隙中产生巨大的电磁场增强效应，是单分子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原因，也是其他基于纳米间隙效应研究的物理基础；他系统研究了单分子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产生条件，解析了其机理；他推动多个相关重要研究方向的发展：提出了等离激元光学力和单分子捕获、表面增强拉曼与表面增强荧光统一的理论，发现表面增强光谱的纳米天线效应，研发了高真空针尖增强拉曼光谱系统，实现等离激元催化反应。他系统研究了等离激元在纳米波导中的传播，发现等离激元在光的驱动下呈现出克服光衍射极限的传播模式，不同模式的干涉在纳米线上形成可调控的光学拍，这一发现是实现纳米尺度上光传播及其调控的物理基础；发现纳米波导等离激元的激发、传播、发射、与激子相互作用的物理机理和调控机制；在纳米波导网络中实现光子路由器、完备的光逻辑、半加器和光逻辑的级联。这些工作使光学器件小型化和高密度集成成为可能，是研究等离激元纳米光芯片的重要基础。

徐红星在国际著名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180 余篇，被 SCI 杂志引用 12 000 余次，单篇引用超过 100 次的 33 篇，h 因子 54。其中关于单分子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研究有两篇论文分别被引用 1 660 余



次(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9, 83, 4357)和1 190 余次(Physical Review E 2000, 62, 4318, 被选为该杂志创刊以来的里程碑论文)。他已作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60 余次;作为会议主席组织了十余次著名国际学术会议;任 *Nanoscale* 副主编,曾任 *Optics Express* 副主编;2014—2016 年连续入选 Elsevier 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受邀出版专著 *Nanophotonics: Manipulating Light with Plasmons*。

窦贤康,1966 年 1 月生,安徽泗县人,198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1983—1988 年在中国科大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学习,1987 年获学士学位,1988 年获硕士学位;1989—1993 年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学习,获硕士、博士学位;1993—1995 年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 年起在中国科大任教,2000 年晋升教授,历任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副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校长助理兼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执行院长;2005—2015 年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党委常委;2015—2016 年任中国科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2016 年 12 月任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常委,2017 年 4 月任武汉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04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0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作为团队负责人于 2011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资助,2015 年获得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2016 年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窦贤康长期从事中高层大气理论、观测与实验综合研究,多年来他坚持针对学科前沿问题,独立自主研制了系列激光雷达观测系统,车载测风激光雷达系统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基于上转化技术的量子激光雷达,开创了一种激光雷达探测新体制;基于在观测设备上的开拓性工作,在中层顶区域大气动力学和光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系统性和创新性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7 项,发表国际 SCI 论文 110 余篇。相关成果获得 2014 年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7 年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均排名第一)。其主要学术成绩与贡献:一是推动激光雷达探测技术的发展,在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基于上



转化技术的量子激光雷达，为中高层大气研究奠定坚实的观测基础；二是利用自主研发设备设计观测试验，揭示了中性大气与电离成分作用机制；三是在中高层大气对低层大气响应研究中，提出了若干大气波动影响中高层大气变化性的新机理，为中高层大气建模和精确预报奠定了基础。

窦贤康团队 2012—2017 年在本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中高层大气”领域发表论文 48 篇，数量仅次于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NCAR)，在国际同类研究机构和大学中排名第二。他悉心指导培养学生，2009 年获得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积极推动空间物理学科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中高层大气研究团队，并作为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带领该实验室在 2014 年五年一度的评比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优秀率为 20%)。窦贤康在中高层大气理论、观测与实验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国内是开拓性的，特别是将仪器研发、观测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在中高层大气动力学和光化学研究中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新性贡献。

目前，我校两院院士总数为 18 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位：查全性、卓仁禧、李德仁、邓子新、张俐娜、龚健雅、舒红兵、朱玉贤、夏军、徐红星、窦贤康；中国工程院院士 7 位：李德仁、宁津生、刘经南、张祖勋、茆智、李晓红、李建成。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1 月 28 日)



毛明：以责任引领兵器科技创新

陈志茹

毛明 1962 年出生于湖北咸宁，1979 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工程机械专业，命运由此改变。

“大学 4 年是我最为愉快的时光，就是玩命学习，玩命锻炼。”毛明高兴地回忆，当时被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感染，抓紧一切时间发奋读书，也抓紧时间锻炼身体，每天早起跑步，每周绕着武汉东湖跑一圈。

毕业前夕，他报考了素有战车研制“国家队”之美誉的 201 所（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军用车辆工程专业研究生，准备投身国防科技事业。他以为，201 所是部队的学校，可以实现军人梦。

1983 年，他从 330 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全所 6 名被录取的研究生之一。然而到了报到的那一天，看着满地黄土、荒凉不已的研究所，他才有种“上当”的感觉。

虽有遗憾，但随着学习的深入，他的心情也在悄然中改变：“兵工人”在战争年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敢于牺牲的代名词，如果只想当军人，那谁来做武器供给？谁来做技术支持？

1986 年 3 月，毛明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相麟教授。寒窗苦读 20 年后，27 岁的毛明以出色的成绩获军用车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献身国防事业

当时，出国潮、下海潮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手里攥着北京



理工大学军用车辆工程博士学位证书，毛明也在“欲望的海潮”中几番挣扎与彷徨。他看到，眼下中关村的新产品开发热闹非凡，他也尝试着下海，去了中关村的京海公司，帮助搞产品开发。凭着聪明博学，他作为系统开发的主要负责人，很快就开发出两个实用新型专利：汽车示载器、汽车换挡提示器，这是他事业彷徨时期的第一份收获。

这时，张相麟的一封亲笔长信转到他手中，深情呼唤毛明回到201所效力，将学有所长献身国防事业。

导师的话语重心长，让他热泪盈眶。这封信，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那个从军梦。毛明说，我特别崇敬我的导师，他在西南联大时就是教授，后经陈赓大将做工作到哈军工做教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遭遇了不公待遇，却从不抱怨，始终兢兢业业耕耘在军工科研战线，70多岁入党，临终时将一辈子积蓄的3万多元捐给了家乡的希望小学……

带着对导师的无限崇敬，毛明不再为外界的虚华浮躁所惑，决定重返201所，为兵工事业奉献才智和青春。

1989年9月，重返201所的毛明被分配在传行操研究室操纵组。这次回来，毛明就在北京西南的槐树岭扎下了根，一晃就是近30个春秋。在此期间，他先后带领团队为重弹车研制出了全新的550通用底盘，打造出领先世界水平的二代战车，而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对99式主战坦克的改造。

毛明说，搞科研事业，首要的是喜欢。不喜欢，调动不起激情，激发不了好奇心和突破的欲望，科研事业也就不可能有创新。从踏入北方车辆研究所的那一刻起，毛明就意识到，此生都将与装甲战车紧紧联系在一起。

认真钻研获认可

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毛明先后被提拔为汽车分所副所长、9室（特种车辆研究室）主任。刚到9室，一个喜讯传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会发来邀请函，他撰写



的关于行星变速箱动力学分析的论文被大会录取，邀请他到大会宣读。

这次国际交流会让他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学到了很多先进经验和前沿性的东西。1993年，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降临了。

新一代水陆两栖步兵战车的论证任务落到了9室。为此，在项目的论证和确定方案的两年中，毛明可谓卧薪尝胆。立项论证提出后，这个项目由谁出任总师很有争议。由于201所以前没有设计过履带式步兵战车的总体，主管机关并不倾向于把总体单位放到201所，这让毛明心急如焚。

方案论证会上，毛明一口气汇报了8个方案，包括了动力舱前置、后置，发动机纵置、横置，炮塔怎么放、人员通道如何安排等，并非常系统地说明了各种方案的优缺点，提供了各种方案的总布置图。他详细而精彩的汇报，博得了在场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一致称赞，他推荐的总体方案被确定为主方案，并决定让他牵头搞论证和总体设计。

从此，毛明的认真与专注在业内出了名。该项目先后获得了国防科技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高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

铸造“陆战之王”

搞战车设计的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设计一款享有“陆战之王”美誉的主战坦克。2004年新一代水陆两栖步兵战车刚定型，毛明就被上级任命为99A坦克的总设计师，该坦克是“高新工程”二期项目，是我国第一代信息化坦克。

为了99A的研制，毛明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每天工作多达12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一次，综合传动装置遇到了技术瓶颈问题，要马上攻关，可已近深夜子时，刚从办公室加完班出来的毛明没有回家休息，而是径直来到了试验室。完成第一轮试验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这一晚，毛明和项目组在一起直至做完了试验数据才回家。



最不容易的，还是深入极寒和极热区做试验。那是发生在 99A 坦克初样车试验期间的事。

在寒区试车时，发动机频繁地出现过热、排气温度过高、传动装置过冷等情况，而转战热区后的试验中，又出现综合传动装置过





热等问题。他不断地分析试验，常年深入我国最北方的严寒地区、南方的湿热高温地区，以及高原和沙漠地区，亲临试验现场指导工作，解决试验中出现的问题。在一次次外场试验工作中，在每天的辛劳里，他从未言过累、叫过苦。

历经7年的研制，毛明用预先研究积淀的先进技术、先进的仿真分析和台架试验条件，把“梦”变成了现实。在他的坚持与努力下，99A坦克的多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显著提高了我军装甲部队的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在我国坦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成就的背后，是毛明和他的“反候鸟”团队常年跋山涉水、深入高原和沙漠地区，战严寒、斗酷暑拼来的！

毛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概括为“时间很长，人生很短”。对于年轻人的培养，毛明特别重视，常常告诫道：要有崇高的理想，为社会、国家和他人多做贡献。

在30年的事业征途中，毛明以央企人的使命与担当，以对装备科技的热爱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将自己最宝贵年华的智慧、热血和青春奉献给装备科技事业，在激情进取中走出了一条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的科技创新之路。

（图片来源：国资委党委宣传部，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7年9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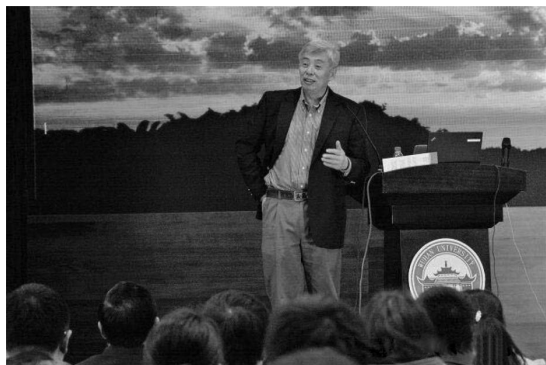
探索科学·理解人生

——“校友鵬鵬大讲堂”演讲

付向东

校友名片

付向东，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赴美国留学，1987年获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四年，1992年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助理教授，2002年任正教授至今。长期致力于探索生物学的基础原理和转化，在核酸可变剪接和RNA结合蛋白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学术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在生物领域的顶级期刊发表近200篇论文，获得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颁发的癌症创新技术及分子分析奖和Searle学者、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等美国生物学界一系列重要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





如何面对挫折，从科研的过程中得到乐趣，让每一天都感到充实？

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叫成功，如何取得成功？

在工作中如何与人打交道，为什么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科研中真的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吗？

.....

走在科研路上的年轻人，是不是经常遇到上述困惑？2018年4月23日，樱顶老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付向东校友作报告，讲述他如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理解人生——

从稻田到学堂

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炎炎烈日下，大家都在汗流浹背地低头割稻，突然田边传来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接着他大喊：“这里有一份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请速来认领！”在他这一声大喊中，我的命运终于不用再囿于这片方寸之间的稻田，光芒万丈的无限可能就此展开。

原本我极有可能在艰苦琐碎的农活中消耗一生的。我从初中起就开始下乡干活，暑假闲暇时出力所挣的工分能抵得上全家人口粮的一半，从插秧割稻到犁地除草，我几乎是所有类型农活的熟手。高中时，我回到课堂接受全日制教育，那时候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了命地汲取知识，我从初等数学“进化”到高等数学只用了短短一年。

但之后一件时代大事彻底地扭转了我的命运——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被万千学子感念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我们在农村那个闭塞的环境中通过唯一的媒介《人民日报》，得到了已经恢复高考的消息，接着就发了疯似的学习，力争在一个月之内补上所有中学知识的空白。大家都分秒必争地往自己的脑子里灌输知识，因为在那个时候，知识真的会决定命运。



当然，知识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接到通知书那刻的激动心情是无法言表的，现在想起来还是能回忆起那种欣喜若狂的心境。大家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从村庄稻田到武大殿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难以置信的跨越和难以企及的美梦。当时说到大学中的教授就好像是谈到高高在上的神明，大学中的“系”“院”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而现在一张通向殿堂仙境的门票就摆在我面前，从此我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鸟，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在武大的那几年是最为明媚灿烂、值得怀念一生的时光。武大的校园环境在国内首屈一指，春樱秋枫，美不胜收。当时樱顶老图书馆还作阅读自习之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抢座位，在这里消磨着无数个青春飞扬的日日夜夜。夏夜室内闷热，没有空调送凉，大家都卷个铺盖到宿舍外、到楼顶上给自己打个地铺，看着满天繁星，听着草动虫鸣，便能稍稍缓解夏日的燥热。这些往事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以强大的内心抵御风雨

我也参加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的考试，但是在这张1982年首届CUSBEA赴美研究生合影中却找不到我的身影。当时只要笔试成绩达到160分即有资格赴美深造，和我一块应考的同班同学无一例外顺利通过了考试，只有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当时拿到成绩的我痛苦万分，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没有赶上分配工作的机会，又不能继续留在国内读研，赴美留学的希望更是渺茫，那段时间只感到万念俱灰，不知人生该何去何从。那时的我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把我视为平时看似成绩优秀但经不起真刀真枪考验的人。

因为当时明令禁止查验分数，所以即使心存疑虑我也无从申诉。正当我对人生前途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高尚荫院士也发现了蹊跷——总共两门的考试，第一门拿到了135分，但是另一门只有十几分。高院士立即决定用亲笔信助我拿到复核试卷的资格。于是



我怀揣借来的几十元钱，瞒着家里人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借住在北京同学的家中。北大方面一见到高先生的亲笔信，二话不说就启封试卷复核。

等待复核结果的半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为漫长的半个小时，焦灼、忐忑、惶恐不安，自己的整个未来都系于这最终结果上。我当时在脑中反复重演了最坏的结果：一群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走出来告诉我试卷的分数并无差错，还拿出一堆冷冰冰的客套话想尽快打发我；或者是充满悲悯地安慰我，鼓励我说未来总是有希望的。这些都是绝望到令人崩溃的结局。

突然，我发现远远地走过来整整齐齐的一排人，颇有仪仗队的派头。领头的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张龙翔教授，他一见我就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表达歉意。原来他们打开试卷一看，上面有两个数字，一个是125，也就是我的考试成绩，另一个是19，那是我的考号。当时誊写的工作人员由于失误错把考号当作成绩进行统计，所以导致我分数极低。

那一瞬间，阳光骤然灿烂起来，心中一块沉重的石头砰然落地。

如果没有老师同学温暖的帮助，可能我的学术生涯就会永远地停留在1982年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敢于面对挫折考验的坚硬内心，一个充满韧性与活力的心灵，这样才能安然渡过命运的捉弄。

幸甚至哉大师引路

我的人生幸得大师指点。高尚荫院士，著名病毒学专家，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在20世纪30年代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培养了中国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的病毒学家，无愧于大师称号。高教授是我大学时期的导师，他的亲笔信挽救了我的学术前途。

吴瑞教授，生物化学家，DNA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学者之一，其父吴宪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吴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正是这个项目给了我出国深造的机会，也造就了今天



的我。

那大师是什么呢？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学殿堂之所以熠熠生辉，是因为大师坐镇，增添华彩。记得上大学时，经常有各种教授开设的讨论会以及讲座，从人生哲理到研究诀窍，无所不包。大师的两三慧语对青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困惑迷惘时给你指引，挫败颓唐时给你鼓励，以深厚的学养给你茅塞顿开的点拨，以开阔的视野激发你创造的灵感。

大师是一个概念，并不一定指具体的某个人。人们对大师的认同就在于其高山仰止的品格，这种标准投射出来的具体的人不尽相同，所以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师也是不一样的。大师也分不同类型，有的人著作等身风光无限，有的人著作不多但篇篇见地深刻。

细微之处见大师。真正的大师不一定外表惊艳出众，有些甚至给人一种泯然众人的感觉，但是细节见真功。大师对于细节的把握和揣摩非常人可及，在实验中，他们能从最微妙的数据差别中发现重大突破口；日常生活中，大师的涵养更是从点点滴滴中表露出来，令你惊叹敬服。

真正的大师通常是隐形的，让你觉得他似乎很亲近平易，没有“大师”这个头衔应该有的高高在上。他能从内心激发你自己的潜能，让你觉得这些想法就像与生俱来那样自然，丝毫没有强加灌输的感觉。他的教导是春风化雨式的，润物无声，如拨云雾而见月明。

七个科研关键词

第一，思考。原本以为生物学学习研究最重要的是背会记牢一些理论知识，当我来到哈佛大学，才恍然明白科研的关键是思考，是极其广泛又高远的思考。把这些思考转化为实验的动因，才是科学生命力的源泉。当时许多人疑惑我寻找合作院校时并不十分注重其排名先后。我给出的理由是，既然我做的东西都是前无古人的，无先例可循，那排名先后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提问。科研的真谛在于孜孜追索，当一个问题被触发



时，你就要尝试提出下一个问题，下下个问题。层层抽剥，才会让整个研究走向更加明晰合理，你才会有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和动力，而下一个问题就可能报你以惊喜的宝藏。科学没有止境，永远只有下一个问题。

第三，勇气。有的人做科研只是局限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之内，只愿深挖而不想涉足外面的圈子。当然这也是一种搞研究的方式，只是你可能永远都跳不出自己的一小方天地。还有一种人做科研只看需要和兴趣，不懂就问，从不畏惧踏上完全未知的领域。不要被“能”与“不能”束缚限制，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只要敢想肯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不去探索，你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第四，踏实。其实科研的过程也是充实满足的，朝有思，暮犹想，早上脑海中有一个今天的预想计划或是提纲，把它们一一付诸实验并希冀得到结果，晚上的时候再回想一天的经历，盘点收获总结教训，这何尝不是对生命的一种充盈呢？只要过好了今天，明天就胜利在望，整个人生也就不会辜负了。更何况生物学与数学不同，数学的追索更如峰上的明珠，多少人穷其一生苦苦钻研也难亲其光泽；但是生物学是一片莽原，许多地方无人踏足，所以只要认准方向敢走敢干，就能踏出自己独特的路来。生命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静候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发掘。

第五，机缘。做科研的最大乐趣就是会遇到各种机缘巧合，在黑暗中摸索了好长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突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这就是命运对科学家最大的褒奖。为了提高这种幸运的概率，我们能做的就是基于兴趣广泛地阅读。这种阅读绝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泛泛而读，而是抱着深究钻研的态度去研读。论文是浩瀚无穷的，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尽，所以要带着问题去有目的地查找阅读，而不是晃荡着空脑子去碰运气。

我们要善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比如和别人交流谈话时，有许多地方能触动自己的思考，激发一系列问题。脑海中一个小小的问号就有可能是一项重大科研成果的缘起。当你经过一系列的实验最终证明一个结论时，就像是走过盘桓山路最终看到登高盛景，那份喜悦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自己的。



第六，坚韧。我现在讲述起自己的科研经历语调平淡，似乎没有遇到大的挫折起伏。但是大家只看到我现在已经发表出来的科研成果，至于背后的辛酸苦楚则鲜有人知。真正内心强大的人不仅不会被困难打倒，对于挺过来的困难都会表现得风轻云淡。

对自己现在的科研心存疑虑是正常现象，谁也不敢断言自己的项目一定会成功，或者自己将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你需要做的是直面自己的担忧，千万不要让疑虑击碎自己的自信心。深入思考到底是自己真的对这个科研项目不感兴趣，还是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缺乏一个准确的认知？如果真的不感兴趣，及时转舵也是明智之举。放弃不等于失败，放弃意味着新的开始。

第七，超脱。其实道理很简单——做好眼前事，其余交给时间。也许你会把事情尽可能地考虑长远，但那又是何苦呢？做学生时只需要踏踏实实做好功课，搞研究时就勤勤恳恳做好实验，积极寻找兴趣点，永远充满好奇，永远保持活力，其余的不需多虑。

真正的科学是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对是否能立即见效根本不屑一顾，或许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这项成果才会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追求的是纯粹的科学，既然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有价值有意义值得去做，那又何必让一时的利益价值来绑架科学研究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只看一时的经济价值是急功近利的做法。

科学家既不能不胸怀大志，也不能太好高骛远。找准自己真正想要的，踏踏实实去做，只求问心无愧。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荣誉奖项加身，你也已经成功了。

四十年，蓦然回首，细细回想自己的命运与经历，再把得到的感悟揉进自己的话语里，传递给你们，也希望你们能有所感悟。

最高学位是哲学博士而不是科学博士，正是因为天下大道殊途同归，即便是科研知识的积累、实验项目的推进，最终带给我们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炽热不易的信仰和朝气蓬勃的希望，教会我们怎么做好科研，怎么过好整个人生。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4 月 25 日）



杰出校友王小凡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李 佳

编者按：2017年11月28日，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78级校友王小凡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江日报》以《武汉大学校友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为题对其进行报道，特转载全文并增加若干照片。

校友名片

王小凡，1955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 Donald and Elizabeth Cooke 终身讲席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同年考入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并在当年举办的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赴美留学；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被聘为杜克大学药理学和肿瘤生物学系助理教授，成为最早在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之一；1998年成为终身教授，2003年晋升为正教授。他是国际肿瘤分子生物学及相关领域杰出科学家，在细胞信号转导、DNA 损伤与修复、肿瘤微环境等多个癌症相关领域做出重要学术贡献，尤其在 TGF- β 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就。



28日，新当选的16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里，有个名字或许很陌生，但他跟武汉有莫大的联系，他叫“王小凡”。

他是董辅初的女婿，美国院士董欣年的丈夫

他的岳父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董辅初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动地比喻为“八宝饭”，认为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强项和弱点，所以多种所有制要长期存在。

他的妻子董欣年不输其父，是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教授，植物抗病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和1978年，王小凡和董欣年相继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在校运动会上，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王小凡和董欣年熟悉起来。1982年，在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中，王小凡以第一名的成绩与董欣年一起赴美留学。30多年过去，两人现在都是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

“我不赞成在宣传某某科学家时，说他废寝忘食，不食人间烟火，什么都不管。在一个人特别忙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多做一点，互相体谅，共同承担，问题就解决了。”王小凡说，他和妻子董欣年分工协作，她做饭、打扫房间，他洗碗、洗衣服；孩子小的时候，她平时晚上陪孩子读书，他周末陪孩子看卡通片或运动；周末购物和花园劳动则是两人一起做。“两个人共同做家务，我觉得这是天经



地义的事，家庭的感情也在这里；共同抚育孩子，这本身也是一种乐趣，我认为作为父亲，对孩子花的精力不应该比母亲少。”

“真正的爱情体现在互相尊重、帮助对方实现一生的追求和愿望上。”他很支持妻子做科学。2012年，董欣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王小凡是美国杜克大学最早的华人教授之一

当年，和妻子一起出国后，王小凡于1986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癌症生物学大家罗伯特·温伯格从事博士后研究。1992年被聘为杜克大学药理学和肿瘤生物学系助理教授，成为最早在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之一。

近20年前，王小凡就已成为杜克大学终身教授，他在细胞信号转导、DNA损伤与修复、癌症转移分子机制、肿瘤微环境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学术贡献，首次克隆了在肿瘤发生和生物发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TGF- β II型和III型受体，被认为是该领域里程碑式的发现。



2014年11月，董辅弼夫人刘蔼年（二排左六）、董欣年（二排右六）、王小凡（二排左四）回校为获“董辅弼经济科学奖”的学生颁奖



夫妻俩将最前沿研究带回武汉

夫妻俩分别是武大第六届和第七届杰出校友，近年来，持续不断地将最前沿的研究带回武汉。

NPR1 基因是董欣年在 1997 年首次克隆到的植物抗病反应中的关键基因。董欣年团队通过与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王石平教授合作，运用该技术在不影响作物产量的前提下，大大增强植物本身的免疫系统，并同时对抗多种病原体，被认为在水稻安上了一种“免疫系统开关”。今年，该合作成果在《自然》上发表。今年 7 月，应华中农大邀请，董欣年和王小凡在该校第一次同台作学术报告。

“王小凡不仅是武汉大学的杰出校友，而且也是杜克大学的杰出教师，我与武汉大学有着特别的缘分，很多年前就知道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丽的大学。”王小凡的“东家”——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曾来武大，与武大签署《中国武汉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关于全球健康合作的协议备忘录》。在江苏昆山，由美国杜克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合作创办的昆山杜克大学内，该校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正在为健康中国服务。就在今年 7 月，陈东升等人牵头的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健康产业联盟成立，王小凡当选为名誉会长。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让“患者至上”成为一种精神感召

——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

李阳和

“许多医生都有自我保护能力，不是把自己的过失说得有理有据，就是把那些不快记忆迅速一笔勾销，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会永远牢记这些失败的教训，无法把它们忘掉。”这是器官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不但铭记在心，也用它来提醒医务工作者，“这样的大权威都能有这种精神，我们普通的医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对待病人、对待工作呢？”

2018年3月18—19日，第十二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医学部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医学部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多所医学院校的人文学者、医生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医院的管理者共300余人，围绕新时期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结合自己的防治经历和临床体会所做的主题发言，让与会者深受触动。

医学成就只有服务于老百姓才有价值

“医务人员除为单个病人服务外，是否还应当关注群体和社会公众的健康？”研讨会上，桂希恩教授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两个故事。

他回忆起自己1999年在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发现艾滋



病的经历。当时，有来中南医院进修的医生说，他们老家上蔡县很多人患病，但不知道是什么病。进修医生的话一直萦绕在桂希恩教授心头。一次，他利用出差的机会特意到访上蔡县，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区的一些农民患有艾滋病，而且很多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的艾滋病。他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政府，信中他言辞恳切：我们担心，文楼村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今天，更凶恶的瘟神正在残害上蔡县文楼村及其周围地区的人民……此事单靠上蔡县的力量是不够的，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上蔡县血传播疾病的情况，帮助上蔡县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并救助患者。我相信，这是上蔡县人民及一切有良知的医务人员的共同心愿。

这份报告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上蔡县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针对艾滋病开展抗反转录病毒疗法（ART）及预防母婴传播（HIV-PMTCT）的地区。桂希恩教授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和执着，推动了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并对制定“四免一关怀”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

让桂希恩教授记忆犹新的另一次经历，是在新疆发现了地方克汀病——一种碘缺乏病。2006年，他们在新疆做艾滋病合作研究项目，为当地居民讲课时，偶然提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西北碘缺乏病的情况。当地居民说，他们那里还有碘缺乏病。在下乡调研时，看到当地不少农牧民脖子肿大、身材矮小，有的还智商低下时，桂希恩颇感意外，因为碘缺乏病的研究成果早已得到应用。更为吃惊的是，当地患碘缺乏病的人数量庞大，竟然有400多万人吃不上加碘盐。怀着沉重的心情，桂希恩写了“加强新疆等严重碘缺乏地区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引起了从中央到当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当地400多万人吃上了政府免费提供的加碘盐，碘缺乏病在当地得以控制。

在桂希恩教授看来，医学成就只有服务于老百姓才有价值。他强调说，“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健康，同样应关注群体和社会公众的健康；不仅要关注传染病的防治，同样要关注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误诊一个病例，对病人来说，可能是失去一条生命。”

会上，桂希恩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对“黑热病”诊断有误的案例。20世纪90年代，桂希恩遇到了一个从湖北去新疆打工被诊断患有骨髓炎的年轻人，多次治疗不见效果；后来，他在研究患者的骨髓穿刺片后按黑热病给予治疗，患者痊愈。

此后，武汉多家医院以及沙市、宜昌等地的医院陆续报道有近20例黑热病。桂希恩教授据此撰写出《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的回顾及展望》，于1997年发表在国内医学杂志上。

文章发表后，桂希恩教授有一次与上海的管立人教授交流，觉察到论文中提到的部分黑热病有可能是误诊。随后，他走访了湖北省10家接诊过“黑热病”患者的医院，取得标本，并到南京进行真菌培养核查，最终确认，论文中涉及的真正的黑热病人只有一例，其余十几人都是误诊。这些患者得的其实是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这是一种国内文献罕见报道的疾病，和黑热病症状非常相似。

正确的诊断让患者获益，患者陆续痊愈出院。其间，桂希恩教授还遭遇了“小护士赶走大专家”的尴尬。原来，一位在荆州某医院被诊断为黑热病的患者，久治无效，病情持续恶化。桂希恩从省疾控中心知道情况后，怀疑这位患者是被误诊的，特意赶到该医院想查看一下。“我从武汉来，因为我犯过错误，诊断黑热病有诊断对的，也有诊断错的，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来看这个病人，一起来讨论。”桂希恩的诚意换来的却是拒绝：“我们诊断这个黑热病，百分之百有把握。”医院不但不予配合，还让病房一年轻护士“赶走”了这位从省里来的老教授。后来，这名患者转到了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即现在的中南医院），被桂希恩确诊为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治愈出院。过了十几年，这个患者还到医院感谢桂希恩教授。

让桂希恩教授感到不安的是，仍有部分被误诊为黑热病的患者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去世。对于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一错



误，桂希恩教授从不遮掩，反而多次向学生们自我“曝光”，这次在研讨会上再次提及，也是希望后来者引以为戒。他说：“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误诊一个病例，对病人来说，却是一条生命。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2000年1月28日，桂希恩整理了相关材料，向曾经发表《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的回顾及展望》的杂志编辑部去信，承认了黑热病患者数字有误，并“向贵刊及读者表示歉意，为挽回影响，建议发表我们这个检讨的信”。令桂希恩感到遗憾的是，杂志社并没有刊发此信。2007年2月，桂希恩和管立人教授合作，就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等相关问题撰文发表在《中国寄生虫与寄生虫病杂志》上。通过桂希恩教授等人的培训，此后，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的误诊已经非常少。

后 记

2002年由美国医生联盟等发布的新千年医师宪章中提出的医师职业精神，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医师协会倡导的医师宣言中，也有一条是“患者至上”。在第十二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当与会者听到桂希恩教授掷地有声地说出“我们应该以病人为中心，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不再觉得它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传达了一种实在的精神和真切的力量。毫无疑问，桂教授以自身的经历对“患者至上”做了最好的诠释。

作为中南医院的感染科老专家，桂希恩教授更是以抗艾先锋著称，成为“2004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在农村、在边远地区，都有他致力于传染病、慢性病防治的身影。不仅如此，他还尽己所能帮助艾滋病孤儿，只为他们能有更好的人生。哪怕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他仍以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坚持每天上班工作。

对于当下一些年轻医生在坚守职业精神方面出现的困惑和迷茫，他的回应是：“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低调：不愿意出席会议的开幕式，访谈中一再强调不要宣传他。然而，他已然成了后学的榜样和偶像。会后，很多年轻的医生、稚嫩的医学生，都围到 80 多岁的桂希恩教授身边，纷纷与他合影，那是一幅医学职业精神代际相传的动人图景。

（稿件来源：《健康报》2018 年 3 月 27 日，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追求精彩人生

——“校友鵬鵬大讲堂”演讲

于 刚

校友名片

于刚，武汉大学杰出校友、校董。111 集团执行董事长，联合创始人。1 号店联合创始人，荣誉董事长，卓尔集团联席主席。曾任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和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裁，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和座席教授。曾在 2002 年获得国际 INFORMS 协会颁发的 Franz Edelman 管理科学成就奖。于 2002 年和 2003 年两次获得国际工业工程师协会颁发的优秀研究奖和最佳论文奖，于 2012 年获得国际 POMS 协会 Martin Starr 生产与运





营管理卓越实践奖。于刚博士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过80多篇文章，著书4部，获有三个美国专利。

从工人到大学生，从学者到职业经理人，再到连续创立科莱科技、1号店、111集团……11月26日，1977级空间物理系杰出校友于刚讲述了自己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为大家带来一场《追求精彩人生》的精神盛宴。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党委书记杨少清、院长李德识、党委副书记陈阳，武汉大学校友事务与发展联络处处长邓小梅、副处长徐毅，1977级历史系校友程金谷，1977级空间物理系校友金陶、王海婴、胡关平等师生代表共同听取讲座。李德识为于刚颁发校友鲲鹏大讲堂纪念奖牌。

好学勤奋，扎扎实实打基础

于刚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很朴实，第一要求守纪律，第二要求讲诚信重承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课堂学习基本是荒废状态，但母亲的口头禅是“学了东西一生总会有用”，因此，于刚一直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

1977年，中学毕业后在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厂当工人的于刚，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一次机遇。在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他第一时间参加了考试，如愿考上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我正在修电器，一位工友跑来跟我说‘你考上啦’，我当场把所有的电工工具丢在地上就跑回家去了，太兴奋了。”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于刚也特别珍惜。在武大，原本英语基础特别薄弱、考了零分被分到“慢班”的他，从abc开始学习，还悟出了“让乌龟穿上滑轮鞋去赶上兔子”的学习方法，掌握了通过阅读英文小说提高英文水平的速成技巧，一年之后，他居然参加并通过了快班的英语免修考试，开始学习日语。

从武大毕业后，在老师的鼓励下，于刚通过当时中美合作选拔的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计划，获得去美国康



奈尔大学留学机会，学习理论物理；后来转学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管理学院任教。

任教期间，于刚给美国联航做咨询，协助开发了一套针对航班晚点的飞机调度系统，在业内积累了大量经验、声誉。他趁热打铁成立了科莱科技，拿到了美国大陆航空 120 万美元的订单。

原本，于刚认为航空实时管理系统最多一年便可以完成，120 万美元绰绰有余，没想到系统研发难度远远超出预期。因为没有按时达到预定里程碑，公司现金流断裂，CTO 离职，于刚遇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个危机。生死存亡关头，于刚花一个月时间写了厚厚一本商业计划书，寄给了 VC。终于，科莱科技求得了生存，四年后航空实时管理系统成功上线。在“9·11”事件中，这一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美国大陆航空公司挽回损失 3 000 多万美元，也让于刚获得了管理科学应用的最高奖——Franz Edelman 管理科学成就奖。后来，西北航空、西南航空、美国航空、JetBlue、AirTran、Delta 等多家知名航空公司，都成为科莱科技的客户。

不断挑战，从财富 500 强企业高管 岗位辞职创办 1 号店

“我还希望有更多挑战。”有了一定积累以后的于刚，也有了回到祖国寻找下一个事业的念头。他先后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教过 EMBA 课程，做过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裁，之后担任了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

在戴尔，一直希望寻找挑战的于刚遇到了人生又一次转折。2007 年的一天，戴尔中国区总裁刘峻岭向于刚提出了一起创业的想法。“当时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只要我们全身心承诺就一定会创造价值。”就这样，戴尔两位亚太地区的资深高管同时离职，联手创立 1 号店。

两个原本掌握上百亿预算、管理数千人的高管，突然销声匿迹了半年。他们在上海借了一个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经过



整整4个月的讨论和市场调查，准备进入当时刚兴起的电商行业。当年7月，总部位于上海的1号店正式上线。为了营销造势，于刚做了10万本300页的精美目录册，每本光印刷成本就是11元。为了节省人工费用，于刚亲自和员工一起“扫楼”派发。一天晚上，他在自家小区发目录册时，还被保安“遣送回家”了。更糟心的是，投入巨大成本的线下推广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等到1号店正式上线那天，总共只有21个订单，绝大部分还是自己员工下的单。

“我们这才意识到目录成本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目录的信息是静态的，也不是电商的做法。”痛定思痛，1号店开始找当时的“流量大户”天涯社区、新浪合作，在线上推广1号店。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1号店的用户，第一年400多万的销售额，第二年4600万，第三年8亿到27亿、65亿、120多亿……

“大家看到的是你事业的高光时刻，看到的是你上市、领奖、新的模式推出……看不到你背后那些挫折和低谷，都是心血换来的。所以，想成就一个事业、希望享受高光时刻，必须要经历和享受全过程。赠给同学们一句话，如果想创业，就得经得起折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诱惑。”

坚毅不拔，知天命之年带领111集团上市

1号店取得巨大成功，获得裂变式的高速增长，但于刚更看重的是它良好的客户体验。“业界平均达80%多就不错了，我们的顾客满意度超过92%，这是我感到最骄傲的。”众多的VC、PE以及战略投资者蜂拥而至，最后，沃尔玛加码控股1号店，失去了决策的自由度和速度后，于刚和刘峻岭决定退出。

考虑到医药健康是大众的刚需，1号店专门做了个医药频道，叫1号药店。在沃尔玛收购1号店时，这块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

从1号店退出之后，于刚和刘峻岭开始全身心投入医药板块，回归1药网。在1药网拿到网络医院牌照、B2B分销批发牌照、平台运营牌照等资质之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打造智慧供应链、



大数据、云平台和医药专业知识的生态圈，生态圈里面所有参与的医院、药店、药企，以及医生和病患都整合到一起。病患可以在1药网实现线下买药，也可以线上到网络医院就诊，医生在线开处方，然后在线药店把药送到病患家里，形成一个闭环。真正帮助大众解决看病难买药贵的现状。

在2017年年底资本寒冬来临之际，于刚和刘峻岭开始筹办1药网上市。他把这个项目取名叫“Grit”，中文译为坚毅不拔，对长期目标的持续激情及持久耐力，但他更欣赏Grit的另一种诠释“finish whatever I begin”。2018年9月12日，111集团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积累+诚信+激情，成就精彩人生

“我的演讲题目是《追求精彩人生》，怎么看人生是否精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精彩。成功也是你自己定义的。”最后，于刚给了学弟学妹们几点追求精彩人生的忠告：

一是积累。如果希望做想做的事情，必须从必须做的事情开始。

二是踏踏实实做人。于刚说，他自己一生的守则就是诚信。“小聪明只能帮你一时一事，诚信能帮你一生一世。要成就大业一定是有诚信，别人才会对你信赖，这个信赖是钱买不到的。”

第三是激情。“我写了一本书就叫《激情创业》。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讨论了无数次，想让我改个标题，叫《创业理念》《创业感悟》之类，我说都不好，我认为激情是做事业最重要的。有了激情，才可能把大量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像我经过数次艰难时刻，每次都告诫自己，这就是我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将来这些都会成了我的故事。要没这一切困难的话，我怎么会有成就感呢？”



艺术点燃想象 执着成就梦想

——杰出校友阎志在 2018 年武汉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阎 志

尊敬的韩进书记、贤康校长、各位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明天就是教师节，我首先向武汉大学和所有老师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在这里，我还要祝贺 2018 级新同学来到武大这座中国最美丽、最有人文魅力的大学，开启你们绚丽的人生新篇章。我也非常荣幸作为老校友代表，见证你们为珞珈山带来崭新的气息。从今天开始，武汉大学必将成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照亮和温暖你们此后全部的人生。





我今天就不讲创业忠告和创业历程之类的内容，这方面马云、雷军讲得很多很精彩，我完全同意，请大家参照执行。我今天就谈谈创业之外的事，谈谈诗歌、艺术，谈谈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16岁那年，我正读高一，因为失恋，我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秋天的恋歌》。现在那些忧伤的诗句，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诗歌从此走进了我的人生。我很多次假设，如果没有遇上诗歌，我的人生会如何？也许在学校里成为一名问题少年，也许在小镇上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因为诗歌，我疯狂地迷恋阅读和写作。因为写作，我有了第一份工作，参加一本地方志的编写。因为写作，后来我进入了文联编刊物，进了报社做记者。同样因为写作，我在24岁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广告传媒公司。诗和文学有时还是我生存的依赖和创业的本钱。我开办公司的全部资金，就是写刘德华传记《天若有情》的稿费。

前几天翻书柜，看到一本《梵高传》，我想这大概是近些年新买的吧。等我抽下来翻开扉页，才发现1993年就买了——25年前买的。那一年，我才21岁。再看看价格，13块！那时的13块对我来说就是天价了。当时，除了家里挂的几幅印刷品的国画外，我几乎对美术和艺术一窍不通。在家乡那个山区小镇上，梵高是谁，他的影响力怎样，知道的人可能寥寥无几。我到现在还不明白，25年前，我为什么会那么大方地买下这本书。

2014年6月，我们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商务活动，主办方把会见安排在了梵高博物馆，我这才近距离地、全面地感受到梵高艺术的美与震撼。今年8月初，我又经过巴黎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上午的空闲时间。无意中，当地的朋友带我到梵高最后生活的奥维尔小镇观光，还到他的墓地凭吊。当年21岁的小镇青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和这个叫梵高的大师有这样的际遇。梵高的执着热烈如何影响了这位青年的创业与人生，真的不得而知。

在年轻的时候，你总会偶遇一些看似无用但又是真善美的人和事物，他们让你心生感动，内心震颤，甚至只是一点点心动。它们也许有用，也许真的终生无用，但潜移默化中，它在感染着你，改



变着你。所以，同学们也不要忽视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美好感动，也许某一次机缘，某一本传记，某一件艺术品，某一次回眸，某一次拥抱，会成为影响你一生的最美好的相遇。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年对诗歌年少轻狂无以复加的挚爱，与梵高与艺术漫不经心的偶遇，其实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冥冥之中，与文学、艺术接近的某一个契机，被我紧紧抓住了，深深触动了，也改变了我。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诗人身份对于我做企业有何帮助？我想最重要的是，诗歌的跳跃性、想象力，让我从不拘泥于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产品，而是不断创新企业服务和项目内涵，守正出奇，拓展企业的边界，在面对困难时有乐观的心态。我也相信，很多科学家、设计家、企业家在一些关键时刻，艺术给了他们某种神奇的启迪。

我觉得，真正限制人们想象力的，是循规蹈矩实用主义的生活，是直觉的钝化和漠然，是对文学和艺术的忽略和疏离。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窦校长在和大家上第一课时，也提出了要涵养人文精神。

的确，现代工业也好，现代服务业也好，如果离开了艺术的品位和启发，是很难真正打动人心的。我想，做企业如此，做产品如此，从事科研与创新何尝不是如此？亲爱的同学们，在珞珈山宝贵的四年学习时间里，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我希望你要么用心地爱上一门艺术，要么认真地谈上一次恋爱。总之，要任性地爱一回。我们要让热爱点燃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想象和激情。

我也建议，同学们尽量放下手机与游戏，多去万林艺术博物馆、省博物馆、美术馆看看，假期约上几个同学背上行囊到处行走……

上次，卓尔体育馆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我和几位老校友经过樱花大道，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哥无比感叹：在武大读书，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一位女生在这里牵手走过。在这里，我插播一个小广告：武汉最好的约会地，武昌是珞珈山；汉口是卓尔书店，而



且 24 小时不打烊，很方便很温馨。

直觉固然美妙，想象纵然美好，但是，同学们，仅仅有梦想和激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只是对生活充满想象，你还得脚踏实地，练好本领，壮大自我。你不能只是对事业有梦想，还得勤奋务实，扎实努力地去征服一个个节点，实现一个个小目标。

正如梵高相信自己，偏执地热爱绘画，成就了不朽的旷世名作；乔布斯对极简艺术偏执的热爱，成就了苹果手机。既然我们找到了梦想与热爱，就要有偏执的精神，偏执地热爱我们的事业，执着地追求我们的理想。一个人，一个组织，只有使自己更优秀、更强大，才能努力抵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为他人、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我们对艺术、学术、科技的研究，更需要执着，更要有偏执的热爱，努力到让老天爷都感动，把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同学们，如果我们找到了心中所爱，就应该爱得更热烈、更执着、更偏执一点，让我们的所爱成为一道心灵之光。哪怕在自己落寞、孤独、失落时，也会护佑我们一路前行。

诚然，我们的爱好也不止于诗歌与艺术，比如，还可以是体育运动。希望同学们勤于到卓尔体育馆打卡，多多益善。只有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扎实的学业基础，才能拥抱多彩的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从踏入武大开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相信自己，热爱自己的专业，相信爱情，热爱生活，开启最美妙的大学生涯，想象并实现卓越不凡的精彩人生！

谢谢大家！

阎志简介：武汉大学第八届杰出校友、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传奇企业家当选阿拉善第七任会长，一篇文章读懂艾路明

袁治军

2017年11月7日晚7点10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名单新鲜出炉，艾路明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届会长，从2018年1月1日起履新。

艾路明为武汉当代集团创始人，2013年3月加入阿拉善SEE，2015年7月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湖北项目中心，自2016年1月始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副会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艾路明将80%的时间投入到了阿拉善SEE的公益活动中。“我很幸运，我想做的事，都会在想到以后去努力完成。”他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曾如此表示。



艾路明，武汉当代集团创始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任会长



29岁的艾路明浑身湿漉漉地坐在长江边，惊魂未定。南京漂流队的两个朋友从水面上漂过时望见了，冲他高喊：“赶快下来啊！”艾路明扭过头，假装没听见。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又一次在鬼门关前打了个转——这次漩涡遇险前，他在前面的漂流过程中，被岸上的藏民误认作动物打了两枪，一枪在他皮划艇的前面激起半人高的水柱；另一枪，擦着他的耳朵呼啸而过。

他在岸边坐了至少半个小时，不敢下水，“根本没想到会经历这种局面。后来我拖着皮划艇往上游走了很远，想从其他地方绕开这个漩涡，但后来发现不行，于是又硬着头皮下水。这一次也是很悬，几乎是贴着那个漩涡的切线漂过去的。”

尽管在前期做了详细的筹划，但艾路明显然还是漏算了被人打冷枪和遭遇巨大水流漩涡的可能。漂流长江听起来豪情万丈，事实上却是时时“和死神跳贴面恰恰舞”——在艾路明漂流长江的前一年，勇士尧茂书殒命金沙江；在艾路明漂流长江的那一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孔志毅、王建军等10人不幸遇难……但艾路明依然不打算放弃，“我当时就是想去。别人也许也想，但没有行动，我是想到了就要去做。”

在从宜宾出来后大约10公里处，他遭遇了那个险些也让他折戟沉沙的水流漩涡，皮划艇快要被湍急的水流扭曲成了麻花，艾路明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分不清东南西北，所幸一股上升的水流在危急时刻将



1986年，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艾路明从长江源头漂流至武汉，再由武汉下水游至上海的长江入海口，开创单人漂流长江先河（图片由当代集团提供）



他和他的皮划艇托起——

31年后，两鬓斑白的艾路明在北京一家人声鼎沸的面馆里一边吃着热辣的重庆小面，一边回忆他的过往，波澜不惊。他的人生不曾与任何常人的轨迹重合，传奇、戏剧的底色从他创下单人漂游长江先河之初已然早早布下。

无论是弃掉公职与六位同为武大校友的同道以2 000元起家，打造今天总资产500亿元、参控股六个上市公司的湖北最大民营企业当代集团；或是落户农村，担任武汉市新洪村村主任20年的同时，以哲学系博导身份执教武大；还是花甲之年仍雄心勃勃地竞选阿拉善SEE会长一职，为此交付80%的时间于公益——企业家、农民、博导、公益人诸多身份汇成一个令人困惑却新奇的艾路明。

他被称为“隐形富豪”，亦有人称他为“布道者”。熟悉他的人则称他为“老顽童”“扫地僧”——这两个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前者不拘小节，幽默风趣，快乐而自由；后者是隐形的顶尖高手，深藏不露。

“我很幸运，”艾路明告诉《中国慈善家》，“我想做的事，都会在想到以后去努力完成，不做就不行。”

追溯他所称的这份幸运的源头，武汉大学是一个难以绕开的所在。

武大的自由

在1978年踏入武汉大学之前，艾路明曾是一名搬运工人，那段经历让艾路明看到社会需要改变，直觉告诉他，做官，可以让这些改变发生。怀着这一愿望，他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他看来，哲学是让这些改变发生的基础。一句话，他想做官，不论是乡长还是县长都行。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上任伊始，便打破陈规，主张学生自学，号召学生成立各种学术性社团，“在实践中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樱花诗社”“思想家俱乐部”“UFO兴趣



小组”等一批学生社团在武大应运而生，其中，艾路明和柴晓涌、王铭等人发起创立的“多学科讨论会”，成为当时武大 400 多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标杆。

“……他们受到了爱因斯坦‘奥林匹亚科学院’的启发。但是，无论是在人数上（注：奥林匹亚科学院仅有爱因斯坦、M. 索洛文和 C. 哈比希特三人）或是在学科的广泛性上（注：爱因斯坦、M. 索洛文和 C. 哈比希特三人分别是学物理、哲学和数学的），武汉大学‘快乐学院’（注：多学科讨论会的别称）都超过了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许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一书中，对艾路明等人发起创立的“多学科讨论会”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多学科讨论会”的雏形原本是一次次茶余饭后的吹牛行为。1978 年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学科和思潮，给当时的武大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互讨论，渐渐地，这种讨论逐渐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数学系、物理系、计算机系、哲学系、生物系、化学系、经济系——不同院系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把各自了解、掌握的新知识、新观点一一抛出，然后接受其他同学的“批判、诘难”。

在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每个参与者都不断修正着各自的观点，与此同时，也修正着各自未来人生的方向——计算机系的柴晓涌在留学美国后，改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哲学系的艾路明则在这里纠正了他最初的认知和目标。

“我发现其实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艾路明说，“改变社会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只有从政一条路。”

“武大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自由。”艾路明说，“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诞生了‘多学科讨论会’，也让我在主修哲学之余，得以选修了数学、物理以及经济学的课程。”

跨学科的课程选修对于艾路明来说并非易事，例如在学习拓扑学这门课程时，他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想着一个学期即将度过，这门课程的学分极有可能拿不到，艾路明感到有些遗憾。老师却告诉他，没关系，只要他坚持把课程上完，写出一篇拓扑学发展



历史的文章就准许他通过。

“武大的老师们在学术上保持了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他们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目，让学生自己挑选，在读完之后和他们共同讨论。”艾路明回忆，“我的硕士导师



是陈修斋先生（著名哲学史专家、莱布尼茨专家、翻译家，曾任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

授），我的博士导师是董辅初先生（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我记得单董老师拿给我的书籍资料就有几百万字，他知道我的经济学基础差，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不是读经济学的，他告诉我，‘你得把这些书看完’。”

之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经济学，在于艾路明找到了更适合他的、改变社会的方式——做企业家。

用另一种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艾路明曾追随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期冀以官员的身份实现改变社会的想法，但他后来认为，如果中国所有的精英分子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或皓首穷经于治理学问，那么社会改变的进程将十分缓慢，应该有人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用另一种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

那条路的名字，叫创业经商。



在当时那个大学生还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创业经商，通常意味着无路可走的窘迫——公家饭碗端不上、国企单位进不了，退无可退，为了生存，只好去做买卖。更何况，商人的身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不受尊重。

艾路明曾经端上过公家的饭碗，不但端上了，还是众人眼中的“金饭碗”。硕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党校任教。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工作，和其他六位同是武大研究生会的同学一起，拼凑了2 000元钱，下海经商。那一年，艾路明31岁，时间是1988年。他们一起创立的公司，取名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所做之事，是从小便中提取尿激酶出口日本。

创业经商并不比当年独自漂流长江来得容易，唯一值得庆幸的，也许仅仅是在创业的这条道路上，他不是一个人前行。

当七个武大研究生从武汉三镇的公共厕所中拖着满载尿液的塑料桶赶回工厂时，路人对他们报以的是掩鼻疾走，其中甚至还有一两道轻视和鄙夷的目光。但是30年后，这些和厕所打交道的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资产过500亿元的“当代集团”。

截至2016年，当代集团下属企业达100多家，旗下控股和参股人福医药、三特索道等六家上市公司，涉足证券、教育、体育、环保、文化等产业。

近30年间，将区区2 000元转化为500亿元，这一成绩堪称“辉煌”。“做企业没有辉煌这件事，”艾路明摇摇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企业家）时刻都在危机之中，即使马云、马化腾、任正非这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也不例外。会有各种问题存在，就像人每天都必须吃饭，不吃就饿得慌，企业时刻都要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不然就会遭遇不测。”

即便如此，艾路明并没有把自己捆绑在企业经营上，他早已启用年轻人接手企业管理，而他自己，则投入到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领域。

“有些事可以放手交给别人做，比如企业运营；有些事得自己亲力亲为，比如慈善公益。”



20 年村干部人生

1994 年，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政府找到辖内各企业，希望每家企业定点帮扶一个贫困村，具体的做法就是捐款。艾路明觉得依靠捐款做扶贫并非长久之计，那些钱极有可能用不到正地方，而是被吃喝挥霍掉。他找到区政府领导，表示与其捐款搞扶贫，不如让他去做个村主任书记，这样可能更有助于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如他所愿，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顶着博士头衔的村主任。

“我就是想做这么件事。”艾路明说，“那个时候农村不像后来，当时还是很贫穷的，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扶贫工作。”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 20 年。从 1995 年到 2016 年，艾路明一直有着一个“武汉市九峰乡新洪村支书兼村主任”的头衔，这期间，1998 年政府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主任必须是本村的居民，于是艾路明干脆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入了新洪村——他并不想在扶贫工作上走过场，而是想着如何才能切实地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一项扶贫措施，就是通过小额贷款缓解农民的“用钱荒”。他做了一个实验，每家一亩地可申请贷款 300 元，农民申请到贷款后，再由当代公司聘请专家指导农民种植，并负责统一收购，村民拿到货款后，再将贷款还给公司。当时，为农民做小额贷款的理论研究很少，而推进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则几乎没有。据此，艾路明还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为《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

艾路明为新洪村带来的第二项扶贫措施，是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主张。他在对新洪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洪村农产品种植单一，农业税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从 1998 年开始，艾路明承担了村里所有人的农业税，由他自掏腰包解决这一问题。

他的这一举动使新洪村村民彻底放开了手脚，再没有了因为无



法“交公粮”而产生的后顾之忧，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新洪村的产值此后持续上升。7年后，也即2005年年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艾路明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艾路明(中)和当代集团几位创始人向武汉大学捐款过亿。在这1个多亿的捐款中，有3000多万元被用于建造武大的研究生楼，5000万元用于成立教育基金，剩余的2000万元则用于引进高级师资力量、资助科研项目的展开等事项

在这两项举措外，新洪村的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艾路明都要参与决策，甚至连街坊妯娌间的争执不和，也要他这个村主任出面调解。

“村民什么都跟我说，他们问我种什么能挣钱、怎么能拿到小额贷款；乡邻间吵嘴打架、分田种地，都会找上门来。”艾路明回忆自己的村干部经历，“虽然对做企业没有什么帮助，但我却从中感到了一种快乐。”

在艾路明担任新洪村村主任书记的20年里，新洪村村民的收入逐年增长，仅在2010年，新洪村村民人均收入就达到3500元，比10年前翻了整整5倍。2016年年底，政府对新洪村完成了土地



收购，艾路明的“从政”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在被问及是否会感到遗憾时，艾路明回答，“在我任职期间，我尽量多地帮助村民们争取到属于他们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这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卸任；但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农村的土地问题依然存在，这算是一种遗憾吧。”

做公益的意外收获

艾路明从未离开过武汉大学。他在这个精神的殿堂里接受了从学士到博士的完整教育，最后又回到这里，将他所习得的再传播下去。

“第一次向武大捐款是在差不多 10 年前了。”艾路明回忆，“当时武大要启动一个项目，不太方便用教育经费来做，因此学校希望通过向毕业校友们募捐的方式来完成，那一次我捐了 518 万元。后来陆陆续续我们又捐了几次，前后加起来，总额有 1 个多亿。”

在这 1 个多亿的捐款中，有 3 000 多万被用于建造武大的研究生楼，5 000 万用于成立教育基金，剩余的 2 000 万则用于引进高级师资力量、资助科研项目的展开等事项。

“为什么捐款建研究生楼？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创业的七人，都是武大研究生毕业，不过大家系别不同，有生物系的、化学系的、哲学系的，如果分散开来捐，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嫌。捐建研究生楼，这样不论任何系别，都照顾到了。”

沈祝三“毁家兴学”的义举被艾路明多次提及，他说，那是一种基因，被武大后来的学子们代代传承，当沿袭至他时，他常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能力的时候，作为武大的一名学子，他能为武大做些什么？为后来的学生做些什么？当他做了这些事情后，那么后来的学生是否也会去思考：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又能为他们的下一代做些什么？这种传承，既是源自内心对学校的热爱，也是自踏进武大校园的那一刻就接受的来自校长、老师的教育。

“武大是全国最美的高校之一，她会让你有为她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即使我没有钱，我也愿意通过其他方式、其他途径来回馈



她。事实上，即便是捐款，武大的学生也从来没有以攀比谁捐款多为荣。比如雷军，他故意少捐 1 元钱，就是为了表示对学长的尊重。”艾路明说，“没有人是为了出名才向母校捐款的，那纯粹是发自内心的对母校的感恩。”

常怀感恩之心，虽不是武大的校训，却是武大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给学子的一种胸襟。这份胸襟让艾路明的公益之路进入了更宽广的维度。

从阿拉善 SEE 协会成立之初，艾路明就一直关注着它的成长。经过多年的考察，他认定这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更广阔公益梦想的组织，2013 年 3 月，艾路明正式成为阿拉善 SEE 的会员。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有许多企业家参与其中，而是它提倡的我们应该亲力亲为地践行生态环保的理念。它不仅仅只要求捐款，而是要它的参与者从精神层面关注生态环保，在行动上亲自参与，这是阿拉善对公益慈善的理解。”艾路明说，“这里没有谁是知名的企业家、谁是不知名的企业家的区分，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阿拉善的成员，我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环境、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并愿意通过思想认识、亲身参与、捐赠财富等方式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2015 年 7 月，在艾路明的倡议下，阿拉善 SEE 湖北项目中心成立。“我们就是要聚集湖北优秀的企业家，为湖北环保事业做一点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湖北项目中心成立不久，艾路明就萌发了竞选协会会长的想法。在他看来，身为会长，可以更多地了解、参与到阿拉善的整体运营中去，与此同时，能够较大程度地把某种观念注入机构里面——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历任会长，从最初的刘晓光、韩家寰、王石，到后来的冯仑、任志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给阿拉善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价值的理念和愿景。

在竞选会议上，艾路明承诺，如果当选会长，他将花一半的时间在阿拉善的公益项目上。但是，他的这次竞选以失败告终。

“我想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对阿拉善的理解还不够充分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参与度还不够。”



此后的两年里，艾路明以协会第一副会长的身份将 80% 的时间都投入到阿拉善的公益活动中：荒漠化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他从一个项目奔赴另一个项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让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改变和提升。”他说，“从事阿拉善公益活动，甚至对企业文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于一家几万人的企业来说，最高领导要想认识每一位员工无疑非常困难；同理，对于员工而言，他们也鲜少有渠道或机会去了解公司最高领导在想什么、做什么。“对我来说，我做公益这件事情公司的员工都清楚，他们很认可我做这件事，也很骄傲，公益于是成为一座桥梁、一条纽带，让我和公司的员工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

2014 年，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发起“1 亿棵梭梭”项目，计划未来用 10 年时间，在阿拉善地区种植 1 亿颗梭梭树，恢复 200 万亩以梭梭为主体的荒漠植被。艾路明把这个项目讲给企业员工听，许多员工纷纷认捐。每次他们见到艾路明时，都会很自然地走过去问他，“艾总，我种的梭梭树现在长得怎么样了？”

艾路明从中看到了和员工之间一种新关系的产生。“在加入阿拉善 SEE 之前，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很少想到从公益入手。





而加入阿拉善之后，我发现它在无形中让企业内所有人都看到了盈利之外的另一个远大目标，这个目标所有人都认同，这个目标成为一种新的企业凝聚力。”艾路明说，“当员工们认捐了梭梭树后，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解读——他们是我的资助人，哪怕只捐了1元钱，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问我公益项目的进度。这种企业文化的改变，实在是做公益的意外收获。”

艾路明打算在今年继续竞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一职，他相信有了这两年做副会长的经历，他已经准备好了，能为阿拉善带来新的价值。

（稿件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

珞珈记忆





躬耕七十载 毕生珞珈情

——追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谭崇台

成 蹊

2017年12月9日，躬耕珞珈山近70载的发展经济学大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谭崇台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自1948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他一生扎根珞珈山，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青年才俊；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和研究，成为系统地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0年被评为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尽管被无数“光环”环绕，当人们尊称谭崇台为“泰斗”时，他



总是谦逊地说：“我不接受‘泰斗’这个称号。我不是什么大师，只是一名老师。”

我的事业在中国

1939年，谭崇台考取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已被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刚进武大时，谭崇台只觉这所学校“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武大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

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谭崇台才体会到这里的内敛朴实。这种风气，被他誉为“武大精神”。他曾这样回忆：“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学校迁至乐山时，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我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理解中，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1944年年底，谭崇台踏上了赴哈佛大学求学的旅程。1947年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做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很优厚。

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他坦言，自己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



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 27 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 1948 年 3 月 1 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财政学专家刘炳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等；周鲠生校长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韩德培、吴于廑、吴纪先等学术界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在珞珈山。

1980 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记者采访时向他发问：“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引领中国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归国时 20 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 1952 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 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但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 年“反右”始至“文革”止，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长达 20 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 20 多年来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旧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的他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20 世纪 80 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谈起钟情一生的经济学专业，他曾说：“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在专业研究中，谭崇台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精心撰写了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 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的文章，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领跑者。

1985 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的经济学专业人手一本，多年来影响了不止一代经济学人。

1989 年，谭崇台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热忱而诚挚地给予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 1991 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 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1993 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 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 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 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2008 年，60 万字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比较研究》一书，在谭崇台和几位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出版，当年他已年近九旬，该书后被评为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称职的“教书匠”

“我就是个教书匠。我要继续带学生，直到不能带为止。”2013年11月，在一次与众弟子的座谈会上，面对大家的溢美之词，谭崇台如是说。

“谭老确实做到了终生带学生，他执教近70年；1978年至今，他带了七八十个博士生，今年还带着两个。”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郭熙保本科、硕士、博士均在谭崇台指导下完成学业。他回忆，2010年，老先生已经90岁高龄，还曾坐在三尺讲台一口气为学生做讲座3个小时，他那年带着四五名博士，学生答辩他都到现场参加。“他很关心学生。前两年，他还在家给学生讲课，指导学生们写论文。”

谭崇台招收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这样做并非有意为难，只是希望学生通过考试磨炼一下自己的意志。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前五分钟到教室；每次上课前，都会认认真真地撰写讲义，并经过仔细推敲，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

江西财经大学张进铭教授回忆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次谭崇台给他们上课时，突然一改平日温和、平缓的语调，用有点急促、气愤的声音对学生们说：“今天早上7点多钟，有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请假，说他现在外地不能来，这是请假吗？这分明就是不想来上课。”稍顿，先生用缓和一点的语气对学生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执教50年，从未迟到过1分钟！”当时，教室里鸦雀无声。

或许青年求学时遇到的诸多大师的严肃认真在他心里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来，谭崇台也一直以这样的严谨自律修身教学。在他看来，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如果还是沿袭老一套



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教学，不仅是对学生不负责任，更于心有愧。

1995年，75岁的谭崇台为他的博士生宋德勇一个人开了“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课，每周三次课，每次三小时，整整一年。其实他本可以让宋德勇跟着下一级学生一起上这门课的，但为了不打乱教学计划，谭崇台仍坚持给他一个人开课。

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宋德勇仍感念不已：“师从谭先生的三年，真正是我人生收获最大的三年！”这种近乎“执拗”的敬业精神，以及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折服了所有上过他课的学生。

“我讲课讲得不错，很受欢迎。”有记者采访时，谈起讲课效果，谭崇台曾一改平日的谦逊口气，得意与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谭崇台的辞世，不少经济学人表达沉痛哀悼。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在微博上发文悼念。一位网友留言：“谭老在整个人生阶段都以让人敬佩的勤奋付出，传承了文明，激励了后辈。”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感慨，谭崇台先生深入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努力探索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从贫穷到富强的发展路径，不断反思、建构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中注入了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元素。他学贯中西的学识、经世济民的情怀、淡泊名利的情操、奖掖后学的风范，必将激励和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2 月 15 日）



永远的纪念 温馨的回忆

——中文系“五老”二三事

傅治同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五老”是武大的骄傲，更是中文系学生的骄傲。一入学，老同学就以十分自豪的口吻向我们介绍“五老”——中文系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五位老教授。他们是刘弘老、刘博老、黄耀老、席鲁老和陈登老。

陈登老名登恪，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出身江南望族，祖父兄三代名人，曾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诗歌、学术的进程。父亲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在湖南推行新政，为时人所瞩目。父亲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为同光派代表人物。长兄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是近代大画家。兄长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登老本人也是人中之龙，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绘画的特长，后留学法国，致力于法国文学研究。闻一多主持武大文学院，特聘先生为法文教授，主讲法国文学，任外文系主任，后又聘为国文系教授，主讲唐宋小说，并任国文系主任，学贯中西，德高望重。可惜我们入学时，他身体不好，已经离开教学一线，无缘成为他的授业弟子。有时偶尔看到一位老人穿着旧长袍，在校园里漫步，有人告诉我，那就是陈登老。直到毕业，我都没有和他老人家正式见过面和说过话。毕业后，天各一方，竟不知其所终，不免深感遗憾。

席鲁老讳启駟，字鲁思，湖南东安人，其名其字均出自《诗经·鲁颂·駟》。席家是东安大族，其祖席居正，是东安著名乡绅，其伯父席宝田是湘军著名将领，其父席业是清末秀才，民初曾



任国会议员。先生出自文武世家，自幼好学，遍读群书，26岁即与当时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杨树达、陈垣、高步瀛、吴承仕等成立思辨学社。后为黄侃所赏识，劝其留任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武大前身），被婉拒。后历任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1958年上半年，我在武大中文系念大三时，选修了席先生的《荀赋》。他身材瘦小，着旧式长袍，虽为名教授，却更像一乡下老人。因为所讲内容较为深奥，担心学生听不懂，故板书特多。先生个子矮，板书时，立起脚跟，弄得满手、满袖都是粉笔灰。又好用双手撸长袍，故下课时，已是满身皆白。先生上课极为投入，常常拉长嗓子吟唱《荀赋》中的《成相》篇。《成相》是荀子讲治国安邦之术的，先生之吟唱，或许是借以述志，可惜我们那时太年轻，没有听出先生的弦外之音。《荀卿赋定本校笺》是他发给我们的讲义，16开的油印本，定稿时间是1957年12月。拿着这本发散着油墨香味的讲义，大家喜不自胜。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里很少有教材，大多是老师讲、学生记。那时武大中文系讲课的都是副教授以上的老师，其中包括两位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学识深厚，教风严谨，课堂里很少讲废话，句句都是学问，认真记录下来，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但席先生的《荀卿赋定本校笺》是个例外，这本十六开的油印讲义，是我在武大学习期间少数几本讲义之一，特别珍贵，6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虽然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每当我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翻阅时，席先生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眼前——瘦小的身材，平易的面容，陈旧的长袍，圆圆的黑边眼镜，略带乡音的普通话，没有教授派头，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却精神矍铄，声情并茂。那慷慨激昂的讲解，抑扬顿挫的朗读，能令学生全神贯注，永生难忘。记得在上他的最后一节课时，他朗读了自己创作的仿效《成相》体五章，声音清朗，节奏铿锵。听完他的第一章“沉潜反复，治之数年，珠在握”，大家感到这绝非先生的自诩之言，而是在诉说治学之艰难。当听到第五章“既定著，聊自豫，简书杀青且勿遽”，又能使人感觉到先生对治学的严谨，对名利的淡薄。当念到最后三句时，他的声音略有提高，“闺中老妻，可以缮写，为我助”，这时先生自己笑了，同学们也都笑



了，大家为有这样一位贤淑而能干的师母而骄傲，为先生伉俪情深而高兴，课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个学期的选修课，在严谨的学术气氛中进行，在欢乐而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先生学识渊博，教授们一时查不到的典故，也都向他请教，故被誉为活的《四库全书》，这本《荀卿赋定本校笺》就是明证。它虽然只是对《荀子》的《成相》与《赋》两篇作校正与笺注，涉及的学问却十分深博：有音韵，有考据，有校正，有训诂，“篇名贸乱，沿误千年”，一朝正之，而“千载之覆，发于一旦”，功莫大焉。可以说此书是文献学的典范，是研究荀赋的集大成之作。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著述满篋，从不轻易示人，更少杀青付梓，其著作现知者只有《文选学讲义》《〈世说〉当时语释》《关于屈赋篇疑信问题》几种。先生诗词骈古俱佳，但很少结集，据我所知，只有《效成相体五章》及《读诵帚词集叙书其后》一诗：“我友诵帚翁，风神夙高迈。文心追古贤，词律媲宋代。”这是对朋友刘永济先生的辞章的赞誉。

席先生是中文系五老之一，道德文章，足为世范，深受师生敬爱，曾是学界之翘楚，武大之骄傲。但“文革”伊始，先生即首当其冲。红卫兵和造反派拉他去批斗，他愤然抗拒，曰“士可杀，不可辱！”于是绝食而逝，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今天重温先生的讲义，回忆当年先生的教诲，感恩、敬佩之余，不免悲伤。先生永远活在学生心里，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五老之中年事最长、最具个性的是刘弘老。弘老名永济，湖南新宁县人。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湘军统帅刘长佑，曾被慈禧钦点为直隶总督，为官清廉，死谥武慎。虽为武官，却是秀才出身。父亲刘思谦任过知县。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聪明好学，文史功底深厚。先后就读于天津高工、复旦、清华等校，学成后在湖南、辽宁等地任教，1932年由李剑农、皮宗石等名家推荐到武大任教，曾任文学院院长。直到1966年逝世，先生再没有离开过武大。先生是楚辞学家、词学家、文心雕龙专家，但他教我们的却是元曲，可见学问之渊博。他发给我们的讲义《屈赋通笺》，是对屈赋研究



的集大成之作。令人痛惜的是，“文革”一开始，弘老就遭到灭顶之灾，被造反派批斗而死，据说死得很悲壮。每当我温习先生的那部讲义时，他那穿着老式长袍、瘦长而微佝的身影，矍铄而精神的目光，齐颈的五四式头发，以及洪亮而略带乡音的朗读元曲的吟唱声，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响起在我的耳际。弘老，安息吧！

刘博老名赅，字博平，湖北广济（今武穴）人，祖父刘燁，咸丰进士，曾任湖南常德知府，1891年卸任，归乡途中死于洞庭湖之牛鼻滩，歿世之日，正是先生诞生之时，为纪念祖父，故先生又号牛鼻滩生。长成后，致力文史研究，尤长于小学训诂之学。师从章黄，造诣深厚，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为国家一级教授。

博老在学生中最有影响的有两点：一是为人宽厚。1956年武大来了一张副校长，看中了先生在珞珈山上十八栋的住宅。总务处为先生另外安排了平房，先生二话没说，立即搬家，毫无怨言。1957年春，开展整风运动，青年教师和学生张贴大字报，对张副校长的以权谋私提出批评，为先生鸣不平，并动员先生起来揭发。先生不仅不揭发，还劝阻大家不必为此小事影响大局。1957年下半年，武大开始反右，中文系成了重灾区。25%的师生被打成右派，其中44岁的名教授程千帆先生被打成右派司令。在全系师生批判大会上，校系领导要求所有老教师都必须上台进行批判，以表明立场。老师们一个个上台慷慨陈词，有个别的甚至指着程先生的鼻子破口大骂。唯有博老，心平气和，以长者身份，说了一句：千帆，你这是怎么啦，骄傲了？你以后可要听党的话呀！大家正等待他的下文，先生却已经走下讲台。二是他的学识。博老是章黄弟子，章黄学派的嫡系传人，以古音韵学和文字学的卓越成就享誉学坛，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四时我选修了他的文字学。他的课没有讲义，只发给我们唐兰先生的一篇有关文字学论文的油印件。上课时从“单体为文，合体为字”讲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每个字都讲清其结构、字源、字义的演变，哪些字《说文》说对了，哪些字《说文》说错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并随手在黑板上写出其甲骨、金文、小篆各种字体。一门十分枯燥的学问，被他讲得风生水起。他常说“入其门，其乐也无穷”，一学期



下来，我已经“乐”上了这门学问。我曾认真做了笔记，将他讲解的近千个字，一一记录下来，装订成册，视为当代的《说文解字》，这本笔记使我终身受益，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幸喜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书名为《初文述谊》。博老结局是五老中最幸运的，1978年，他安详地离开了心爱的讲坛和学生，享年87岁。

耀老姓黄，名焯，字耀先，湖北蕲春人。他和博老一样，是章黄学派的传人。他是黄侃本家，年轻时为黄侃做过佣工。趁黄侃出游时，他把黄侃的藏书读了很多，使黄侃刮目相看。后来考入武昌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在南京任教，后来一直任职于武大。他的学问很渊博，国学根底很深，同学生关系最亲密。平日里总是着一件黑布长衫，冬天则穿长棉袍，1955年他给我们讲授古汉语，1959年我选修了他的《诗经》。上课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蓝布包，走上讲台，先把布包放在讲桌的左边，然后从长袍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戴上向前看看，觉得镜片不清晰，又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把眼镜擦擦再戴上。然后撮起嘴把讲台上的粉笔灰吹走。这样一来，粉笔灰又粘到眼镜上，只得又拿手绢擦拭，如此反复三四次，才打开蓝布包，拿出讲稿，开始上课。讲正课前，总先来一点“笑料”作为“入话”，或引人深思，或使人开怀大笑，所以学生都喜欢听耀老讲课。所听的正课，有的早已还给先生了，但一些“入话”却终生难忘。譬如有一次讲他看病的经过。护士说：“要打针”，先生说，“打哪里？”护士说：“打臀部！”先生蒙了，问“臀部是哪里”，护士不耐烦地说，“哪来的这么多废话，脱裤子！”先生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把“臀部”念成了“臀部”，然后讲解了“臀”字结构和字音字义的来历，使我们在笑声中学到了知识。我至今还记得先生讲的章太炎先生的两个故事。一次太炎先生请客，夫人做了满桌子菜，可先生高度近视，只看了摆在面前的一道炒肉丝，以为餐桌上就只有这一道菜，又不好当面责备夫人，只是不断地向客人道歉：“菜太少，不好意思！”逗得客人们一个个忍俊不禁。有一年冬天，太炎先生身穿长棉袍，走出大门，却总觉得左臂特别冷。回头对夫人说，“今天有点怪，怎么冷了一边？”夫人赶紧上前一看，原来是先



生的左手臂是从棉袍和罩衣之间穿出的。从这些小花絮中，我们看到一代大师在日常生活中的“迂”，反衬出他们学术上的“精”，给我们以启迪。其实耀老本人也很“迂”，他一生育人无数，著作等身，却不知米多少钱一斤，柴多少钱一担。

耀老是幸运的。

“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文革”后，又迎来了他的学术春天，被聘为博导。自己的著作在陆续出版，还整理了老师黄侃先生的大量遗著。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病逝于医院。他安详地活着，也安详地走了。耀老是幸运的！

人生最难得者良师益友也。有幸，我们在武大中文系遇到五老，并且成为他们的学生。告别五老已经 60 年，五老中最年轻的耀老离世也已 36 年，但五老却永远活在学生的心里。

难忘的五老！永远的五老！

（作者系中文系 1955 级校友）



刘永济与程千帆的交谊

巩本栋

刘永济先生与程千帆先生是世交。刘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曾经向程先生的叔祖程颂万问学，而程先生自幼随程颂万长子程君硕先生读书。刘先生是千帆先生的长辈，刘先生发表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的许多文章，程先生原就读过，十分佩服。1940年年初，程先生因躲避战乱辗转入川，刚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不久，便去拜访当时亦随武汉大学内迁乐山的刘先生，并把自己和沈祖棻先生的一些作品呈请刘先生指教。刘先生很欣赏程、沈二先生的才华和作品，次年，刘先生便推荐程先生到武大中文系任教。

程先生对刘先生的为人极为推崇。他认为刘先生一生的为人治学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刘先生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而又反复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刘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故事为例。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而是怕后生嘲笑。刘先生将此告诉程先生，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

刘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程先生特别感动。程先生后来回忆说，1941年秋，他与刘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结邻。钱歌川教授与程先生住在山顶，刘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刘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



如是。到了晚年，刘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休息一下，又工作到深夜。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恐怕所为不及其所欲为。”这极大地激励了当时还很年轻的程先生。

刘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博返约。在 40 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刘先生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很自然地推崇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程先生在与之交往的 20 多年中发现，刘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刘先生在群经、诸子、小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古典文学，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刘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对《庄子》的造诣。但他除了偶尔谈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以外的文章。程先生曾问刘先生：“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刘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刘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而已，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答王子飞书》）。刘先生治学由博返约，不废考据，但主要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程先生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与刘先生相识，学术交往很多。刘先生的许多著作和词作的手稿，程先生都读过。有时候程先生也会对这些手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刘先生无不乐于接受。程先生曾珍藏有近百幅刘先生的词稿，都是精楷，可惜都毁于“文革”中了。刘先生曾赠给程先生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做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副对联也足可见出刘先生为人治学的态度。

程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师从刘先生 20 多年，得其教益最深。确实，刘先生对程先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为人治学的精神上。刘先生一生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并为其传承



开新倾尽心力，程先生亦然。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吴宓先生就称程先生“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吴宓日记》1946 年 3 月 8 日记）。而这正是程、刘二先生交往最频繁的时期。程先生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不甘沉沦的原因时，也说道：“这个原因，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去。”（《桑榆忆往》第 4 页）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为己任，支撑起了程先生的整个人生和学术。

刘先生在学术上属于学衡派，主张不激不随，兼取中西文化的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他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他的《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曾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他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能得刘勰原意，堪为继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后的又一力作。刘先生谈到自己的这本书，曾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程千帆《刘永济先生传略》）以精于小学推黄季刚先生，以长于持论自许，亦是平情之论。其书有两种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和《〈文心雕龙〉参考文录》，所录作品，极为详备。程先生初到武大，给中文系的学生教大一国文，编写讲义，分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总论选了十篇文章，包括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实际也是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是一种总结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可贵尝试，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正与刘先生同。程先生这一时期还明确提出了将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看法。

至于在教学方面，程先生受刘先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程先生到武大任教时仅 28 岁，刘先生怕千帆先生不能胜任，就在其讲课的教室隔壁悄悄地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程先生后来回忆起此事，深情地说道：“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



差得远。”(《刘永济先生传略》)程先生晚年来南大后，之所以能发愤著书，传授生徒，取得成就，个中原因，我们也许能从上述的话语中探知一二。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原载《光明日报》2018年6月9日11版)



深切缅怀唐明邦老师

郭齐勇

编者按：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易学家、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学院顾问唐明邦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5月4日驾鹤仙游，享年94岁。唐先生学德兼备，博古通今，乐天达观，宁静致远。学界闻先生仙逝，其门生故旧，或曾与先生论学、向先生问学者，或曾读先生之书、曾闻先生之嘉言懿行者，咸为悲悼，纷致悼念。新闻网特刊发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的悼念文章，向唐先生致敬，并表达怀念之情。





唐老师走了！2018年5月4日上午，我与几位同事去看望他时，他未能睁开眼睛，已经没有意识。医生说，癌细胞已转移到全身各脏器。他很瘦，已是皮包骨了。下午4时接到噩耗，唐师于3点30分驾鹤西去，享年94岁。哲人其萎，呜呼哀哉！

唐师是我最亲近、最尊重的三导师之一。三导师中的萧蓬父老师、李德永老师走了快10年了。在他们自己戏称的“三驾马车”中，萧师是灵魂，唐师当教研室主任多年，承担了一些具体的组织、落实的任务。



2001年，唐明邦(前排右三)、李德永与中国哲学教研室同仁

9天前，4月24日上午，我到中南医院去看唐师，他见我来了，很高兴，断断续续说了很多话。这次我待了近两小时，与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跟我讲，应重视中国哲学的四大观念：阴阳观、五行观、天人观、经络观。唐师对每一条都有论述，强调了应注意的方面，如五行，是关系而不是实体等。他边讲理论，边说材料，背了几段话，我知道是《易传》与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话，也与



他一起背了起来。据他身边的人讲，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口齿不太清楚了。但他当天的思维理络是清晰的，记忆力也还不错。他告诉我，他平日能背一些唐诗宋词等古今诗词名篇，当即背了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元月二十五号，武汉难得的雪天，校园飘着雪花，我与徐少华、孙劲松两教授一道，代表国学院师生看望唐老。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与我们聊得很好。每年春节前，我们都要提前给老先生们拜年。这次感到唐老师瘦多了，脸部尤其明显。

唐师是著名的金嗓子，上课时声若洪钟，声震教学楼。他重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深受同学们爱戴。他投身教书育人，对学生关怀备至。

唐师对我关爱、提携，不遗余力，师恩浩荡，恩重于山！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三导师合作指导的。唐师还是我读博士生时的指导小组的师长之一。我研究熊十力，唐师很是关心，出差四川、上海，拜访熊先生门生故旧与亲属，帮我联系、提供信息。我当青年教师时，唐师传帮带，亲力亲为，对我帮助很大。

唐师退休很早，1991年就退了，但他退而不休，著述研究，参会讲学，很是忙碌。他常给我打电话，我也常到他的府上拜访，他说的都是近期的读书、写作、外出的情况和一些学术信息。他很勤奋，著作多为退休后撰写。

唐师淡泊明志，低调平实。有一次他与我聊天，他说他的人生格言是“不争”。他实践《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精神，超越于名利之上。由于退休早，他的住房又旧又小，收入较低，待遇很差，比起我们这些学生，甚至再传弟子都差多了，但他毫不计较，心胸宽广，豁达大度。唐师坚持练气功，动功与静功都练，常常指导我们养生健身。唐师把他领悟的中国哲学的智慧与自己的身心修养密切地融成一体，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唐师是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史家，尤精于《周易》经传与易学史、道家道教和古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他的堂庑甚广，成就颇大。承唐师看得起，命小子为他的两部大作写序。小子斗胆应命。在这两



唐明邦部分著作

序中，我探讨了学术思想及贡献。兹附在下面（新闻网略去两序——编者注），聊表我对恩师的沉痛悼念与深切缅怀。

（作者系哲学系 1978 级校友，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5 月 9 日）



蝶楼旧时光

珞 言

湖滨青年教工宿舍与工学部交界处，有一栋外形古朴、像蝴蝶展开翅膀的建筑——蝶楼（居住时大家都叫它“湖滨一舍”）。

我是1991年上半年移居蝶楼的，因为快要生产了，再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很不方便。在单位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居所。之前，我与另两位也是研究生毕业的女老师共同拥有湖边六舍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那时住房的紧张状况是现在80后、90后根本想象不出的：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得两三人共住一间集体宿舍，只有博士毕业生（那时的博士何其少）才能分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些副教授一大家子也只得有一间住房，而那一间狭窄的住房里很可能住了祖孙三代四五口人——副教授及其子女甚至还得加上父母或保姆，房间里就用一块布帘子或别的遮挡物分开彼此。

当时，我们这栋三层蝶楼住的都是青年教职工，几十住户中只有少数几家有了孩子；整个二楼虽然住了十几家，也只有我及隔壁的隔壁有了小孩。

这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间规格、大小一模一样的房子，15平方米左右，洗澡、洗衣服、淘米洗菜、上厕所等都得到房子最东北角的公共用地去；倒是走廊很是宽敞明亮，因是单向的，另一面全是玻璃窗户，阳光能直射进来，不像以前住的湖滨六舍等筒子楼，走廊两侧全是排列紧密的一间间房子，即使白天走道也是黑乎乎的，经常只有一盏昏黄的日光灯在走廊顶部摇曳，映照着周围狭窄逼仄的空间；晚上一个人走在长长的、寂静的、昏暗的走廊里，都



会有些害怕。

由于有这么一个“超级宽敞”的走廊，住户们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公共空间，把锅碗瓢盆甚至碗柜、洗脸架、热水瓶等都放在了走廊上，做饭炒菜更是在走廊上进行了。那时，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秘密，也算得上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吧：大家的收入差不多，家产差不多，生活水准差不多。除了睡觉关门，其他时间家家户户都大门全开。一到做饭时间，就每家每户门口立了一个或两个人，在各自的弹丸之地边做饭边聊天：夫妻之间聊，邻居之间聊，甚至路过者也会停下来聊，即使手上还拿着洗衣盆、洗菜盆或别的什么生活用具，只要是感兴趣的话题就会毫不犹豫地驻足参与。家与家之间的距离相隔不到两米，谁家做什么饭菜大家都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端了饭碗边吃边聊一走廊。饭菜的香味伴随着大家的各种热聊及欢声笑语，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有一种别样的景致和氛围——亲切、随意、温暖，如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那时的我们，生活节奏缓慢而踏实，日子过得简单而温馨、质朴而快乐，没有太多的压力和欲望，更没畅想要怎么去赚钱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尽管来了客人时，不仅凳子甚至连碗筷都得找邻居借（家家户户基本上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用的碗筷），可以说是达到了颜回人生境界的一半：“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颜回不同的是，我们是自身拥有的物资太少。

那是一个纯真而又纯粹的年代，更是一个共情的年代，年龄相仿的我们，认识、觉知基本上在一条水平线上；那时甚至没有电视冰箱，大家除了睡觉、上班，就是在走廊这一公共场地活动。最大的乐趣就是围在一起聊天，相互贩卖自以为最好的东西——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音乐，等等。除了聊学习聊工作聊生活聊八卦之外，还互相起着各种不知所所以的外号：钢巴、锤子、小白菜、小雨伞之类。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走走停停，不急不躁；日常中，往往一件小趣事就能快乐半天，开心半天。大家拥有的物质很少，收获的快乐却很多！没有现在年轻人那种来自方方面面的莫名压力，也没有“成名要趁早”的宏大理想，就在安安静静中有条不紊



素地过着不惊惹岁月、也不虚度时光的平实小日子。

印象最深的是隔壁 L 老师家，因夫妻俩都是湖南人，酷爱吃辣，炒青菜都忘不了放辣椒。只要他们开始做菜，油炸干辣椒的香味就会溢满整个宽宽长长的走廊，然后就有人在这让人食指大动、胃口大开的冲天香辣中喷嚏连连。L 老师夫妇总是边做饭边用家乡话轻言细语地交谈着，特别是 L 老师，一会微笑着看看锅里炒的菜，一会再转身温柔地与身后打着下手的妻说着话。他们的饭菜里不仅仅有油盐酱醋及食材的本来味道，一定还有浓浓的爱的滋味。

从蝶楼的正大门出来，往左是一个陡峭的大下坡，往右则是一个更加陡峭的大上坡；往左是去湖滨食堂吃饭及打开水的地方，往右则是大多数人上班的必经之地。住在蝶楼的我们，得去上班，得去食堂打水、买饭，每天都要与这些大大的陡坡抗争无数回。

经常地，妻子们去上班时，丈夫们都会帮她们把自行车推上坡再折返；于是，那条陡峭的小路也就成了最温馨、最有爱的风景，满满的都是最质朴的浪漫：夫妻俩一人推着自行车一人在旁边相跟着，同样的节奏、同样的步伐，边走边聊，相互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物质生活的简陋贫乏，却遮掩不住大家身上、心里满溢的幸福。

儿子就出生在这简陋、拥挤却又充满了生机、朝气和快乐的蝶楼。儿子的到来，给这群大多刚刚成家的男男女女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欢乐——儿子成了大家的开心果，邻居们在紧张、枯燥的学习工作之余，因有了儿子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而格外开心、快乐，有事没事都会去逗他一会儿，并按自己的喜好给他取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外号，经常能听到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在叫着他们各自给儿子取的专属名字：金皓子、小皓子、肉肉、小胖……

儿子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跟自己玩，毕竟大家都要上班。那时走廊上可玩的东西很多：有堆放在各家各户房门前的煤球——这是他最大的游乐场，他经常拿筷子去撮煤球上的小孔，一些煤球也就在他的玩乐下支离破碎了，好在大家都很爱他，对他的破坏活动大多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儿子有时还会将邻居放在地上的开水瓶的盖子揭开，在那一探



究竟（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水瓶如果倒了、炸了，该是多么可怕而严重的后果）；他还会搬运走廊里脸盆架上的盆子，用来做自己的玩具。他总是一个人迈着小胖腿到处寻找、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玩具”，整个二楼长长的走廊就是他的乐园和天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喜好折腾，没有人争抢，也没有人阻止。邻居们都用爱的目光沐浴着他、呵护着他。可以说，那时的儿子真的是集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因为，他是大家平凡而有规律生活的一个意外。

在这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环境中长大的儿子，大方、热情，不怕场、不认生，跟谁都能玩，到哪都能玩，因他从小就见过“大世面”了——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们，现在大多已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有的成了学校领导，有的成了著名教授、某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了知名公司总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演绎着最好的自己。

那时的我们，在煤气用完又找不到地方加气的情况下，做饭就得烧煤球了。那时煤气供应紧张，除了那些有煤气户口的可保证供应之外，我们这些没煤气户口的年轻人，大多只能靠碰运气了，有时找熟人开后门灌一瓶，有时想方设法到某处弄一瓶。那时的煤气户口有两种：一种是武汉市的，要到华中师范大学（那时叫华中师范学院）旁的一个站点去灌煤气，只要 2.5 元一瓶，我周围的同事里就有一人享有这一特殊待遇，据说他是因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只要一个孩子，武汉市政府奖励的；另一种是学校的，就在学校煤气站（现在九区所在地）灌煤气，10 元一瓶；我们这些“打游击”的只能灌议价气，20 元一瓶，且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灌不到。那时煤气是彻底的紧俏商品。

儿子的出生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我在住院生产之前参加了学校有关部门组织的煤气知识竞赛，竟然得了一等奖，奖品是 10 罐煤气。在产房听到同事告之这一特大喜讯，真是高兴、激动得不能自己——这意味着我可以至少一年不用烧煤球了，也不用到处求人灌煤气了。只可惜高兴来得突然去得更快，不久后同事就告诉我，10 罐煤气被相关人员换成了 100 元钱的奖励，这意味着我即使能顺利在学校煤气站灌到煤气也只能灌 5 瓶了。于是，我人生第一个“大



奖”，在聪明智慧的某些人的操作下，就变成了五瓶还是未知数的煤气（其实，当时的100元已是巨款，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了几元，只是那时的煤气实在太稀有、太珍贵了）。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一晃，儿子都博士毕业了。一次，儿子从美国回来，我们一起站在曾经居住过的蝶楼前回忆着他小时候的种种过往，他竟然基本上没印象了——毕竟，住在这里的他确实太小了，这段岁月没能在他记忆里留下太多的痕迹。

一次，正在校园低头疾走，突然听到一人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抬头之际不禁愣住：20多年未见的邻居F先生夫妇正微笑着站在不远处注视着我。他们刚从美国回来，在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就喊出了我的名字。我注视着他们，陌生而又熟悉。聊起在蝶楼做邻居时的件件往事，大家一下就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回到了彼此熟悉的情境，仿佛从未分开过，仿佛这20多年的岁月只是一个瞬间，有种“原来你还在这里”“原来是你”的亲切感、熟悉感——或许变了的只是各自的容颜，我们的心却有一部分仍停留在那里。在最美年华里经历过的人和事，被岁月酿成了最珍贵的回忆，谱写成了最难忘的华彩乐章，在记忆的长河中不时泛起阵阵涟漪。离开武大赴美时，他们的儿子才刚刚出生，现在竟然都大学毕业了！

时光惊艳了过往的岁月，明媚了曾经的青春。人生能相遇在最美最好时光，是上天赐予的缘分；历经万水千山之后仍能相视一笑，说着“原来是你、好久不见”的“废话”，是上苍的成全。我们心里永远是对方最美的模样，有些东西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或消失：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一起站在走廊里炒菜做饭、聊天的情景……它们随着时间的逝去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记忆最深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就会全部苏醒。

现在的蝶楼已非当年，除了外表没变（应该是整旧如旧的结果，一看就是很好地修葺过的，且旁边又建了一组长长的新楼），内部结构全变了，已被改造成自带厕所的、标准舒适的一室一厅；那长长的走廊干净整洁、宽敞明亮，没有了任何杂物；走廊上长长的透明玻璃窗都装上了厚厚的、典雅精致的窗帘，据说这里已成为



外国专家公寓用房。住在这里的人有福了，远离喧嚣，环境幽静，有种世外桃源之感。这里适合冥想，适合做学问，适合思考人生：鸟儿们一大早就将你唤醒，带着晨露的、新鲜清亮的声音格外悦耳动听；风儿们鼓动着翅膀，不停地送来远处的景致——那散时薄如蝉翼、聚时如丝绸般柔滑的炊烟，在仰头可见的天际飘浮、挪移……

看着二楼那宽宽长长的走廊，透过那些飞舞着的、由细细碎碎光影组成的变幻图案，穿越时光隧道，仍能清晰地看到儿子那奔跑、挪移的小小身影，看到曾经年轻的自己和邻居们在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一幅幅画面……

旧时光就像包了浆的稀世珍宝，只要揭开一点点外皮，内在的珍贵和价值就会透过这小小的缝隙折射出来，散发出专属的、耀眼的绝世光华。



阳光将树叶的影子投射在蝶楼上，岁月静好(王志敏摄)

注：据校史资料记载，蝶楼是1931年10月开工、1932年10月竣工建成的女生宿舍，建筑面积1595平方米，造价6.38万元，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由德国建筑师理查德·萨克瑟设计，永茂隆营造厂建造，位于校园东北部的团山。该建筑平面布局独具特色，有“蝶宫”“东宫”“月宫”“白宫”等美誉。扩建后建筑面积2565平方米。维修工程于2015年6月开工，10月竣工。施工内容包括内部装修、外立面改造、屋面翻新、供电、供水、消防系统、网络通信系统以及室外排水及道路等，改造后主要作为外国专家公寓用房。



老去的时光

李福信

一转眼，从武汉大学毕业，快 30 年了。

白驹过隙，不自觉就想起了过往，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想起了曾经熟悉的旋律。在想起的温馨里，就想起当年的同学了，就想起毕业季那个清纯的故事了。

1989 年的暑假，我们毕业了。

一天中午，独自在桂园食堂吃饭，对面一个美丽的女孩看过来。我认识，是同院系国际金融班的桃生君。因为生性害羞，大学四年我没有与桃生君说过话。毕业了，再不说，以后再不会有机会说了，就搭讪了起来。那时的桃生君，好像是分配到了湖北省农行，心情快乐无比，就如桂园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着。

与桃生君就这样熟络了起来。

过了不久，我联系了青岛啤酒厂，那边同意我去工作。准备去的当口，院系管分配的郑老师告诉我，汉南区税务局想要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愿意去吗？

愿意愿意。

愿意就去面试吧。

那时的汉南区，在长江上游，有些远。中午吃饭时，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桃生君。快乐的桃生君很高兴，一迭声说：去得去得；侠义的桃生君很豪情，接着说：我陪你去，我陪你去。

吃过了饭，我们就坐班车出发了。窗外是满目葱翠的田园风光，身旁是侠义情怀的美丽同学，那无边的烦恼倒也随风飘散了。

一个多小时后，汉南区就到了。正好是下午上班时间，我和桃



生君直接去了区税务局。一个比我大些的男办事员招呼着我们。不一会，人事科的科长出来了，是一个干练和善的大姐。大姐微笑着看着我们问：小伙子，欢迎来到汉南区税务局，你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税务事业吗？

我说：愿意愿意。

大姐说：你身体壮实吗？

怎么没来由问这个啊，我在心里纳闷。一旁的桃生君抢着答：身体棒着呢。从事税务工作，与身体壮实有什么关系吗？大姐说，小伙子，你不知道，到下面去收税，会经常碰到使横耍泼的无赖之徒，不能文质彬彬，有时要动武打架的啊。

我大学体育学的是健美专业，身体好着呢。

那就好，那就好。

面谈结束了，大姐很满意地说，明天就去大学提你的档案，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快下班了，大姐热心地吩咐那个办事员安排我们的食宿：你去给这两个同学到招待所安排一个房间，再陪他们吃晚餐。我一下就红了脸，桃生君也红了脸。我说：要不得要不得，我们要两间的。

怎么啦，不是你女朋友吗？

没有呢。大姐和办事员开心地大笑起来。

吃过了晚餐，我和桃生君去到了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田野漫步。我没有了来时的豪情壮志，心里一直在打鼓：刚毕业参加工作，就要动拳劈腿，与我大学教育的文化修身、经天纬地的理想相差甚远啊。桃生君看出了我的心事，想留下来吗？我说，不大想留了。

那你下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不好意思说，人家那么热情。

那怎么办？明天上午他们就要到学校提你的档案了。

那我们连夜赶回学校去，抢在他们明天来提档案前，把档案发到青岛啤酒厂去。

好啊，我们连夜赶回去。

可是天快黑了，班车也没有了，怎么回市区去呢？



我们去公路旁招手拦小车吧。

那时的小汽车很少，我们望眼欲穿。终于来了一辆，我们使劲招手，小车停了下来，一看我们俩就开走了。又来了一辆，我们使劲招手，车子停了一下，看到我们两个，也开走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永远拦不到小车了。拦不到小车，我们今晚就回不到学校了。回不到学校，明天税务局就要去提我的档案了，我就要与使横耍泼的无赖之徒动拳劈腿打架了，怎么得了！

桃生君看我心急，也很着急。急着急着，桃生君就说，我们两个目标太大，干脆你躲到那棵树后面去，我拦到小车后你再出来，好吗？我知道，桃生君想使美人计了，也只有美人计，我们才能回得去了。

我就红着脸说，要得要得。

过了不久，又一辆亮着雪白灯光的小车驶过来了，我忙闪到了树后。

袅袅婷婷的桃生君款款迎上前去，优雅地扬起了纤纤玉手。

吱的一声，小车停了下来。

小姑娘，有什么事吗？

我想搭车回市区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上车吧。

可是、可是我还有一个同伴呢。

我急忙从树后走了出来。

司机回过头来说：这是我们区委书记的小车呢。

书记沉吟了一下，说，都上车吧。

桃生君上了车，我红着脸正准备跟在桃生君后面上车。多嘴的司机说，小伙子，你会挤着书记的，坐前面来吧。

夜幕下，一朵红云飞上了我的脸颊。

只是，珞珈一离别，从此各西东，再也没有见过桃生君了。

人生易老天难老，白驹过隙沙漏空。多少年过去了，每逢毕业五年十年，总有同学吆喝，总有同学倡议，回武大去，一起聚聚。可是，讲讲容易，想聚聚却难了。在这场岁月的旅行里，我们看山



看水，我们看天看云，我们看到的都是美好的风景。在一路的风景里，看着看着，不经意地就温柔了岁月，感动了时光……

(作者系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 1985 级校友)



与苍生同梦

——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朱英国

李国龙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都梦想着粮食丰收，可总是不尽如人意。我读中学时挨过饿，看到过饿死的人；读大学又遇到国家3年严重困难时期，我和许多学生都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这些经历，坚定了我一辈子搞粮食研究的决心。”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遗传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生前说过的一段话。



朱英国



心系苍生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朱英国培育的“红莲型”与袁隆平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他培育的“红莲优6号”“珞优8号”等品种，在国内外累计推广1亿多亩。他致力于两系杂交稻的研究与推广，救两系研发于危难，探索两系杂交稻的理论奥秘，选育出一系列籼、粳型光敏核不育系，两系品种进入大面积推广……

“水稻候鸟”：带着稻种，一年飞过三个夏天

朱英国被称为“水稻候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秋天，朱英国就如同候鸟般从江汉平原来到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又转到海南育种，直到第二年春天，通过加代育种，来加快新品种的选育步伐。

他与一株来自海南的“红芒野生稻”结缘，一结就是一辈子。1972年，“红芒野生稻”和“莲塘早”杂交而成的“红莲杂交稻”的前身进入第一次试验。秋风瑟瑟，在武汉大学不保温的温室里，秧苗被冻得像怕冷的人一样猫着腰。

朱英国心急如焚，就搬来烧开水用的火炉。担心出意外，他就日夜坚守。坚持终于有了回报，试验出现了期许的现象，但这又累又“土”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朱英国开启了自己的候鸟人生。

1972年11月20日，同住一室的朱英国和邓海铭，作为湖北最早的试验小组成员之一，即将踏上南繁之路。朱英国的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他与邓海铭的对话：

邓：英国，我们这一去得搞很久吧？

朱：不是临时性任务，要长远考虑，短则十年八载，长则一辈子。

邓：那我们以后不能回家过年？

朱：春节正值海南稻苗返青，需要看守，肯定回不来。

……

从湖北武汉坐40小时火车硬座到广东湛江，下车后换几小时汽车到海安码头，住宿一夜，坐两三个小时混装轮船横渡琼州海



峡，再从海口坐约 10 个小时汽车，才能抵达海南陵水县椰林公社。

路途的遥远才只是开始

试验田的活儿又苦又累又细：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海南太阳又大又毒，每次下田，全身湿透。

守护试验田，更是头等大事。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朱英国和同事只得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隔网、撒鼠药、放夹子、持长杆，轮番值守……

几番冬去春来。朱英国和科研人员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红芒野生稻”和“莲塘早”多次杂交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红莲”第一代终于诞生。这项成果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红莲之父”：“红莲”成为水稻不育系另一极

1966 年，日本科学家选育出“包台型”三系配套，但因为存在科学缺陷没能走向推广应用。而真正将三系杂交应用到大面积生产中的，是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朱英国的“红莲型”。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红莲”从试验成功到走向大田生产用了 30 多年。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国内外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 1 亿亩。其中，“珞优 8 号”最高亩产达 876 公斤，跨入“超级稻”行列。“红莲”不仅惠及 5 亿中国农民，而且正造福多国人民。

2017 年 12 月初，记者到武汉采访时，朱英国院士团队的高级工程师朱仁山刚刚收到“红莲优 6”在巴基斯坦的生长情况：“今年巴基斯坦的天气变化多端，但‘红莲’经受住了考验，长势稳定，没有受到影响。”

除了产量高、米质好这两个“好稻种”的普遍标准外，红莲型杂交稻适应性强的优点，挺直了“红莲”走向世界的腰杆子。红莲型杂交稻不仅在我国长江流域、四川盆地、华南地区和河南南部均



能种植，而且连续多年在东南亚、非洲等多国种植，比当地品种增产 20%~50%，特别是在天气极端变化的年份，“红莲”的产量仍能保持稳定。

在朱英国的科研版图里有“三大攻关”，“红莲”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马协”和“两系”。

20 世纪 80 年代，朱英国就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 年 3 月，经过大海捞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中发现了马尾粘中的一棵不育株。经过 3 年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马协 A”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马协型”杂交稻的突出特点是米质优，目前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 2 000 万亩。

水稻界专家认为，“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4 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由全国 16 个单位、20 多个省市、数万科技工作者经过 30 多年协作攻关完成的项目实至名归。朱英国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两系”的原创发明人石明松，为了搞两系水稻近乎倾家荡产。朱英国在这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多方努力，湖北省成立了“两系”攻关协作组并设立了专项经费。1988 年，涵盖朱英国选育成果的第一批“两系”光敏核不育系通过国家鉴定。此时，朱英国决定把“两系”推向全国。许多单位纷纷从湖北引进“两系”不育系开展后续研究，随后就有了“两系”成果在全国的遍地开花。

从 1980 年开始，朱英国始终坚持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不仅选育了多个通过国家鉴定的籼型光敏核不育系，还对育性稳定性、育性的遗传行为、光敏基因的定位等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

2013 年 7 月 2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期间，专程前往鄂州水稻基地视察，当听说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良种推广种植效



果后，总书记十分高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亦师亦父”：中学生、农技员成长为教授、高工

朱仁山是武汉大学的高级工程师，在朱英国团队里主要承担品种选育的任务，“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这些响当当的品种都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

最初，朱仁山来到朱英国团队时仅有中专学历，但他韧劲足、能吃苦、爱学习。20世纪90年代，因为纯度这一项指标存在问题，“红莲”研究曾一度陷入困境，朱仁山坚信“红莲”肯定能行，就坚持一直试验，最终攻克了难题。朱仁山说：“朱英国老师看我有坚持的毅力，就坚定地从方方面面支持我，当我遇到困难时，就与我一起分析原因，当我有进展时，就及时指导我下一步的方向。”

2005年，在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杨代常，接到了朱英国的电话：“你该回来了。”杨代常立即卖掉房产、放弃股权和丰厚待遇，毅然回国。回国后，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2014年，杨代常的科研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975年，在湖北沔阳进行杂交水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很执着，是个好苗子，于是给他送去科普书籍，悉心指导。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极力推荐下，初中肄业的杨代常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水稻研究比较原始、条件差，有的环节甚至比农民还苦，当时跟我干的几个中学生，不仅能吃苦，而且爱学习、爱思考，比较聪明并且都有梦想。”朱英国曾这样说。他爱惜人才，不论出身，成就了别人的梦想，也为我国水稻研究培育了栋梁之材。

目前，朱英国一手带出的“红莲型”杂交稻研发队伍形成了3



支力量：以他的学生何光存、杨代常、胡骏为代表的基础研究队伍，以朱仁山、余金洪为代表的应用研究队伍，以及由深圳一家民营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市场推广队伍。

朱英国先后培养了 100 多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有的成为国家和省级科研单位的科研骨干，有的在大学里担任教授甚至走上院长的工作岗位，还有的在农业部门或党政机关从事管理工作。

2017 年 8 月 9 日，朱英国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他为国家粮食安全奋斗了一生，而他的学生们依然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稿件来源：《农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8 日 01 版）



解不开的珞珈情结

——记我的老师廖孟扬、覃家美教授

李亚相

自1962年9月跨入武汉大学至1968年9月毕业(因“文革”延迟)离开珞珈山的6年时间里,能结识物理系廖孟扬、覃家美老师,并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后来只要与廖老师一起遇到不怎么熟悉的人,廖老师总抢先介绍,这位是我的校友、同事;我急忙尴尬地说:“不,他是我老师,我是他的学生,我俩也是老乡。”我与物理系廖孟扬、覃家美教授之间是师生情、校友情、老乡情,还是兄弟姐弟情?这个交织缠绕在一起的“结”,我一直没有解开。

一进武大,在物理实验室里首先见到了一位笑容可掬、举止文雅、知识渊博、和蔼可亲的美女老师覃家美。后来,听老乡说,她是我们物理系最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廖孟扬讲师的夫人(当年他俩是同级同学、又双双毕业留校任教)。廖孟扬老师是我的老乡(同一区、我的初中学校距他老家仅2公里),我自然对这对出类拔萃的物理尖子、现任老师伉俪倍增敬仰之心和老乡的亲切情感了。

穷山村里出来的学生能在著名的大学里见到穷山沟飞出来的“金凤凰”廖老师,很是庆幸。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到荆门市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学校竟将廖孟扬老师派到我们班在同一公社工作。这样,我们俩就有了更多交流和了解的机会。

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周日)我们就到一区十号(现改称珞珈山6栋)廖、覃老师家里去“拜访”,其实是企望老师、师母下厨给我们做点好吃的改善生活。“文革”停课期间,我们这几个“逍遥



派”无所事事，便成了廖、覃老师家里的常客，隔三差五地钻进老师家里去闲聊。我同级同学、老乡万高良有一次听到武斗枪声浑身发抖，不顾三更半夜，匆忙地跑到廖、覃老师家去敲门躲避，从此，这里便成了他的“避难所”。

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恢复刚刚起步，缺衣少吃是普遍现象。我们几个来自穷山沟的大学生，经常穿着补丁衣服到处跑；覃老师对我们这几位寒酸学生一点也不嫌弃，总是满面笑容把我们迎进家里端茶送水，使我们无拘无束。寒暄几句后，她便乐呵呵地走进厨房选料做饭，与廖老师一起忙着烹调家乡菜、特色菜……

酒足饭饱的我们兴奋不已地沿着珞珈山半山路往学生宿舍走，有的说廖老师能有国色天香的覃老师作伴侣真幸福；有的说覃老师那么贤惠，从来没有瞧不起我们，我们有福了；有的说我们在远离家乡的武大读书，能遇到老师的关怀和爱护，真是三生有幸。

1968年9月，我们毕业分配就要离校走向工作岗位了，就要与武大、物理系说再见了，就要与亲密无间的廖、覃老师一家分别了，不舍之情难于言表，经常深夜久久不能入睡。廖、覃老师聪明伶俐、漂亮迷人、天真活泼的女儿小芳和儿子小樑，每次见到我们都叔叔长、叔叔短地叫得亲切，姐弟俩还在学生宿舍与我们一起住过一晚呢。如今听说我们要离开了，好像也有了心事，一下就失去了平时的天真活泼。廖、覃老师提议与我们几个老乡到松柏照相馆照张相做纪念，于是就有了离别前廖、覃老师全家与我们几个老乡合影的珍贵照片。

我们分别在全国不同地方报到“工作”了，廖、覃老师家里因缺少了我们的“打扰”而不习惯了。1969年春节前，专门给在湖南长沙的我打电话，邀我到他们家里过分别后的第一个春节。接到电话，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虽然离别学习生活六年的珞珈山仅半年，可再次看到母校的一草一木仍特别亲切、特别温馨。到了廖、覃老师家，又听到小芳、小樑那亲切甜蜜的“叔叔”称呼，好像是回到了久别多年的自己的老家里，心里暖暖的。两位老师犹如自己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周全悉心地关心照料我。我在亲密无间、宽松愉快的温馨家庭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从此以后，我与廖老师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86年，武汉大学在深圳成立深汉公司，随后又联合成立了深珞医学图像研究所。廖孟扬老师是带领研究生进行医学图像研究的导师和领衔人，常常奔波于武汉与深圳特区之间。如遇广州有事或转车需要，廖老师就直接住在我“家”里，像兄长一样，毫不嫌弃我简陋、寒酸的住室。我因公出差到武汉，甘愿让宾馆房间空着，也要钻到廖、覃老师家里去住宿。

廖老师在深圳医学图像研究中取得了卓著成绩，受到了卫生部重视，陈敏章部长亲临视察。当年深圳市主管科技工作的朱锐宁副市长更是求贤若渴，捎话说已为廖老师购置好了一套三室二厅的住宅，上下班接送的车辆都安排好了，就等廖老师举家南迁。廖老师谢绝了，说：“我对珞珈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深厚的感情，我的根基在武大，不可能弃她而去。”回到武大后更直白地与刘道玉校长说：“我生是武大的人，死是武大的魂，我绝不会离开武大，我终生会以‘校兴我荣，校衰我耻’为宗旨，为武大的发展繁荣增光添彩。”1979年，刘道玉校长先后“三顾茅庐”，请廖老师“出山”担任空间物理系主任和无线电信息工程系主任，均被婉拒，廖老师只潜心专注于一生钟爱的科研工作。

2010年元月，小芳趁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派她到广州开会的机会，把二老带到了广州。先是在阔别多年、定居番禺的覃老师胞妹家里欢聚，之后在广州市内与亲朋好友游玩，后安排一天时间到我家与几位老乡学生交谈并一起到云台花园览景游玩。

2011年春节期间，往常互相问候、互祝节日快乐的声音中断了。直到春节后很长时间，廖老师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打不通。我感到意外和不安，费了很大劲才与廖老师女儿小芳联系上，才知覃老师已于2010年12月突然患病，经抢救无效不幸辞世了。

平时连感冒都少的覃老师，得病住院仅一个月时间就永远离开了这个温馨的家和亲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向豁达、坚强、大气的廖老师如遇五雷轰顶，心如刀割。看到卧室里放着的爱妻的衣物、用品，习惯坐的椅子，总是情不自禁地悲从中来。儿子小樑远在美国，女儿小芳就将心灵饱受创伤的爸爸转移到同济医科大学



暂住，暂离睹物思人的环境。

惊悉恩师覃家美老师的噩耗，我万分震惊，万万想不到一年前在广州与覃老师的分别竟成永别。我于2011年4月9日从广州赶到武汉，在同济医科大学小芳简朴的居室里见到了恩师廖孟扬教授。

在陪老师时，我建议他把自己小时、求学、深造所遇到的沟沟坎坎，组建和睦家庭、成功培育出令家乡人称赞的“一家五教授”的事点点滴滴写下来，一是纪念爱妻一生的人品、功德，二是让老家乡了解他在外奋斗一辈子的经历，给子孙后代留点“遗产”。此话一出，廖老师立即回想起覃老师生前提到过，病床中还交代过的让他写回忆录的事，欣然答应了。



1968年9月，我们毕业离校时与廖孟扬、覃家美老师一家合影。前排右起：廖孟扬老师、廖芳、李亚相、廖樑、万高良；后排右起：覃家美老师、陈彩良老师、李佑良、孔桂祥

第四天我离汉返穗后，廖老师立即翻箱倒柜寻找尘封多年的历史资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回忆往事的写作中。每写完一个片段，就传到我的邮箱里，由我进行修改。经过一年多坚忍不拔



的书写，初稿终于出来了。为了写实他儿时的事件，我还专程到廖老师的老家采访他儿时的玩伴，帮助拍摄他儿时住过的房屋照片等。经他再三斟酌，书名定为《吾生若水》，副标题“此书献给故侣——覃家美教授”。又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核正，此书终于在2012年12月付梓出版了。当廖老师拿到这部装帧大方、制作精美、时序清晰的回忆录时，兴奋极了。通过写作这部回忆录，廖老师从痛失爱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基本回到了以前正常的生活轨道。如今85岁高龄的恩师每天坚持有节制的饮食、有规律的运动，精力充沛，身体康健。幸哉，幸哉！

期待恩师期颐（100岁）之年，回武大给他祝寿，让珞珈山作证！

（作者系物理系1962级校友）



曾经在武汉大学工作学习过的宜昌名流们

李云贵

武汉大学是一所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学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该校源自 1893 年张之洞创立的“湖北自强学堂”，其后经历了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嬗变，1928 年，正式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在武大的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的院系调整合并，不断发展壮大。百廿余年来，在武汉大学不同阶段也留下了宜昌先贤、名流们的足迹，他们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主要有以下这些人士。

一、谈锡恩(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谈锡恩(1874—1951 年)，字君讷。宜昌兴山县咸水村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光绪十五年(1889 年)，经府试名列拔贡，被选入武昌经心书院就读。1901 年转入两湖书院。次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普通班。越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博物专科。1908 年毕业回国，历任两湖优级师范博物专修科堂长、湖北学务处咨议。宣统元年(1909 年)调京，任学部编辑局编辑员、北京优级师范学堂生物教员等职。1912 年，任教育部佥事、视学。1918 年被教育部委任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五四运动后，重回教育部任视学兼北平大学博物学讲师，后改任北平大学文牍。



1931年8月，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他重视藏书建设，接管崇文书局图籍万余卷、版片7万多块；省府转外交部赠送《大清会典》3箱。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亲手编辑《湖北省图书馆图书目录》，收集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物9000余种，《湖北省立图书馆旧籍目录》线装古籍6200多种，84000余册，编制了《古文图书目录》和《日文图书目录》。新籍目录用美国杜威图书馆分类法；线装古籍目录沿用四库分类法。于蛇山南麓新建馆舍，同时创设图书馆流动书库。1934年筹建新馆舍，组成建筑委员会，李书诚任主任委员，谈锡恩任委员会委员。新馆于1936年落成，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可藏书40万册，阅览室座位300个。

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谈锡恩精心筹划省图书馆西迁。因运输车船紧张，经费短缺，启运后沿途转折，先由轮船运达宜昌，再转木船运至秭归新滩。为避日机频繁空袭，确保图籍、版片的安全，选择兴山游家河岩洞保藏。直到1941年3月，古籍珍本及版片才全部运到恩施。抗日战争胜利后，谈锡恩退休还乡，于1951年冬月因病逝世，享年77岁。

二、张继熙(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师范大学校长)

张继熙(1877—1955年)，号春霆，又名张勋，出生于枝江县(今属宜都市枝城镇)一个书香世家，幼时在私塾就读，15岁考中秀才，被选送到武昌经心书院学习，24岁考中举人。张之洞将其视为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被选为官费留日生，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湖北省学务所实业科长兼两湖师范和文普通中学教员、奉天省(今辽宁省)候补知府、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兼优级师范国文教员、教育部普通司司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湖北省政府视察、湖北省通志馆总纂等职，撰有《张文襄公治鄂记》《日内瓦三国海军会议始末记》《异字考》等。1912年，为培养家乡青年学生，他联合原荆州府所属七县旅省人



士创办私立武昌荆南初级中学，兼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三、沈祖荣(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 武汉大学教授)

沈祖荣(1883—1977年)，字绍期，宜昌城区人，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之父”。沈祖荣的祖辈是长江边的纤夫，父亲在江边经营小餐馆。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沈祖荣进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勤杂工。光绪二十七年，被推荐到武昌思文学校读书。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留校任图书馆馆员。光绪三十三年，被推荐到文华大学学习，并获文华大学学士学位，在韦棣华创办的文华公书林工作。1914年，受韦棣华的资助，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习。191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1917年，回国后继续在文华公书林工作，并发起席卷全国的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韦棣华与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商议创办文华图书科，沈祖荣除了图书馆的工作外，还兼任教学工作。1925年，沈祖荣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担任主要职务。1929年，沈祖荣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同年，沈祖荣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图书馆专业人才。1952年，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改为图书馆专修科，他继续任教，后病逝于江西庐山。2013年10月，武汉大学出版《沈祖荣文集》，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四、曾昭安(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图书馆馆长)

曾昭安(1892—1978年)，字斌益，祖籍江西吉水。武汉大学教授、现代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我国颇有影响的数学史和历算专



家，也是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还先后担任过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和招生工作负责人等职务。祖父经商于湖北宜昌，遂入宜昌籍。幼时在宜昌公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考入武昌文华书院中学部，接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15年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物理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回国，又于当年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数学，与杜威、史密斯同学。1919年加入美国数学学会。1922年加入中国科学社。1925年获理工博士学位，两次获美国数学论文奖金。同年回国任国立武昌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

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教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武昌中山大学改为国立武汉大学，决定在城外珞珈山建校，曾任筹备委员会委员。曾在武汉大学任教50年，同时担任中国数学学会理事，武汉市数学学会理事长、主席，武汉科联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务委员。通晓英、法、德、日等国文字，长于数学、物理、天文，对中国古代数学史、古代天文学、太阳系天体力学和中国历法造诣亦深。在武大主讲几何、行列式、热力学、积分方程、超越函数、高等微积分等课程。其记忆力超人，能背诵圆周率两百多位数。

五、郭霖(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主任)

郭霖(1894—1942年)又名景祥，字泽五。当阳县锦洪乡郭家畈人(今当阳市坝陵街道坝陵村人)。早年毕业于唐山工学院。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学，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造船专业。1924年，获海军建筑学士学位，后入该校研究院任潜艇研究员。1926年，受聘于英国威克斯造船公司，任造船工程师一年。1927年，郭霖毅然辞职，回到祖国，任福建马尾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机械设计师，主持轮机设计。1929年，武汉大学成立工学院，校长王世杰聘他任工学院教授。1933年，武汉大学设立机械工程系，他协助工学院院长邵逸周致力于机械工程系的筹



建工作。1934年，他任机械工程系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他任迁校委员会委员，负责校舍的维修管理。他的教学被誉为工学院的“工牌课”，特别是他的材料力学课讲得很新颖，既有实用性，又有前瞻性，为工学院热门专业课。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他为部聘教授。他还兼任《工科》季刊编委会主任。他在繁忙的教学中，还主持了许多具体的设计工作。1936年，他设计的“建阳轮”，行驶在汉口与武昌之间，是当时公认为设计得很科学的一艘渡轮。他撰写了很多学术论文，在报刊发表的有《潜行艇》《巡岸艇与国防》《建阳轮及其主机设计概要》等。1942年2月20日病逝于四川乐山，享年48岁。

六、沈刚伯(就读于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刚伯(1896—1977年)，名汝潜，字大烈，1896年12月4日生于宜昌市夷陵区梅花村。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1931年起，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自幼受留日回国的父亲沈莘庵之教诲，读毕《左传》《国语》《国策》《国礼》《礼记》后，11岁入湖北方言学堂，1910年毕业后，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1917年毕业。1924年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

1927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的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里专门讲授如此繁多世界历史课的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他还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

1942年秋，他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的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在国内大学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历史系。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仍在中大历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刚伯应教育部长朱家骅聘请同赴台北协办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7—1972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同时，主持东亚各国汉学家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活动。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7年7月31日，沈刚伯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82岁。

七、朱裕璧(湖北省立医学院院长)

朱裕璧(1903—1986年)，号楚珍，出生于宜都县五眼泉乡许家台子一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过目不忘。1917年考入宜昌彝陵中学。1921年考入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曾与恽代英一起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1929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1934年，他的论文《泌尿系结石X光检查与化学检查之比较》获得通过，被授予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并被接纳为德国外科学会会员。同年，朱裕璧回到祖国，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1935年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外科研究员。1937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外科教授。1939年回到湖北恩施主持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部前身)的筹备工作，并担任湖北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直到1957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医学教育和科研的骨干。

朱裕璧治学严谨，在外科学及病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多次在德国病理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1970年以来，他从事当归注射治疗腰腿痛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国际上也属首创。目前这一疗法能治疗好几种国内外尚无法治疗的疾病，远期疗效稳定。1981年，他写了《当归注射疗效观察十年初步总结》，在医学界受到重视。

朱裕璧是湖北医学院首任院长，为创立、建设湖北医学院和促进湖北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还历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省名盟常委、省政协常委、湖北医学院顾问、国家高教二级外科教授。1986年在武昌逝世，享年83岁。

八、胡国瑞(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国瑞(1908—1998年)，字芝湘，宜昌市当阳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唐诗、宋词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并跻身于武大“五老八中”的“八中”之列。胡国瑞自幼爱好文学，在上高中和大学时，就细心研读经、史、子、集部中的许多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36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鄂西、川东各公、私立中学(包括湖北联中建始中学分校)任国文教员。1946年回武汉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还曾任该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三至九世纪研究室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所长、校务委员会委员。20世纪50年代，曾到北京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他曾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湖北省作家协会顾问、湖北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武汉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他不畏寒暑、辛勤耕耘数十年终有建树。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60余年里，他培养了一批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编著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作品选》《唐五代宋词选》《李白研究》等多种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学术专著。他发表的系列学术论文，汇集成《诗词赋散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他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有些论文还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九、刘真(武汉大学党委第二书记)

刘真(1913—2009年)，原名绂传，号公黼，出生于宜都县陆



城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他先后就读于宜都县立高等小学、县立尚实中学附小、湖北省立第八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选为湖北省立八中救国会干事，与同学一起掀起荆州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1933年3月，刘真在上海加入共青团，从事刻印革命刊物、散发传单等工作。

1936年秋，刘真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中国青年救国团。1938年3月，刘真在宜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中共宜昌市、市政府成立，刘真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1951年8月以后，他先后调任中共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在武汉离职休养，后病逝于武昌。

十、吴林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林伯(1916—1998年)，宜昌市宜都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后入复性书院，为马一浮、熊十力先生弟子，曾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文科主任，上海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中华教育社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讲师，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吴林伯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范围包括经学、诸子，以及《文心雕龙》研究，而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点。已成书手稿包括《周易正义》等27种，其中《论语发微》《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庄子新解》《老子新解》《文心雕龙义疏》在吴林伯生前和去世后先后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吴林伯手书影印本《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论文》。《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约40万言，讨论了近80个重要理论问题。1998年8月，吴林伯在武汉大学病逝，享年82岁。



十一、王明庥(就读于武汉大学农学院森林系, 杰出校友、院士)

王明庥(1932—),湖北枝江人,著名林木遗传育种学家。曾就读于张继熙创办的枝江荆南中学。1951—1953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53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华中农学院),1962年莫斯科森林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84—1993年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教授,中国林学会第五、六届常务理事以及第七届副理事长,兼任国家技术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林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现任浙江林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及森林培育省级重点学科学术顾问,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林业专业评委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科技委员会常委。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王明庥院士长期从事森林遗传学和林木遗传改良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实用的《林木遗传育种学》,主持《平原区速生阔叶树种良种选育》《美洲黑杨胶合板材纸浆材品种选育》等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和国务院的表彰奖励。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主编教材和出版专著4本,在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由于他在学科建设上的成绩,1996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重点学科优秀学科带头人。2005年被评为第四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2011年2月获得了201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由于王明庥院士的卓越贡献,被学术界被誉为“中国黑杨之父”。

十二、潘垣(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机电工程系, 杰出校友、院士)

潘垣(1933—),湖北宜昌人,著名磁约束聚变技术和高功率脉冲技术专家。1951—1953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



系(1953年院系调整时并入华中工学院)。先后在二机部401所、585所和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所工作,并赴欧洲联合托卡马克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聚变中心工作。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国防科技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ITER)中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最早从事核聚变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中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主持和参与主持过三套聚变装置研制及另外一套装置的升级改造。在“中国环流器一号”研制中负责工程方案设计、总体电磁工程、脉冲电源及总控系统等,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重大技术难题。成功地将聚变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大型发电机氧化锌非线性电阻灭磁、电磁炮、补偿脉冲发电机等。获国家奖一等奖1项,院部委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专利10项,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发表论文近百篇。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被评为第五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2013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十三、于刚(就读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杰出校友)

于刚(1959—),湖北宜昌市人,著名运营管理学家。现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111集团(下有1药网、1诊、1药城,股票代码YI)董事局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1978—1982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康奈尔大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曾任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和座席教授。2003年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于刚是1号店联合创始人、荣誉董事长,卓尔集团联席主席。曾任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裁,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曾在2002年获得国际INFORMS协会颁发的Franz Edelman管理科学成就奖,于2002年和2003年两次获得国际工业工程师协会颁发的优秀研究奖和最佳论文奖,于2012年获得国际POMS协会Martin Starr生产与运营管理卓越实践奖。于刚博士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过80多



篇文章，著书 4 部，获有三个美国专利。于刚博士曾于 1995 年在美国创建了科莱科技公司。科莱科技在 2002 年被艾森哲 (Accenture) 并购。

于刚携夫人宋晓 2015 年 10 月为母校武汉大学捐赠 200 万美元，设立“于刚·宋晓奖学金”。据悉，这是武汉大学迄今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币捐赠。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樊锦诗与彭金章伉俪的故事

刘 畅

编者按：樊锦诗、彭金章伉俪，与武汉大学渊源颇深。自 20 世纪起，武汉大学的专家们就与由樊锦诗担任院长的敦煌研究院结缘。两院院士李德仁和妻子朱宜萱教授等人，设计并实施利用测绘遥感技术，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数字复原再造，让文化遗产在数字中永生。这项合作一直延续至今，2017 年 11 月 13 日，我校与敦煌研究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彭金章教授于 1963—1986 年在武大历史系任教，创办考古专业，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1986 年调敦煌研究院工作，负责莫高窟北区的考古课题，2017 年 7 月 29 日中午逝世，享年 81 岁。现转载一篇旧文，向樊锦诗、彭金章伉俪朴素深远的爱致以深深的敬意。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1938 年出生，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她从 25 岁扎根敦煌，潜心敦煌文物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 50 余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彭金章：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建者，后也来到敦煌，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建功卓著。

2014 年 3 月 4 日，刚刚获得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的 75 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又在北京代表她和丈夫彭金章，领回了由婚姻与家庭杂志社颁发的“和谐家庭·幸福榜样”奖牌。



从校园到沙漠，20 世纪 60 年代的爱情

颁奖典礼结束后，她特意给身在敦煌的老伴儿打了个电话：“老彭啊，奖牌我替你领回来了，上面写着：樊锦诗、彭金章当选第三届‘和谐家庭·幸福榜样’。”电话那头，老彭呵呵地笑个不停。

尽管在事业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是家庭类奖项，老夫妇俩还是第一次得到。樊锦诗惯常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她“只顾事业不顾家”，谁能理解这一对为了国家需要不得不两地生活长达 19 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呢？

没有誓言的校园爱情

1958 年，身材娇小的 20 岁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自己的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入学不久，她就闹了几次笑话：洗的衣服忘了收，几天之后不翼而



飞；过了不久，竟连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丢了个差不多。父亲给她写信：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上海的家里一直有保姆，从小生活上事事有人操心，她当然就变“笨”了。离家求学这一年，她才开始学习钉扣子、补衣服，照顾自己。

大学时代的樊锦诗，最喜欢的是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你早到，并且在身边给她占一个位子。并不被校方提倡的学生爱情，就在这默默无言的关心中开始了。

樊锦诗总习惯在手腕上系一方毛巾手绢，彭金章看在眼里，就送给她一方更好看的，绣有红的、黄的、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可他不知道，送毛巾手绢是对的，但是樊锦诗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然而她没吭气，收下了。他又把他认为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其实并不合这位江南姑娘的口味，可是她也没说，开心地尝尝，吃掉了。她看到了这个男孩子的心。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为人淳朴实在。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总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因为他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能打成一片。樊锦诗呢，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这称呼直到她年纪大了人家才不叫了。

“小樊”说，她对“老彭”的感觉，自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虽然同时期也有别的男同学追求她，但她没想过和老彭以外的人好。虽然生长在条件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樊锦诗身上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挑剔和娇气，相反，她不喜欢甜言蜜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走进敦煌的少女

如果说，除了老彭以外，樊锦诗还把自己的心交给过什么人，这“人”就是敦煌。人们经常质疑樊锦诗这辈子为了敦煌薄待了老彭，樊锦诗却说，她和敦煌的爱恋，离不开老彭的支持和奉献。



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喜欢徜徉于博物馆、美术馆，陶醉于历史文化之美，于是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并对这个艺术宝库充满神往。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因实习来到敦煌。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与世隔绝，渺无人烟。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的是白面条，配菜是一碟盐、一碟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每天，樊锦诗都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城市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种梯子——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整个实习期，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怎么洗都是黏黏的。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

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这个城市姑娘也没想过再回去。何况，城市里还有一直默默关心着她的恋人彭金章。

时间到了196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面临毕业分配。听说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那一年，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樊锦诗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她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单纯得近乎“傻”的想法，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服从分配”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一致选择。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过一句信誓旦旦、可歌可泣的话，即便在面临天各一方的时候也没有。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默默关心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信中没有“你依我依”，只是互相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至多最后互道一声问候、珍重。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时，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看到信封上的“敦煌”二字，同事们取笑老彭：“原来是个‘飞天’呢！”

旷日持久的分居拉锯战

再入敦煌，为了梳洗方便，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她虽是年轻女儿身，却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牺牲换来的，并不是顺利地投身学术研究——1963年起，“四清”接着“文革”，不论敦煌还是武汉，“运动”和“斗争”成为全国人民生活的主题。

1967年元月，樊锦诗在“文革”大串联中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其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这样的两地夫妻，在那时并不鲜见。被国家和社会命运裹挟着的人们，个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细流，被消音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

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那时，从武汉到敦煌要去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



穿的衣服都没有。

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催促彭金章回去参加“运动”。彭金章不放心妻子，一拖再拖，可是，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樊锦诗没出月子，就得到冰凉的河里提水，一个人照顾婴儿。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那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下班回来，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一次，孩子从门缝里看到妈妈，呵呵地笑——樊锦诗推开门才发现，孩子拉了一床。“你这个坏东西，还笑哟。”她逗儿子。只要孩子没事，就值得笑。可是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到了地上。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1岁半，她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人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父子俩吃食堂，出差时，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照看。

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因为农村闭塞，又寄人篱下，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樊锦诗决定把孩子带回来。刚带回来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显得怯怯的，途经北京，看抽水马桶都新鲜。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想，不能再把老二也压给他。就这样，小儿子和樊锦诗来到敦煌。

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愉快。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孩子日渐开朗起来。樊锦诗也想尽量“助长”儿子的快乐。有时候，在太阳底下给孩子晒一盆洗澡水，孩子



能边洗边玩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小家伙偷懒没有洗澡，带着满身的沙子就上了床，樊锦诗也并不斥责。她教儿子认字、数数，孩子很快就能数到1000。小屋里总能听到母子俩的笑声。

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研究院找了个高中生给子弟开复合班，多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写着一年级的作业，听着四年级的课文，孩子总是无法专心。晚上回来，孩子问妈妈“为什么2减1等于1”，樊锦诗很纳闷，这还不简单吗？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拿两根火柴给孩子演示，拿走一根，还剩几根？孩子一下明白了妈妈的讲解。过了些天，孩子又问妈妈：“36除以6等于多少？”樊锦诗奇怪，难道老师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教吗？孩子的作业经常出现白字，还说“老师就是这样讲的”。她越来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孩子的教育要被毁了。

无奈之下，延续了两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断，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樊锦诗的老家上海上学。孩子非常想念敦煌，他记得从敦煌来上海乘的是火车，他以为找到铁路就能找到敦煌，找到妈妈——就这样，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尽管最后找了回来，但上海的家人一定要樊锦诗和彭金章把儿子领走——谁都不愿这样骇人的事情再发生。敦煌不行，就只有武汉——这一次，又是老彭挺身而出，没有一点埋怨地把小儿子接到身边，默默承担起照顾两个调皮男孩的责任。

相聚是最好的时光

一方面，樊锦诗多次请调到武汉工作，都得不到批准；另一方面，年深日久，她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运动”搞了那么些年，她总觉得，来到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业务，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也对不起自己。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团聚的事就在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对于这个聚少离多的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



是短暂的相见。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一家人住在 10 平方米的宿舍里，四口人同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可是只要能团聚，这又怎么算得上苦呢？探亲假里，她可以好好看看温厚的丈夫、淘气的儿子，给他们做几顿像样的饭菜，也让老彭多享受几天有妻子操持家务的轻松。

樊锦诗清楚地记得，每次她到武汉探亲，孩子就养胖一些，她一走，孩子很快又会瘦回去。因为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儿子当时成绩糟糕，面临考不上大学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局面，1986 年，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 50 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多么大的事业牺牲！彭金章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勉强的话、抱怨的话、委屈的话，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总是化入无言的行动中。

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 400 多个增加到 700 多个，为世界瞩目。



彭金章、樊锦诗夫妇难得的同游



向往团聚的一家四口，其实至今没有真正团聚。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在 1 100 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还需要乘 1 天 1 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 年，60 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而如今 75 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工作。她和老伴儿相互扶持，走过了一辈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至今，他们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或者对对方说一句“不舍”“相思”。她会在每一次火车开动或飞机降落的时候，给老伴儿报个平安，他会在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饭菜做好，无论他什么时候问，她都说“好吃”。

这就是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无言之爱，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爱的方式。为了一句学雷锋活动上的宣誓，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到荒烟大漠……樊锦诗说，可喜的是现在的敦煌人不必再承受那样的苦楚。敦煌，已经是一座灯火辉煌的美丽城市了。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8 年 1 月 8 日）



珞珈三女杰之凌叔华

刘怀俊

凌叔华(1900—1990年)，我国五四新文学早期女作家，武汉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夫人，与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被誉为“珞珈三女杰”。

快乐童年

凌叔华，原名瑞棠，字叔华，笔名瑞唐、素心等，清光绪廿六(庚子)年二月廿五日(1900年3月25日)出生于古都北京城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凌福彭(1856—1936)，广州番禺人，1895年与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海南人)同榜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天津知府、顺天府尹(北京市市长)。凌福彭博学广识，精诗词，爱书画，文人墨客往来如织。清末文坛怪杰辜鸿铭、宫廷画师王竹林、国务大臣梁松生皆其契友。

凌叔华是凌福彭第四房夫人所生，在姊妹四人中行三，在兄弟姊妹中行十。小瑞棠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深得父亲和家人喜爱，自幼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四书》《古文观止》等蒙学经典，深受古典文化浸润。

叔华五岁时，父亲发现她用炭条在后花园的白墙上涂画一些小儿人、小动物，遂因势利导鼓励她“涂鸦”。更巧的是遇到父亲好友、著名画家王竹林，这位丹青高手看到这些童画，便认定这女孩儿“颇具绘画天分，将来必定能成大器”，并对她父亲说：“这孩子将来肯定超过你我。”答允收小叔华为徒儿。从此，小叔华在王竹



林画师培育下，绘画技巧日益进步。

后来，王竹林即将离京南下，行前一力举荐小叔华去拜宫廷女画家缪素筠^①为师。这天凌叔华带着绘画作业随竹林师前往拜见女画家缪素筠，缪看了小女儿的画之后，收下了小叔华作为关门弟子。凌叔华在当代顶尖高手缪素筠大画师调教下，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一年之后，绘画技巧、艺术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几乎同时驾崩^②，宫廷画师大调整，凌叔华惜别恩师，缪素筠根据她山水画的基础及“灵性”，建议她拜以山水画著称的女画家郝淑玉为师，专攻山水画。经缪师书荐，叔华拜见了郝淑玉画师，师生一见如故，十分投缘。

一天，女弟子提出一个十分平常而又深奥的问题：“我看到过的山水全都画完了，怎么办呢？”郝淑玉师微笑地望着她，饱含深情地回答：“哪里会画得完啊？！”师生二人的这次对话，竟使凌叔华铭记终生。她忆起缪师素筠所授绘画“经典”：“山，近看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四时之景不同也。……朝暮之变化不同也。”她后来回忆说：“她的话不光是帮助我作画，还助成我的爱山癖。”（凌叔华：《爱山庐梦影》）后来凌叔华随夫来到武汉大学，于20世纪30年代一个暑期在庐山小住“消暑”，每日在外寻幽探胜，来到五老峰，当她仰瞻俯视那神奇的峰

① 缪素筠(Miào sù yún, 1841—1918)，昆明人，早年留学西欧，融汇中西画理之长，画风新颖，艺术造诣日臻成熟，闻名京师。后被召入宫为慈禧太后赏赐王公大臣“御笔丹青”代笔。慈禧对缪素筠优礼有加，赏服色三品，俸月金二百，赦免跪礼。缪素筠待人和气，博得后妃、宫娥、太监一致赞赏，尊称“缪画师”“缪先生”，她的画作弥足珍贵，一幅难求。

②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11-14)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静谧离开人间。可巧光绪与慈禧(1835—1908)在不到一天时间内相继去世，而生前“母子”关系微妙，实史所罕见。



峦丘壑时，“悠然记起她（淑玉师）的话，我感动得像一个教徒到了圣地流出眼泪来”。此时她不由想起王竹林师语重心长的开导：“你学画山水，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你懂得了家，你就会猜到什么时候它要笑，什么时候它发愁……就会下笔潇洒自然了。”凌叔华悟出“这原是中国画的高超微妙道理”。

名师辜鸿铭传授英语

凌叔华出生书香门第，成长条件得天独厚，尤其有幸跟随父亲好友、学贯中西的清末鸿儒辜鸿铭学习英文，更是她一生的骄傲。原来外务部大员辜鸿铭与国务大臣梁松生恰与凌福彭成为“邻居”，三人志趣相投结为知交，无话不谈。凌叔华回忆道：“辜鸿铭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那时住在我们家对面一条小街叫椿树胡同的。每隔一两天他就同梁松生伯来我们家聊天吃饭，常到深夜才走。”有一回“辜伯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的出失乐园背不出’。……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着的行看……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小叔华清楚记得：这时他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么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小叔华告诉父亲，她要跟随辜伯伯学英文。辜鸿铭对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从小就要学会背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就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凌福彭随口便答应了宝贝女儿的请求。跟随辜鸿铭学习英语，英文名（取其译音）SuHua。这辜伯伯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曾自嘲“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①。辜鸿铭很喜欢活

① 辜鸿铭（1857—1929）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园家庭，十岁即到英、德、法留学，通晓九门外语，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能背诵《失乐园》《浮士德》《莎士比亚》与《圣经》。1893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策划创办《自强学堂》起草奏折上奏光绪皇帝并得到批准。1907年调北京任外务部员外郎。



泼可爱的小叔华，首先教她朗读、背诵英文儿歌，从一天背两首开始，不断增加。小叔华聪颖活泼，记性又好，不到半年竟把辜鸿铭所藏通俗英文读物背诵了一遍。辜鸿铭又继续教她背诵英文名篇：《莎士比亚戏剧》选段、《希腊神话故事》以及《圣经》片段等。如此，“在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由于凌叔华亲聆这位被孙中山称为“中国真正懂英语的三个半人中的一个”的辜鸿铭大师教导，日复一日“与时俱进”，她的英文“听说读写”水平与现今“小留学生”水准相比毫不逊色。

芳华一代

凌叔华从小在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中成长，对于文学、美术“天然”爱好，少年时期即由天赋悟性奠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1919年年初，凌叔华参加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插班考试，顺利通过。由于她文学水平在班里名列前茅，被推选为学生会秘书，不少讲演稿和标语均出自她手。她在天津一女师恰和邓颖超、许广平同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她们一起在周恩来领导下投入运动，组织游行、演讲。她尤其赞赏小超同学（15岁）的机敏活跃。当时“天津爱国同志会”成立并出版发行《醒世周刊》，由许广平任主编。她更钦慕许广平的才气，视为学习榜样。

1922年，凌叔华考取燕京大学文学院外语系，主修英文、法文，兼修日文。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基督教会创办于1919年，此时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约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担任校长，燕大是英美在中国所办教会大学中之佼佼者。时有高年级同学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已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她的小说《两个家庭》（连载），随之又连载其第二篇小说《斯人独憔悴》，对她的触动很大。“文学”就像一只磁性极强的巨手，牢牢地牵引着她，“写作”成了她最大心愿，是她倾心神往的目标。当胡适、徐志摩、郭沫若、冰心等人以其各自风格独特的新诗散文风靡文坛时，她的创作欲望就像一支刚点燃的火把，愈燃愈旺。大三年级开始以白话为文，在《晨报》副刊



(1924-01-13)上发表笔名瑞唐的短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

1924年春，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北京城为之轰动。泰戈尔在京期间，下榻东城区史家胡同西门公寓，由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源和徐志摩负责接待。徐志摩还担任泰戈尔访华期间的翻译。正巧北京画会刚刚成立不久，陈师曾（中国漫画创始人、国学大师陈寅恪之兄）、齐白石（国画大师，与张大千被誉为“南张北齐”）等人这天正在商量开会地点，陈师曾提议在凌叔华小姐家的大书房开会——“茶画会”，大家拍手表示同意。

“凌叔华小姐家大书房”当时在北京城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晓。在中国现代文坛，能够被称为小姐“女儿红”者，是有一种不成文“基准”的。如“家教、文才、个性”，如“漂亮、气质、社交”等，凌叔华完全够得上上乘。这位翰林门第千金，英语流畅宛如母语，诸方面足够摩登(modern)。五四运动以来，凌叔华、林徽因两位“才女”，同是大家闺秀，同样有有名的“书房”“客厅”。凌叔华的“大书房”成了北京文人墨客聚会场所，比林徽因小姐家那间“沙龙”——太太的客厅约早十年。二者媲美京华，传为佳话。

凌叔华得知在她家大书房开会的消息后表示热烈欢迎。1924年5月6日，在她“小姐的大书房”以中式茶点诚邀大诗人泰戈尔。是时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丁西林都来了，陪同者二三十人，气氛热烈。凌叔华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泰戈尔对徐志摩说，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寓意深长、耐人寻味。就在这次茶话(画)会上，凌叔华结识了北大青年教授陈西滢与诗人徐志摩。此后，两位留英同学成了凌府常客，并与凌叔华建立了诚挚友谊。



这年冬徐志摩、陈西滢与胡适等创办的《现代评论》新文学周刊，为凌叔华提供了一爿发表文章的理想园地。她最近几篇小说的出现，已引起徐志摩和陈西滢的关注。叔华为结识以新诗著称的徐志摩及北大青年教授陈源（笔名陈西滢）而深感荣幸。

不久，凌叔华被燕大文学会吸收为会员。翌年1月，她的短篇小说《酒后》便在《现代评论》（1925）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3月另一短篇小说《绣枕》又在同刊物（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引起社会及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后她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也在《新月》月刊、《晨报副镌》《燕大周刊》《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成为《现代评论》和《新月派》一颗新星。

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言简意赅的评语，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称她是“新闺秀派”女作家。凌叔华与苏雪林（1896—1999，安徽黄山才女）、冰心（1900—1999，福建福州人）、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冯友兰之妹）、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并称“民国五大才女”。

凌叔华与徐志摩之间感情微妙，情谊深厚，诗画“唱和”。某年冬至叔华为志摩设计一叶贺年卡，构思独特：海边沙滩上，一憨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后来志摩在北师大附中演讲，便以此为讲题。徐志摩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临行前将“八宝箱”（内有两本徐志摩的日记）交给凌叔华“暂时保存”。志摩如此推心置腹信任一位大学女生，将自己最隐秘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坦然托付她。志摩叔华一度传出绯闻，徐父曾表示希望凌叔华能做徐家儿媳，但志摩只是视叔华为无话不谈的知己，而凌叔华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学士



学位，并以优异成绩荣膺该校金钥匙奖。凌叔华毕业后由于其画艺特长，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谋得职位。这年7月凌叔华与陈源结婚，住北大教授宿舍，距故宫博物院不远。陈源与凌叔华属“师生恋”。民国时期有几对令人仰慕的学者伉俪，如：林徽因与梁思成，冰心与吴文藻，许广平与鲁迅，袁昌英与杨端六等。鲁迅曾调侃：陈源教授找到了“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1927年初秋，陈源、凌叔华同往日本旅行，这是凌叔华第二次旅居日本，童年曾跟随父亲到日本住过两年，“那时的印象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这次来到日本，那是“日本的全盛时代，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民丰的强国”。此时访日，凌叔华带来数十件遴选画作同当地美术界进行交流。通过东京画展她见到了不少著名美术家，她本人亦作为中国青年女画家在东瀛崭露头角。次年返程时，凌叔华继续留京都一年，以便研读菊池宽、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夏目漱石的作品及日本艺术。在这两年时间里，她潜心钻研、领悟日本绘画艺术、增进自身艺术修养，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其间1928年夏她参加了由东京中国青年会组织的登富士山团队，随身带着写生本和画笔，俨然一位女画家出行，一路素描写生，收获颇丰。然而她却以一篇散文《登富士山》由“滢”带回国内在《现代评论》发表。

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了凌叔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现代文艺丛书》第四种），由陈源编定，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足见陈源先生为文之严谨，对夫人要求之严格，同时亦体现着深切的爱。凌叔华、陈源对文艺有共同爱好，“写作绘画、评文论艺”是他们共同爱好。有趣的是，两人并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叔华的创作总是对夫君“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之前，用冰冷一盆凉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陈源写好他的“闲话”文章后，也不给夫人看，只有一旦发表刊行于世，才彼此相见。



珞珈女杰

1929年，陈源受刚上任不久的王世杰校长聘请，离京赴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凌叔华也随夫来到武大，住在武昌昙华林，由于陈源院长对于教学工作要求严格，不让妻子在学校任职，凌叔华没有教学任务，专致文学创作。凌叔华由于袁昌英、杨端六夫妇与陈源是留英同学的关系而成密友，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还拜凌叔华为干妈，陈杨两家关系极好。苏雪林来后，三人一见如故，她们志趣相同，陆续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凌叔华气质高雅，才貌双全。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唯一的美人。”苏雪林也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凌叔华与袁昌英和苏雪林在珞珈山校园因共同的文学爱好成为知音，“珞珈山三个文学朋友”无人不晓。1935年凌叔华女士受聘担任《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的主编。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此时袁昌英、苏雪林^①和凌叔华分别发表纪念文章，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祭文《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深切悼念良友：“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凭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

① 苏雪林刚来武大不久的一天早晨，兰子（袁昌英）送来一篇新著《毁灭》，纪念在济南飞机遇难的诗人徐志摩（1897-1-15—1931-11-20），并约雪林也做一篇纪念文字，于是《北风》便在诗人逝世一周之内问世！足见斯人文才之敏，然而袁兰子更捷足先登，堪与媲美。



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最后她热泪盈眶地呼唤：“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凌叔华是有别于冰心、丁玲写作风格之外的女作家。当她发表创作集《花之寺》时，沈从文这样评介：“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人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徐志摩为“中国雪莱”，我们不妨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斐尔”。

凌叔华在珞珈山校园期间先后出版了两本书：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现代文艺丛书》）；1935年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她的儿童短篇集《小哥儿俩》（《良友文学丛书》），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十年的工作了。

1935年10月，英国青年诗人朱利安·贝尔被武大聘用，约定3年合同，年薪700英镑，其中一半由退还庚子赔款基金会支付。朱利安·贝尔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27岁已出版2本诗集，是英国“布卢姆斯伯里派”——著名学者罗素、狄更生、凯恩斯、韦伯夫妇，皆为其中成员——第二代的佼佼者。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姨妈、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意识流作家。朱利安来武汉后就给母亲写信说：“整个下午我都和文学学院院长一家待在一块，有他的妻子，还有他6岁的女儿——非常可爱迷人的小女孩。我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简直是内地的剑桥。”很快贝尔承认爱上了凌叔华，他说：“她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这年冬天，两人感情明显升温，1936年元旦前后朱利安给母亲写了10封信，述说他与凌叔华之间的进展。“她（指凌叔华）说，她过去没有爱过”，“我遇到的是一个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化方面，都充满



学识和情趣的中国女性”。贝尔竟然把凌说成“我的爱人”！并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

1936年1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凌叔华借口老师去世回到北京。她带贝尔去见一些京城文艺界名人：齐白石、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返回武大后，凌叔华与贝尔的绯闻不脛而走，遭众人茶余饭后广泛非议，此事在英国也许司空见惯，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引发严重“道德危机”，一向豁达的陈源院长陷于十分尴尬之境……这段恋情持续不到一年。贝尔最终于1937年1月去了西班牙，再也没有回来。帕特丽卡·劳伦斯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的小书中将这段私情视作“两种文明的相互吸引、审视、接近和影响的过程”，说中国像是屏风上的水墨画，淡雅、镇定、空灵。

1968年，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才从朱利安的书信集中知道了这段往事，陈西滢曾反复阅读了那本书，还做了很多批注，女儿问：“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何仍然在一起？”父亲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诚然，这位陈院长爱才，正如王星拱校长和朱光潜教务长之爱才，方使武大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书写学府三四十年代辉煌。而对发妻之爱更是日月可鉴！已臻“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之崇高境界。

凌叔华因而结识了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建立了长期通信联系。凌叔华1938年把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寄给伍尔芙夫人，伍尔芙鼓励她继续写下去，她说：“自由地写，不要在意多么直接地由中文翻译成英文，事实上我宁愿建议你尽量接近中文的语言风格和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乱给她带来痛苦，情绪不安。凌叔华将自己的苦闷写信告诉伍尔芙，回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 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中西两位女作家交往多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伍尔芙夫人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的自传体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可说是在弗



吉尼亚·伍尔芙帮助与指导下写成的，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

1953年《古韵》在伦敦出版，极为英国文化界瞩目，引起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多家重要报刊登出书评，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作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凌“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藏着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当时中国作品英译者寥若晨星，更何况女作家原版作品更难能可贵。苏雪林在《古韵》出版后曾发表简短评语：“这本书文字极其隽永有味。叔华本来会画，书中插图，也出自亲笔，图文并茂，外国读者见之爱不释手。”以后《古韵》被译成多种文字，凌叔华随之驰名国际文坛。

女画家·凌

1947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西欧与夫君陈源团聚，在伦敦亚当森街十四号四层一室寓所定居。她失去国内的创作条件，便专心致志作画。凌叔华在大学时期画艺已经成熟，得“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之妙。她的画大多曾经美学家朱光潜看过，得到高度评价：“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凌叔华与老一辈艺术大师有深厚友谊。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画会，十分活跃。只要有人折柬相邀，画家们便闻风即来，茶余酒后，濡毫染纸，直抒胸臆，而后尽兴而去。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中具体描述道：那次画会是由她本人做东主办的，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金拱北等晤聚品茗把盏后，凌叔华裁纸磨墨请众人合作《九秋图》。姚茫父题款：“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屋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茫父兰



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此画凌叔华视为珍藏精品。她的女儿陈小滢不无沉痛地说，可惜这幅珍贵画卷散失于战乱，家中仅存有照片。抗战岁月，武大西迁，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精神上很苦闷，凌叔华寄情丹青，以“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烦心。苏雪林回忆说：“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连开几个画展。”

凌叔华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她的画作取材于“诗人心中荡漾涵泳的自然”：北京的胡同、伦敦郊外的风景、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她文、画同风，一如其人，“轻描淡写，着色不多，而传来的意味很隽永”。1943年武汉大学校庆，凌叔华作《水仙》长卷志贺。她的一位学生晚年忆及此画，印象仍十分深刻：“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蓊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看这幅山水横幅：秋水、芦苇、古柳之间，一老翁抛丝，悠然独钓秋色。题语：“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齐白石读她《夜景》后作七绝一首诵曰：“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一种清幽、感伤、婉约与缠绵浸淫尺素。

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追求。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画展，她一生在中外举办过多次画展。凌叔华寓居伦敦不久，英国友人见了她的精美画作，称赞不已，热情鼓励和支持她在伦敦办画展，她把出国前后所作的部分山水花鸟水墨画，连同她收藏的历代部分名画一起展出，为传播祖国绘画艺术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她集历年数量可观的画作，加上她所收藏珍贵国画，分别在伦敦、巴黎、波士顿、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画展。其中在巴黎画展，被安排在“规格极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的三十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引起极大轰动！凌叔华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为国内外名家所称道。这次画展让西方洋人一睹“芳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



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女儿陈小滢摄于伦敦公园

几块苔藓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巴黎《世界报》《先锋论坛报》撰文称颂，电台也采访了东方女画家叔华·凌。

1962年12月，凌叔华应邀在巴黎 Musee Cenuschi 举办中国文人画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四十幅新老画作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瓚、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鱓、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并展出她所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等，得到法国国家研究院院长、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瓦 (Andre Maurois) 的大力支持，并亲自主持这次画展。莫洛瓦院长还热心支持她将展品印成画册，并为画册撰写序言。这是轰动西方、影响巨大的一次画展，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报刊均刊登专文报道。安德烈·莫洛瓦院士特撰文介绍她的画，对女画家予以崇高评价：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莫洛瓦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



的境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巧手妙笔，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勾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洁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此次画展更促使女画家叔华·凌在国际艺术界声名鹊起。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特地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凌叔华所作的山水花卉画作，亦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收藏。

20世纪70年代末，春风涤荡，冰山消融，祖国大地迎来科学文化的春天。凌叔华的《花之寺》《爱山庐梦影》和《古韵》等佳作再度出版，得与读者见面。读者认同作家凌叔华，然而画家凌叔华却鲜为人知。因其画作极其罕见，真迹难觅。

心向祖国 协助李四光回归祖国

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布成立，当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正在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他的留英同学陈源、凌叔华夫妇——由夫人出面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从而躲开国民党特务搜寻纠缠。足见陈源、凌叔华夫妇所秉持的正义感，对朋友的真挚情谊和对祖国的信任感。

1956年凌叔华应邀分别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0年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爱山庐梦影》。她还写了12部独幕剧。1968年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凌叔华享有国际文学艺术家礼遇。

1970年3月29日，热爱祖国的外交家陈源先生患脑溢血在英国病逝。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报道评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当局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夫君“落叶归根”，将陈



源的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以满足他生前夙愿：“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国门，凌叔华便多次回国观光，至1981年，已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大好河山，热情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观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的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一些关于祖国文化艺术、风俗人情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得到普遍好评和赞誉。

凌叔华是一位爱国的作家、画家。“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她时时想念祖国，她曾感慨“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梦寐以求盼望回到她青春少年时代生活的北京，回到亲爱祖国的怀抱。她依然那样眷恋故土，祖国的山山水水，常浮现在她脑海，青少年时代的北京城给她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使她刻骨铭心、终生难忘。1984年秋她在伦敦对萧干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凌叔华热爱中国文化，“望九”之年还想办画展。很想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汉石拓画，在美国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20世纪70年代，年逾古稀的凌叔华回祖国大陆旅游时还背着画夹到北京小胡同写生，她一生舍不下手中那支画家笔。

1986年凌叔华染重症伤寒，又跌折腰骨，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终于回到她日夜思恋的故乡，住进了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在鲜花、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祝福中愉快度过90华诞。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昏迷。她一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她的嫁妆，那28间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她生命最后一周满载“如愿以偿、了无遗憾”的心情安然度



过。1990年5月22日，凌叔华在北京仙逝，享年90岁，走得十分安详。

凌叔华如一片海棠，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海外43秋，终又回到出生的那片圣土，凌叔华为自己的人生旅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祖国没有忘记她，中国文坛铭记着她，名作《酒后》《绣枕》永载史册。民国才女、女作家、艺术家凌叔华逝世当天下午，祖国人民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惠山脚下，与夫君陈源合葬。凌叔华“落叶归根”回归自然，最终达成“天人合一”。

（作者系数学系1952级校友）



百岁漫画家方成仙逝，“漫坛四老”最后一位大师也走了

刘双平

著名漫画家方成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仙逝，享年 100 岁，从此“人间少了幽默，天堂多了笑声”……

方老是杰出的漫画家、杂文家、幽默学者，百年人生充满传奇色彩，“方正不苟，嬉笑怒骂捍卫人间正义；成誉三千，诙谐幽默笑别百岁人生。”

一、杰出的漫画家

方成是中国画坛上的多面手，不仅在漫画领域成就卓著，同时又将漫画融入国画，形成了极具幽默特色的水墨人物画，在国画的人物画领域独树一帜。他以丰富的幽默实践为基础从事幽默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享有“学者型漫画家”美誉。他不仅画好，诗歌、杂文也写得漂亮，还创作过相声段子。观其人，品其画，读其书，总是令人感到“幽香”四溢，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漫画只有近百年历史，打倒皇帝之后漫画才开始逐步流行起来。百年中国，沧桑巨变，漫画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进步的历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世纪风雨，大浪淘沙，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漫画家，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廖冰兄、丁聪、张仃、米谷、方成等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中国杰出漫画家队伍中的一员，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方



成同前辈漫画家一样，创作出大批漫画精品，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方成正式步入漫坛始于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这年，他从四川来到被称为中国漫画“摇篮”的上海，以漫画创作为业。不久，应上海《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之邀，出任该刊漫画版主编及特约撰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从香港到北京任《新民报》编辑。1951 年，应《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华君武之邀，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人民日报社。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方成的漫画以国际讽刺漫画为主。他创作了大批揭露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漫画，深受欢迎。《谁是多数》（与钟灵合画）、《圣水？》《美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救生圈》《瞎子算命》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那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国际讽刺漫画。这是他漫画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

“文革”之后，方成迎来了漫画生涯中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作品

以社会讽刺漫画为主，《武大郎开店》《官商》《苦读未悟图》《张飞卖肉》《不要叫老爷》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与第一个创作高峰期相比，这一时期作品的艺术性更强，思想性也更加深刻，特别是《武大郎开店》风靡全国、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漫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方成漫画：《武大郎开店》



二、漫画与国画的联姻

中国画坛有个有趣现象：不少画家早年钟情漫画，并在漫画领域佳作累累，步入国画后，亦在国画领域成就骄人。叶浅予、张仃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同叶浅予、张仃等艺术大家一样，方成在后期作品的创作中也瞄准了国画，但其独到之处在于：他的“变法”不是放弃漫画独步国画，而是追求漫画与国画的结合，让漫画民族化，让国画具有漫画格调。

中国现代意义的漫画是“舶来品”，20世纪初由国外传入后，迅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但在形式上除少数几位画家之外，还少有鲜明民族特色。不少漫画前辈尝试过用水墨宣纸作画，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极大地拓宽了漫画的表现力，并逐步形成中国独有的水墨漫画品种，是很有意义的创新。

方成早年曾向著名国画画家徐燕荪学习过中国传统人物画，他在“文革”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便极力探求漫画的民族化。他以水墨和宣纸为工具，以中国传统人物为题材，以幽默为灵魂，创作出了大量水墨人物画，如钟馗、铁拐李、济公、鲁智深、李逵、弥勒佛、布袋和尚等。这些水墨人物画兼具国画、漫画之长，除了在漫画领域产生极大影响外，也为国画人物画的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传统的文人画还强调画外功夫，讲究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方成的水墨人物画亦以诗配画，诗、书、画珠联璧合。由于他的画是幽默的，因而配画之“打油诗”也全是包袱。“打油诗”配幽默画，便形成了独特的“方成风格”。

方成喜画钟馗，他有一佳作《钟馗累坏了》，画面中打鬼英雄钟馗累倒在石头上睡着了，画上题识为“春眠不觉晓，鼾声惊飞鸟，人间鬼太多，钟馗累坏了”。

方成喜画弥勒佛，他画的大肚弥勒佛可亲可爱，令人爱不释手。在一幅《弥勒》画中，他的题识为“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惟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



方成曾在广东画过一幅《功夫茶》，画面上两位茶友悠闲对饮，其乐融融，题识为“此间喝茶讲功夫，大把茶叶塞满壶，初尝味道有点苦，苦尽甘来好舒服”。

方成酷爱鲁智深，关于《鲁智深》的“打油诗”又多又精彩。

——“梁山一百单八将，最爱花和尚，不会念经，干得漂亮，凭的是菩萨心肠”。

——“肉也罢，酒也罢，照样吃喝不算啥，当和尚是假。天不怕，地不怕，跟宋哥哥打天下，拉皇帝下马”。

——“这个和尚不寻常，相貌堂堂，武艺高强，胸怀侠义好心肠，三拳放倒郑老板，两手连根起垂杨，逼上了梁山，造皇帝的反”。

——“丢下枪棒，绰起禅杖，鲁提辖变花和尚，才显英雄本相”。

——“这个和尚没有庙，江湖道上逍遥。仗义行侠，安良除暴，好汉做事好汉当，朝廷王法去他鸟”。

——“原本是将才，被逼上五台，佛门关不住，一脚踢开来”。

——“提辖避祸入禅林，只当和尚不念经，清规戒律全不问，无法无天一身轻”。

方成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以线条为主，讲究“人物画以线条胜”，在线条运用上达到出神入化地步。有时寥寥几根线条，或刚健、或飘逸，便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他用笔求简，惜墨如金，常有以一当十之妙笔，令人赞不绝口。

三、“学者型”漫画家

在漫画家队伍中，能戴上“学者型漫画家”桂冠的不多，方成便是为数不多的实至名归者。

方成的研究范围既宽又窄。说宽，因他研究的领域不仅包括漫画，还有杂文、相声、喜剧、诗歌等；说窄，因他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没有脱离幽默范围。

方成研究幽默缘于侯宝林。他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很早就是莫逆



之交，侯宝林同他一样，尽管对幽默技巧的运用炉火纯青，但仍不满足于幽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侯宝林多次对他说：要研究幽默，很多人说不好相声，就是因为不懂幽默。

方成对幽默研究本来就很有兴趣，侯宝林的话正中下怀，他经常把侯宝林请到家中，同时把漫画家李滨声也请来，三人煮酒论幽默……遗憾的是，三位幽默的高手却说不清、道不明幽默背后的门道，这给侯宝林和方成极大的刺激。在侯宝林期待的眼神中，方成下定决心要把幽默研究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方成在创作漫画之余，就一门心思地研究幽默。由于有丰富的幽默实践作基础，他研究起来得心应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研究幽默的专著一本接一本连出不断，先后有《讽刺？幽默？漫画》《笑的艺术》《滑稽与幽默》《漫画艺术欣赏》《侯宝林的幽默》《方成谈幽默》《方成谈漫画艺术》《幽默艺术》等。

方成认为，要研究幽默，必须要研究滑稽，这两者是一对亲兄弟。滑稽是幽默的基础，幽默是滑稽的升华，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滑稽大多是由不相称、不协调引起的，幽默则是有思想内涵、有创造性的滑稽。滑稽让人一笑了之，幽默则让人笑后有思考，有启迪。他认为，尽管很多不懂幽默理论的人能熟练地运用幽默技巧，但如果从事幽默实践的人能懂一些幽默理论，一定会在幽默技巧的运用上更胜一筹。

四、武大化学，一生“画学”

方成祖籍广东中山，但出生在北京。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中山度过的。他非常热爱家乡，常用的一枚闲章就是“中山郎”。

人都有“家乡情结”，而方成的“家乡情结”超乎他人。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爱，他从1992年起分多次向中山市捐赠几百幅字画珍品，令人肃然起敬。

这么多的藏品他是怎样得来的呢？全是朋友的赠予。他人缘极



好，与很多书画大家都有交往。文人相交，没有财物相送，往往拿自己的作品互赠。久而久之，他便有了大量名家墨宝，包括冯玉祥、叶浅予、吴作人、关山月、张正宇、朱屺瞻、黄永玉、王雪涛、董寿平、唐云、许麟庐、林散之等的作品。这批名家墨宝是一笔宝贵财富，他认为这是友人的心意，不能出售，只能捐赠给社会，使之流传后世，于是，他便将这些宝物捐给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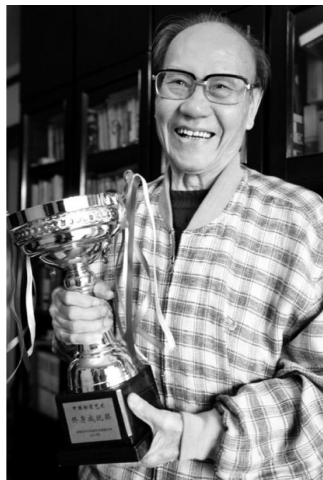
其中最有意義的恐怕要数冯玉祥将军画的一幅《辣椒》。冯玉祥将军的书画作品流传于世的还不多见，因而愈显珍贵。画中三只辣椒，两红一绿，傲首挺立，气势不凡。辣椒上方的题识是：“红辣椒、绿辣椒，吃起来味最好。大家多吃些，定把倭寇打跑。”

方成不仅爱故乡，对母校武汉大学也爱之深切。他1942年毕业于武大化学系。能上武大，纯属偶然，其中还有两段有趣的插曲。

上高中时，方成立志学医，所以高中毕业后报考的是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但没考上，原因是除英文考试不及格外，智力测试亦不及格。他想：当医生人命关天，智力不够咋行？退而求其次，估计当药剂师还可以，于是他报考了武大化学系。第二个插曲是：他报考武大时，考试时因故迟到，按规定禁止进入考场。巧的是，监考人是他的高中老师。老师看着自己的弟子急得满头大汗，恻隐之心顿生，冒着风险破例允许他入场，使他顺利走进武大校门。

方成在武大学的是化学，按他的话说，毕业后专业也没丢，一生也是搞“画学”。他在创作和研究上的严谨作风，与在武大所学自然科学戚戚相关。

方成对母校感情很深，1983年和1993年武大举行校庆时，他都回校赠画祝贺。武大也为有方成这样一



方成荣获“终身成就奖”



位杰出校友而骄傲。1998年方成在武大举办了八十寿辰漫画展，为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他在画展开幕之时向母校捐赠了自己的30幅漫画精品。

五、养生就靠一个字

生活中的方成总是幽默风趣，豁达开朗，妙语连珠，“幽香”四溢。

他有一幅展示自己骑自行车“雄姿”的自画像，因他80岁后还可骑自行车穿街走巷，对自行车颇有感情。在多幅自画像中，这幅是最精彩的。从画中可以看出，他骑的是辆破车，连个车铃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车铃？他的解释是：车骑起来哪个地方都在响，还要铃干什么？骑这种车最放心，放在哪里小偷都看不上。再看看他的“雄姿”，骑车时还东瞄西瞅的，从容自如！这可了不起，80多岁的人了，骑车不是战战兢兢，而是像年轻人一样轻松自如，足见身体之好和车技之高。

常有人看了这幅自画像后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爱骑自行车？他说骑自行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锻炼身体，二是一上车就有座。

朋友聚会时，总有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就是一个字：忙。他说“忙，既健身又健脑，比啥保健药都好使”。

他还写过一首养生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

他还有一篇精彩的《自传》：“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中山，但生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姓孙。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有一次他参加书画界的笔会，一幅作品刚画了一半，觉得不满意，打算撕掉。旁边的女士手快，抢了过去，求他将画送给她。他无奈，只好答应。过了几天，这位女士拿这画来求他签名，她的执



着精神令他感动，他便在画稿上题了一首诗：“本来打算撕掉，无奈女士想要，只好签字盖章，看了请勿见笑。”

方成的书法很有特色，但很少送人。有位书法爱好者多次恳求，他盛情难却，便写了一首打油诗相送，“平时只顾作画，不知勤习书法，提笔重似千斤，也来附庸风雅。”

方成有三枚闲章，分别刻的是：“我画我的”“北京老广”和“中山郎”。他说自己的闲章不及侯宝林的幽默，侯宝林有一枚闲章叫“一户侯”，才是真正的幽默。

方成身体唯一的遗憾是耳朵不大好，用他的话说，全身零件都好，只是耳朵这个零件出了问题。但他又说：耳背好处不少，“文革”期间政治运动多，经常开会浪费时间，但他的时间被耽误的不多，因为开会时台上讲什么根本听不清，他想的全是自己画画的事。



刘双平与方成在一起

（作者系哲学系 1982 级校友）



有诗的青春

卢圣虎

青春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我人生的很多第一次是在武大完成的：第一次进省城，第一次在正规报刊发表诗作并收到第一笔稿费，出版(自印)第一本诗集，做家教赚到第一笔钱，第一次接触足球并成为铁杆球迷，第一次醉酒，第一次给女生送鲜花……在武大四年，除了这么多的“第一次”，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诗歌写作。也许是珞珈山诗风深入骨髓的滋养，它是我大学毕业后坚持得最好的一件事，虽然曾经时断时续。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功利和实用，不再是诗意盎然的时代。从大势上说，市场经济浪潮席卷而来，朦胧诗潮及第三代诗歌运动日渐式微。在“诗意的发源地”，万千学子争睹樱花诗赛的盛景不复再现，创办“珞珈诗派”的李少君、陈勇、洪烛、单子杰、黄斌、孔令军、张静等诸君已经长啸远去，武大校园留下“盛极必衰”的诗歌真空。1992年秋天进入美丽的武大，方知我敬仰的诗人王家新、高伐林是前辈学长，通过校报，也记住了马竹、吴晓、李浔、邱华栋、李建春、吕岛、胡沙岸等熠熠生辉的名字。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著名学长是现象级的，是后来者的偶像和标杆，也让喜欢写诗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温暖。其时，在大学里写诗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孤独的。初入校，我便能感受到：学习成绩优异者最易获得尊敬，写诗则被认为是歧途，是“情种干的事”或“疯子干的事”(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当时毁誉参半；1993年顾城杀妻自尽震惊世人)，令人不屑甚至遭到嘲笑打击。

喜欢上写诗且欲罢不能，对我而言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因为专



业不吃香，历史系的学生备受歧视。这种“出身”使我写诗的初衷有些功利：既为“稻粱谋”，又是为自己争口气。进校不久，我发现发表作品可以在年度评奖学金时加分，还有稿费。自己家境贫寒，因为外语一般，学习成绩不可能优异，又不太热衷于当学生干部为大家服务，唯有捡起高中时办文学社的一点底子为自己加分。1992年年底，我的处女作《亲情》（组诗）在校报上发表，领到了第一笔稿费。不多，但足够支付两天的伙食费。尝到甜头后劲头更足了，我的诗作在校报基本上成为“免检产品”，这里特别要感谢当时主持校报的李玉龙、张海东、陈剑鸿、周绍荣等老师。我有一组诗在《大学生》发表，领到了最高一笔稿费——75元，解决了我近半个月的伙食费！稿费加上每年评到的奖学金，这些物质的奖赏帮我度过了困难而充实的大学四年。

就这样，我爱上了诗歌写作。那种痴态就像一个人处于愤怒或痛苦状态，骂出来或找人倾诉出来就通体舒畅了。通过分行的文字写出自己想表达的，是当时最快乐的事。我从来不认为写诗很神圣，也没有成名成家的文学理想，直到结识了古竹。

古竹原名胡小良，和我同一级，中文系的保送生，高中时就发表了一大堆作品，大二时当仁不让地成为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社长。1993年春夏，他以一本散文集《莫欺少年一时穷》轰动校园。我记得，这位来自湖南耒阳山村的才子像名人一样在桂园食堂门前签名售书，一桌一椅一台录音机，老狼忧伤而动情的民谣伴着桂花的馨香，俊男美女端着饭盆纷纷驻足，属于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似乎又回来了！

此后，以古竹为首的浪淘石文学社一帮人似乎成了学生中最忙的人。除了筹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诗赛外，还干了几件风光无限的事：一是浪淘石文学社成立了分社“新管子”和“汉江流”，并分别以“浪淘石”名义出版了文学副刊，扩大了文学社的校园影响力，据说当时社员达到300人之众。二是邀请校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来武大讲座，如当时知名文学刊物《大家》主编李巍、《今日名流》主编方方及当红作家苏童、格非、张炜等，还有於可训、昌切等教授、评论家。场场爆满，吸引力丝毫不逊经济、管理等实用讲座。



三是以“浪淘石文学社丛书”的名义自印学生诗文集。算上古竹的《莫欺少年一时穷》，我们先后又无比自恋地推出了四本小册子：我的诗集《鱼光灿烂》、秦志勇的散文集《光与灰尘》、舒原的小说集《欲罢不能》及古竹、我、秦志勇合著的文集《三生石》。这套丛书的自印出版，在校内外反响较大，《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四是融合浪淘石文学社、大学生通讯社等力量，组建了“风雨同舟武大郎”（“武风”胡如平，“武雨”古竹，“武同”陈明明，“武舟”周旋）文学工作室，集策划、写作、宣传包装及经营等于一体，与武汉大学校报、省内媒体及杂志社联手，如《知音》《今日名流》《芳草》等，广泛推介武大，集中展示武大校园文学实力。

回忆我的珞珈岁月，不得不提“废园”。这曾是武大化北楼旁的一个小院子，几间散落的平房很破败，但宽敞、安静，家境较为殷实的一位学弟曾在此租住。我们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便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互取笑或取暖。这个院子原本没有名字，我们将这个废弃的一角取名为废园。虽然如今“废园”早已不存，平房推倒建起了楼宇，但每次有机会回武大，我都会停下来看看这片演绎过激情与梦想的“竹林”。物移人非，令人感慨。

客观地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校园文学渐趋衰落。即便如此，武大一群年少轻狂的学子仍试图冲出一条血路，以期延续珞珈文脉，呼应着刚刚树起的“珞珈诗派”大旗。但大势所趋，文学的寒潮很快降临，我经历的这段珞珈岁月可谓“校园文学世纪末的挽歌”。1996 年夏天，离歌四散。这群小有名气的校园文人完成无愧青春的燃烧后，就此“相忘于江湖”。据我所知，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及 21 世纪最初的 10 年，武大校园诗歌似乎再无特别出彩的表现。直到荣光启、李浩、黎衡、朱赫、赵成帅、王家铭等诗人集体强势涌现，李少君等“珞珈诗派”的初创者时隔近 30 年后重整回归，武大的诗歌现象才再次醒目地进入公众视线。

我想英雄的事业都在露天之下诞生
正如自由的诗歌产生于孤独



就让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吧
我会让空气也变成奇迹

这是古竹在毕业前(1996年)留在桂园7舍楼顶的诗句,墨迹早已褪去。这位少年成名而视文学为精神家园的才子,如今在长沙奔波于非商非文的道路上。晚一届的秦志勇据说在皇城脚下混得风生水起,我却再没读过他的美文。致力于小说写作的舒原毕业后就销声匿迹。其他如王志维、华静、付勤、黄宏、季彤等在校略有小成的文学精英,从商的从商,为政的为政,谋生的谋生,已经被文坛诗坛遗忘。他们的走向就像风光难续的20世纪90年代校园文学,有激情无建树,有理想却惘然。20多年过去了,古竹的这几句诗仍印在我心中,每次记起来都热血沸腾,却又无限唏嘘。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武大20世纪90年代校园文学的文章。相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家辈出的蔚为壮观及最近10年的井喷式崛起,中间这段时期几乎是一片空白,曾经的希望之星现今大多籍籍无名,这段岁月也少有人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2015年年底,因“珞珈诗派”微信群的建立,我得以见到众多久仰而亲切的名字。学姐、著名评论家陈卫曾嘱我写篇回忆文章,以备其研究“珞珈诗派”之资,我怕记忆不全,又恐笔力和认识有限,误了历史。前不久,现居武大的诗人张朝贝向我了解浪淘石文学社的情况,我匆匆数语,肯定不能令他满意。恰好这次“珞珈诗派人物专辑”约稿,有一道命题作文《我的珞珈岁月》。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的诗派而言,暗淡的历史也是历史,空白更值得嚼味。我最好的青春有最美的武大作为天空,这篇难产的小文可以看作是迟到的怀念和补充。

(作者系历史系1992级校友)



缅怀老师的老师

——纪念刘永济先生

莫砺锋

我与巩本栋教授一起从南京大学来到武汉大学参加纪念刘永济先生 130 周年诞辰的盛会，本栋兄曾钻研过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且整理过刘先生的遗著，完全有资格来此参会。我则不同，对于我来说，刘永济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如数仞门墙，“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来参会的主要目的是来向刘先生致敬。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果从学术团队的角度来衡量，全国中文学界声势最为显赫的大学无过于山东大学与武汉大学。前者有“冯陆高萧”，至今尚为山大人津津乐道；后者则有“五老八中”，不但阵容更为壮大，而且“冯陆高萧”中的冯沅君与高亨两位先生亦曾是武大的教授，武大中文系的光辉历史，于此可睹一斑。“五老”中以刘永济先生居首，“八中”中以程千帆先生居首，而刘、程之间又存在着清晰的师承关系。



刘永济(资料图)

在千帆师晚年为缅怀老师而写的以《音旨偶闻》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中，第一篇便是《忆刘永济先生》。我读了这篇文章，不但如睹刘先生之音容笑貌，而且对刘先生的道德文章深感钦佩。南京大学当今的古代文学学科是千帆师晚年移席南大后重现辉煌的，刘



永济先生是千帆师的老师，他的道德文章也间接地影响着我们。饮水思源，我谨以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前来向刘永济先生这位老师的老师表示敬意。

千帆师的《忆刘永济先生》一文，情文并茂，感人至深。文中回忆刘先生的生平业迹，其荦荦大者有两点。

首先是刘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创作成就。文中介绍了刘先生的20种学术著作，指出这些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然后又反复加以修改的”。千帆师还总结了刘先生治学的两大特点：一是由博反约，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好学深思，多闻阙疑。正因如此，刘先生对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深为不满。千帆师也高度评价刘先生的诗词创作艺术造诣极深，总是缘事而发，绝无无病呻吟之作。总之，刘先生既是杰出的学人，也是杰出的诗人，正如千帆师所说：刘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内，从研究到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其次是刘先生的品行与人生精神。文中指出：“求真是贯穿在先生五十余年为人治学中的一根红线。基于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先生一辈子都处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他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尤其注重民族气节。”在教导学生、指点青年教师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等方面，始终谦虚谨慎、宽厚待人，即使在受到冤屈、迫害时仍不失儒者气象。

重温千帆师对刘先生的回忆，使我联想到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认为刘永济先生就是一位古之学者。对先生来说，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热爱已经内化为生命的需求，所以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千帆师回忆到一件往事：1941年，千帆师与刘先生在乐山结邻而居，每天清晨都听到熹微晨光中传来刘先生的读书声。此时刘先生年已55岁，早已名满海内外，仍然如此刻苦。

千帆师又提到，刘先生治学范围极广，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等方面修养极深，但他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心得见解。可见刘先生治学，绝不是追求名声、地位等身外之物，而是出于对传统学



术文化的由衷热爱。同样，刘先生培养学生，提携后进，也是为了让让他热爱的传统学术文化后继有人。也就是说，学者与教授这双重身份，在刘先生身上有着天然的同一性，我认为这正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孔子开始，优秀的学者与优秀的教师就是一身二任的。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一部《论语》，就有许多警句格言是与教育相关的：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愤不启，等等。正因孔子造就了大贤七十，小贤三千，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孟子甚至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一乐，是比“王天下”还要重要的人生乐事。要问学者与教师两者的结合点在何处，我认为就在文化的传承性上。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继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果说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种人亡政息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我认为教师就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也好，授业也好，都是指文化的传承而言。业是重要的，它指知识和技能。道更加重要，它指观念和思想，指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基本文化精神。庄子说得好：“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解释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刘先生、千帆师等“五老八中”，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学人，就是这样的一根根红烛，其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他们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

中华传统文化历数千年之发展，在近现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激进思潮的无情冲击，使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举步维艰，借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在那个艰难时世，以传统学术文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前辈学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坎坷、挫折，乃



至屈辱和迫害。但是他们始终追求理想，始终坚持真理，他们决不哗众取宠，决不曲学阿世。他们用整个生命维护着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神和尊严，并用著书立说与培养后学两个手段实现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薪尽火传。

时至今日，举国上下都认识到应该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继承首先要落实在以传统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观念文化，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乃至思维方式，这才是列祖列宗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软实力和正能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更加怀念刘永济先生那一代学者。身教重于言教，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当然值得我们深思、揣摩，前辈学者的立身行事更值得我们缅怀、仿效。当我们研读刘先生他们的学术著作时，获得深邃的知识和探索的眼光当然是直接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继承其人格精神和学术精神，诸如追求真理而决不媚俗，献身学术而决不趋利，这才是我们最应关注的重点。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朴实无华的学风是许多前辈学者的共同风范，也是所有大学、所有学科点都应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所以“五老八中”不仅属于武大，也属于整个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纪念刘永济先生，也是在纪念曾与刘先生同样为继承、弘扬传统学术文化做出贡献的所有老师，是当代学人对前辈学者的一次集体性的深切缅怀。

使我感到万分欣慰的是，今天有这么多后辈学人在这里济济一堂，隆重纪念刘永济先生，这说明我们所珍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长久传承下去，因为传统文化本是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江大河必将在华夏大地上永远奔流。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4 月 27 日，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聂作平

抗战期间，李约瑟在访华时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说的是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



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乐山师范学院官网截图)

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陆沉，也一定要浇开自己的花。

此文同样献给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他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暗示。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中顿时生出一些长久的感



动。照片上，一艘轮船正在前行，船舷边，两个年轻女子凭栏远眺。她们短发旗袍，面容优雅、沉静，像是在做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却很残酷：她们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了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遥远的异地。

80年后，顺着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团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汇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两个年轻女子当年将要去往的地方——乐山。

身为四川人，乐山我自然去过多次。不过，这次却迥异于从前。这次，我是为了寻找那些远逝的足迹。汽车音响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歌曲——《当年》，包括两个年轻女子在内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无比熟悉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们时代的最强音：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

我们要做主人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



武大学生乘船西迁途中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目的地：乐山

1943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送客人出门时，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



光潜、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站在三人中间的王星拱神色严峻，略带忧郁，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更叫人惊悸于光阴的疾速与韶华之易逝。

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乐山岁月无疑是王星拱记忆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同乡。早年，他留学英国，习化学。学成归国后，与陈独秀过往甚密，并为陈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间，在他和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得以逃脱北洋军阀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将离开武汉时，王星拱已担任校长四载有余，至于他服务于武大的时间，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敌强我弱，“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无前例的西迁已是必然。比如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记里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为此，刚刚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

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由王星拱牵头，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杨端六任委员长。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至于为何选择乐山，王星拱在给上级的呈文里总结了六条：



- 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偏西。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 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记忆中，刘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战争带来的动荡中度过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轰炸，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父亲只好带着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汉大学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气为他拜了4对干爹干妈——阅读相关资料，我发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常有让儿女拜自己的朋友为干爹干妈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抱团取暖，毋宁说是共同的三观让他们乐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汉生活5年后，刘保熙9岁时，他的父母再一次带着他离开已经视为家园的珞珈山。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乐山。很多年过去了，刘保熙还记得9岁时的那次远行。那是一只水上轮船，速度很慢。船过三峡，两岸秀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旅客，他们纷纷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长马上广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武汉到乐山，今天的公路大约1200公里，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如果是飞机，则不超过两小时。但是，80年前，飞机还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东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体系。因此，从武汉到乐山，最主要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溯长江抵宜宾，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达乐山。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81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7年暑假，执教于武大的朱东润回到老家江苏泰兴，其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乡，但变化比计划还快：日军突然占领了邻近县城，泰兴也随时可



能沦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乡学校，此时极可能爽约。进退失据之际，他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 1939 年 1 月 15 日前赶到学校。

朱东润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留下妻儿老小，独自前往几千里外的乐山。接到电报那天，是 1938 年 12 月 2 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匆匆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弃舟登岸，坐火车到河口，再从河口回到国内，直达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车赶到贵阳。在贵阳，已经很难买到车票，他只好搭乘装汽油的货车前往重庆。路过娄山关时，风雪交加，路滑难行，汽车差点滑进深谷。心有余悸的朱东润抵重庆时，已是 1939 年 1 月 8 日。

那时候，重庆有通往乐山的班车，但朱东润一打听，车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说，朱东润根本没法按学校要求在 1 月 15 日前赶到乐山。

焦急的朱东润在重庆街头乱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听，得到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拟开通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定于当月 11 日开行第一班。不过，票价贵得离谱：120 元。120 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朱东润到乐山时，在一家饭店包伙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 12 元。以此推算，120 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两万。

朱东润花费巨款买了一张机票。11 日和 12 日，重庆大雾弥漫，无法起飞。直到 13 日下午一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乐山街头。

2004 年，就像暮年的朱东润回首往事一样，80 岁的齐邦媛也在海峡对岸检点她的一生。在回忆录《巨流河》的开篇，这位老人写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窃以为，这所谓二十世纪的巨大悲伤，大江大海的黍离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种悲伤，则与她早年的求学生涯不无关系，那就是追随西



迁的武大。

齐邦媛一直深深地记得 1943 年 8 月底的那个中午，一家人从重庆出发，坐船前往乐山。是时，天降暴雨，父亲的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淌成一条水柱。更要命的是，破旧的船上，拂晓醒来时，母亲身下流着血，一岁半的妹妹却不见了踪影。与此相类似的是另一位武大西迁者的记忆：船过三峡时，武大一位职员的孩子掉进江中，尽管母亲悲哭长嚎，但没人敢停下来救那个可怜的孩子。

宜宾停靠一夜后，齐邦媛一家换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忆录里写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

武大西迁始于 1938 年 3 月 10 日，到 6 月下旬，全校师生计 1 200 余人抵达乐山。西迁的师生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其中经济特别困难者，由校方补助 15 元。学校分别在宜昌、重庆等地设多个办事处以资接应。

实话说，与浙大西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准备充分，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有些师生为了一张船票，竟然等了两个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病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无路可退。

追寻武大脚印

我的朋友老孙是武汉人，不过，他定居乐山已经有些年月了。由于兴趣与工作，他对武大西迁历史如数家珍。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跟随两只为春色痴狂的蝴蝶拾级而上，登临一座满眼翠绿的小



山。小山是乐山老城制高点，名叫老霄顶。

站在老霄顶高处，透过香樟树和桂树繁茂的枝叶，向远处看，起伏的房舍之外，是白练般的大渡河；铁色云低，河畔天际线下，矗立着那座举世闻名的大佛。低下头看近处，绿荫掩映，藏着一片红墙黄瓦托举的古建筑。那是乐山文庙，也就是武大当年的总部和主校区。

我们站立的位置数十米外，在当年有一座简陋的礼堂，礼堂里，冯玉祥、陈立夫、郭沫若等要人曾慷慨陈词。如今，礼堂早已荡然无存，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再也找不到它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不过，我想起了一张当年留下的老照片，那是从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拍摄的。照片上，大渡河与乐山大佛的侧脸都和今天一样。只不过，挡在它们前面的房舍却面目全非。在和强大时光的对峙中，唯有记忆与山川，或许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文庙要算最具中国元素的建筑。作为孔子的祭祀地，两千多年间，文庙遍布宇内，最多时曾有一千六百余座。除了祭祀孔子，文庙同时也是县学、府学所在地。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隐藏于西南地区大小城池中的文庙，其时，它们虽已失去了封建时代县学府学的功能，却意外地华丽转身：成为众多内迁大学的办学地。像西迁湄潭的浙大，它就设在湄潭文庙。至于武汉大学，从确定迁乐山时起，乐山文庙——当时还习惯称为嘉州文庙——便是预设了的流亡时期的武大总部。

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朝，后被大水冲毁，明朝中叶搬到老霄顶下。比较有意思的是，多年来，由于文庙为某中学管理，并不对外开放，如果在导航里输入乐山文庙的话，自以为是的导航系统会自动调整为乐山下属的犍为县文庙。王星拱和两位下属的那张合影就是在乐山文庙里拍摄的。

今天的乐山文庙大约十多亩，比当年略小。穿过空旷的庭院和冷寂的大成殿，我找到了最里进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房中空无一物，屋角结了些蛛网。这座房子叫崇圣祠，它是每座文庙必有的，用来祭祀孔子的父亲。一张老照片上，我曾看到过 80 年前的崇圣祠。与今天的仿建相比，它是一排绿树深处的小平房。那时候，这



排三间的小平房既是校长室，也是教务长室，还是会议室、工友室和储藏室，王星拱校长就在此办公，并在此接待了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诸多重要客人。

稍有闲暇，王星拱缓缓走出办公室，前面是大成殿。大成殿乃文庙主体建筑，供奉着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四个弟子。当年，武大图书馆就设在相对宽阔的大成殿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年西迁诸校中，只有武大是一步到位的，因而其图书、仪器保存最为完整。当浙大、联大都为大量图书的损失而窘迫时，武大却拥有最为丰富的藏书。不仅如此，武大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购买图书——这些图书的相当一部分购自海外，先运到香港，再辗转进入内地；太平洋战争后，香港为日军所占，只好先运到缅甸，再经滇缅公路到乐山。此外，像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曾是武大乐山时期的图书馆馆长。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注视下，图书馆里挤满了自修的学生，除了书页翻动的哗哗声和偶尔的一两声咳嗽，没有人发出多余的杂音。

大成殿前面是古木苍苍的庭院，庭院两侧，是年代久远的老建筑。两座钟楼式的阁楼遥相呼应，它们分别是法学院和文学院的办公室。阁楼之下的东西两庑，大小 14 间屋子，是文、法两学院的教室。这些教室，大者可容 90 人，小者只能容 30 人。王星拱时常绕过大成殿里那些危乎高哉的书架，信步走到殿前的台前上，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从各间教室里传来的教授们南腔北调的讲课声。有时，一些不怕人的乌鸦也在庭中的古树上沙哑地叫着。

教室狭小阴暗，图书馆人满为患，幸好乐山多的是茶馆，学生们便到茶馆里用功。但这仅限于男生，齐邦媛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武大男女生比例为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教材不足也是必然。朱光潜为学生开《英诗金库》，但该书全校只有 6 本，只得 3 本分与男生，3 本分与女生，由他们各自按课程进度先抄写再上课。齐邦媛为此专门去纸厂买了 3 个精美的笔记本，那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50 多年后，当齐邦媛已是白发如雪的八旬老人时，当年的笔记本还珍藏如初。与笔记



抗战时期，乐山文庙大成殿曾是武大图书馆(南方周末资料图)

本一起珍藏的，还有她对朱光潜的清晰记忆。

齐邦媛记得，朱光潜用英文读到“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突然忍不住取下眼镜，泪水流满双颊，他“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小小的乐山城一下子涌进一所一千多人的大学，根本没法找到足够大的地方容纳，教室自然分作几处，宿舍更是化整为零。

白塔街是一条徒有其名的小街，不仅我没看到白塔，即便 80 年前的武大师生也同样没看到。不过，白塔街曾经的那栋白色洋楼，却是每个经历过乐山岁月的武大人都记得的。

那所白色洋楼就是女生宿舍，公认为武大最好的房子，学生们将其称为“白宫”。据杨静远回忆，由于房少人多，只有三、四年级的师姐才能住，一、二年级的学妹们只能住在白宫脚下的中式平房。这些平房潮湿破旧，如同王宫下的鸡窝。杨静远在 1941 年 11 月 10 日的日记里说：“早上下雨，院子里又湿又滑，难走极了。我端着一盆水，差点儿跌一跤。”

齐邦媛印象中，杨静远羡慕不已的白宫，其实也就是一栋普通的四层建筑。它系教会所建，勉强可容百来人居住，自成院落，比较安全，显然是安顿女生的最佳之选。但由于年久失修，“既不白也非宫”。当然，齐邦媛也承认，与男生宿舍相比，白宫还是要



“好得多”。

男生宿舍有六处，每一处都无一例外的阴暗破旧，拥挤不堪，不仅多老鼠，甚至还有蛇虫出没。并且，还发生过因宿舍门外没有路灯，几个学生从高处失足跌下造成严重伤亡的惨剧。

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陈西滢和凌叔华则是她的干爹干妈。1941年，18岁的杨静远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来到父母执教的乐山。最初，她们一家住在城中心鼓楼街，同院的还有后来任武大校长的周鲠生和法学院院长刘秉麟。但日机轰炸后，小院化作瓦砾。杨静远回乐山时，他们家已迁到岷江边的一座农舍。此后，杨静远考入武大，在乐山度过了大学生涯。

那也是她的青春时代，从18岁到22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这座三江汇流的小城，她朦胧的情意、炙热的初吻都被她写进了日记。她曾穿过黑沉沉的街道去看演出，也曾和同学组织民工识字。春天来时，阳光筛过梨花洒在她和男友身上，小鸟在他们头上叽叽喳喳地欢叫。年轻人们一边恋爱，一边热烈讨论国家的前途。几十年后，当我走在杨静远日记里多次提到过的陕西街、白塔街时，一切都已和昔年判若云泥，但我分明感觉得到，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它既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也隐隐让人明白，即使大地陆沉，山河破碎，但生活总要继续。青春无论在多么艰危的环境下，也一定要开出自己的花。

昨天已经消失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在乐山市区交汇，形成了一个U字形的半岛。大凡城市的兴起，总是那些易于交通的要津之地，因之，这个半岛，也就是千百年来乐山老城区。与今天庞大且日日新的新城区相比，老城区狭窄而衰败。但80年前，当五湖四海的武大学子来到川西一隅时，这座U形半岛就是他们生活的最主要空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要等到8年后抗战胜利，才能在半岛最南端的码头买舟东下，重返久违的故里。



深处内地的乐山，古称嘉州，自古以秀丽的山水和发达的井盐业著称。同时，这里的紫土丘陵，也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农业区。尽管半壁河山沉入血海，但武大初迁时的乐山还是一片难得的安宁之地。

叶圣陶于 1938 年年底到武大任教，初到乐山，他发现这里街面整洁，物产丰富且价格低廉，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赞说，“此间生活便宜”，“以生活情况而论，诚然安舒不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尤其是日机对乐山的大轰炸后，生活开始由安舒变得艰难。

1939 年 8 月 19 日，36 架日机飞临乐山，一番狂轰滥炸后，四分之三的道路化为瓦砾，民众伤亡达三千余人。以这场大轰炸为界，武大师生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天壤之别。

漫画家方成在乐山度过了 4 年武大时光，作为化学系学生，他在五通桥黄海化工研究院做过研究，论文还在中国化学会年会上宣读。业余，他用漫画记录了武大师生生活的窘迫：买菜，做饭，缝补破旧的袜子，为谋口饭吃而奔波。画家关山月有一幅国画《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上，一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坐在简陋的农家灶前，一边烧火，一边读书。这幅画并非虚构，而是纪实，画中人就是武大教授李国平。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算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不是战争，他们都能过上优渥舒心的生活。但战争是个不讲规则的对手，它改变了亿万兆民的命运，包括教授。乐山被炸以及战争的全面铺开，西南成为唯一可以肩负复兴重任的大后方，物价暴涨，日甚一日。1940 年和上一年相比，许多物品涨价竟至十倍。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是知名作家，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攒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物价飞涨后，打了七折的薪水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为此，她不得不荷锄汲水，灌园种菜。杨静远在日记里悲愤地为她鸣不平：“她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现在却眼看着要饿死。”工学院教授郭霖，初时也慷慨捐款 1 000 银圆，并自行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送往前线。急公好义如此公，后来也因生活贫困，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同样英年早逝的教授还有不少，如黄炎培的长子黄方刚。李约瑟到武大时，黄方刚向其作了“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不意天妒英才，黄方刚于1944年因肺病去世。闻此噩耗，顾毓琇哀歌当哭。悲痛的文辞，既是对好友夭亡的追悼，也是生逢乱世的读书人的自挽：“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

王星拱贵为一校之长，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我记得靠每月的一袋平价米生活，米中有老鼠屎、沙粒，霉变成灰色，难以入口。我家在门前篱笆外种菜养猪，母亲还打猪草，日子过得很艰难辛苦。”

教授如此，学生更是等而下之。幸好，国民政府向学生发放有贷金，数额虽少，尚能填饱肚子。

1940年，武大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1363人，男生营养不良144人，营养中等916人，比较好的仅117人。比营养不良更严重的是缺医少药。1940年，武大平均每天有40余人患疟疾，但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每天至多只有10支。

从1938年到1943年的5年间，武大学生因病死亡者竟超过110人，死亡率高达8%，为此，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扩再扩，乃至于学生们把它称为“第八宿舍”——事实上，武大只有7座宿舍。章心绰解释说，“一个同学得知某同学去世，他将此不幸消息告知另外一同学时，说：‘某某同学搬到第八宿舍去了。’这绝非幽默，而是不愿说出那使人悲伤之事。老同学向新同学介绍情况时，往往会说：‘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今天在第八宿舍。’这是一种表示哀悼的说法。”

时过境迁，扩张的城市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几经寻访，我也没能找到传说中的武大第八宿舍。倒是在老孙的指引下，我来到了乐山师范学院足球场。球场上，一群学生正在踢球，青春的朝气和春天的阳光一同扑面而来。然而80年前，这里却是一个名叫西湖塘的小小湖泊。大轰炸后，时值盛夏，大量死者——其中包括武大师生十余名——大多被草草安葬于湖中。西湖塘就此成为一片平



地，只有这个不合时宜的名字沿用至今——一座足球场，它的名字居然叫“西湖塘”，怪诞之中，却隐藏了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伤痛。

作为昔年的武大总部，乐山文庙近年终于从某中学收回，由文物部门管理，并开始修缮，据说将打造成景区。空荡荡的庭院中，摆放了一些展架，是一些关于武大的史料。我注意到几排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只有 20 来岁，气质儒雅、斯文。他们便是夭亡在乐山的部分武大学生。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他们像苏步青号召的那样“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青葱般的年龄，他们却成为客死异乡的孤魂。或许，如果后人还记得他们，还记得有一所在烽火中化蛹为蝶的大学，他们就会魂兮归来。

外婆的锦瑟年华

乐山师范学院是乐山本地的一所普通高校，地处老城区。武汉大学昔年的多处遗址，大多纳入了乐山师院的校园：工学院教室变成了师院南馨苑，工学院图书馆变成了师院美术学院办公楼，实习工厂变成了师院附小。

大概鉴于这种空间上的承续，乐山师院校史馆里辟有一间小小的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纪念堂的展墙上，布置着数量众多的黑白照片——他们就是那个年代这所学校的主角儿。我徘徊其间，仔细打量。我知道，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长辞尘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那一代人已经凋零殆尽。唯有这些当年的黑白照片，还定格了他们青春的模样。

我注意到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女子 20 来岁，齐耳短发，剑眉大眼，嘴唇紧抿，神情中透出一股倔强和坚毅。她的名字叫涂主珍，武大化学系学生。陪同参观的师院教授杨晓军先生给我讲了一个他的同事的故事，这个故事，便和照片上的涂主珍有关。

杨晓军的同事叫陈熹。陈熹硕士毕业后到乐山师院执教，其后，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冯学峰教授的博士。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 2013 年，冯学峰教授来到乐山师院，陈熹陪同老师参观刚落成不久的武大乐山纪念堂，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这段历史。



纪念堂里，当陈熹看到墙上张贴的涂主珍的照片时，她愣住了。因为，她们家也有这样一张照片。并且，已去世的外婆也叫涂主珍。曾经的武大化学系学生涂主珍，是否就是自己的外婆呢？向亲人们询问后，陈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从那时起，作为晚辈，陈熹才知道自己的外婆早在 70 多年前，曾历尽艰辛来到乐山，就读武大。她也第一次知道，外婆在 20 多岁的大学生涯期间，还有过一段不凡的经历。

那时候，乐山有一种很普遍的地方病，叫跏病。患者四肢无力，病情严重者有死亡之虞。武大进驻乐山后，校医董道蕴发现跏病与食盐中的氯化钡中毒有关，而一种叫马前子的中药对此疗效显著。后来，化学系学生涂主珍和彭少逸（后为中科院院士）对马前子进行提炼，制成药品，从而使得肆虐多年的跏病就此绝迹。

关于此事，叶峤教授曾撰文记述：“初到乐山，跏病确实吓人。教授们有的因跏病轻，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只好携眷东归，另谋出路。幸校医董道蕴先生发现此病系钡中毒，于是他试着用马前子碱救治，果然有显著疗效。后来，化学系学生彭少逸、涂主珍等人，从中草药马前子中提取精制，有了这种药，武大跏病才得以制止。以后乐山邑人推广引用，救治了不少人，使乐山人民对武大同仁一直很友好。”

一个校医外加两个在读大学生，竟能攻克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顽疾，颇有些难以想象，但偏居一隅的武大却做到了。

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研究武大以及和它有着相同命运的浙大、联大，它们在困境中的崛起与逆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这一点，1943 年从成都前往乐山就读武大哲学系学生、日后的著名哲学家萧蓬父总结得好：“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蜗蟠，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西谚说，由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将打败由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虽有夸张，却说明了领军者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如同竺可桢之于浙大，梅贻琦之于联大，王星拱也是武大的领军者和灵魂人物。他曾说，“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



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武大校长任上，王星拱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并行。

就理论来说，乐山期间，王星拱说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时候，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创建了中国唯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传记《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李约瑟感叹：“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就应用来说，武大师生对乐山丝绸业、盐业等工业进行了调查，参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盐碱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新办的矿冶工程系和机械工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机械人才，还为乐山最兴盛的井盐业和采煤业设计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台吸卤机；找到了治愈跛病的秘方……

武大在川8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在各校中名列前茅。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45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国第四。此时，这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学，已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乐山八载，数千武大学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锦瑟年华，从中走出的佼佼者不乏其人，诸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设计者黄孝宗，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海浪理论奠基人文圣常，逻辑学家李匡武，历史学家严耕望，经济学家刘涪源、刘诗白，法学家端木正，数学家张远达，化学家彭少逸，生物学家张致一……

194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告武大，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武大有9人入选。胡适在考察武大后深有感触地说：“你如果要看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房龙在评价安徒生时充满激情地写道：“上帝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



能实现他的梦想。”

我以为，这评价也适合西迁时的武大师生，以及同样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他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东北大学），等等——他们都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他们都是艰难岁月里在心灵中孕育火花的沉默小男孩……

王世杰（字雪艇）是武大首任校长，尽管他此后还出任过教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等要职，但他心目中，武大校长是分量最重的。1938年3月底，已经不再是校长的王世杰和李四光一起回到武大校园，其时，武大师生已开始了溯流而上的西迁，春天的校园一片忙乱，人心浮动，盛开的桃花更加重了这种离愁别绪。王世杰站在桃树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多年以后，当王世杰垂垂老矣，他留下遗嘱，要求后人为他立这么一块墓碑：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王世杰的遗嘱让我联想到了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尽管曾贵为总统，但他的墓碑上刻的却是“独立宣言和弗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竹公溪是大渡河的一条微不足道的支流，它弯弯曲曲地从乐山老城区穿过。多年以前的竹公溪畔，叶圣陶曾沿着小径散步，杨静远曾和男友一起踏青，钱歌川等人曾赁屋而居。春天的竹公溪水量丰盈，夹岸都是绿得发暗的树林和草地。多年以前，那些溯流而上的读书人，他们也曾见识过溪流滋润的人间的春天。

时光飞逝，哲人其萎。多年以后，当我再度追寻，往事已经苍老，一个曾经鲜活生动的时代杳杳远去。追寻中，或许，还有一些浸入骨血的基因生生不息。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8 年 5 月 18 日，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2018 年 5 月 17 日）



一场关于下雪的记忆

申思婕

杭州下雪了，在农历新年到来的前夕。

我先是在手机上看到雪的，激动的情绪要冲破屏幕漫出来。我打开窗，却丝毫不见地面的白色。天是灰蒙蒙的，像摄影棚内浅灰色的幕布。家家户户的窗户上满是呵气，朦朦胧胧的，让人感觉孤孤单单的。

我是不喜欢雪的。这是实话。它与我痛苦的上学记忆勾连在一起。我的家在北方，每一年的冬天都要下雪，厚厚的雪，脚踏下去没了脚踝，甚至没了小腿。下雪了，水平不高的司机自然是不能开车了。如果爸爸不在家，我就只能走着去上学，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又冷又困。稍不注意，还要摔一大跤。骑自行车的人就更惨，总免不了连人带车翻倒。反正一切的节奏就在不停的摔跤中被打乱了，又因为雪天路滑被放慢，弥补的方法就是所有时间提前，压缩睡眠时间。

而我是最喜欢睡觉的。睡不好，一整天都要发脾气。上学时我常常迟到，下雪时就到得更晚。迟到的同学要站在教室门口，或者站在讲台上，让所有人围观。一开始我觉得难为情，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可见被别人指指点点的痛苦远不如没睡醒来得难过。下课的时候，被罚站的人是不能活动的，就有调皮的人故意把雪球塞到我的脖子里，刺棱地一下冰，进而被皮肤的温热融化成水，湿漉漉地在背上流，又浸湿毛衣，一天都暖不干。

我生而热爱和平，最忌讳打打杀杀，自然也无法忍受打雪仗这



等事。而在漫天飘雪的北方，不打雪仗是不可能的事。小时候被同伴拉着打雪仗，因为不善战，手脚笨，我总是败得很惨。雪球砸在身上，痛。如果被人拉着在雪地上滑，我就更害怕，生怕一不小心几个人摔在一起。不过这些都还好，男孩子们的玩法更加暴力，直接把人按在雪地里，用脚踢着雪，把人埋起来。我始终无法体会这种游戏的欢乐点，可是所有参与的人，确实都开心地笑了。

基于这种难过，我决定逃离，逃到一个不会下雪的地方。大学时我想去广东，去那个传说中祖国最最温暖的地方，可是事与愿违，阴差阳错地就到了武汉。可是，没有鹅毛大雪的武汉，却比银装素裹的北方更冷。2013年的冬天，我到武汉的第一个冬天，只不过11月，我的被窝就冷得像铁，衣柜的衣服似乎能挤出水来。半夜冻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藏在被子里哭，现在想想，这才叫真的“被冻哭了”。

其实武汉的冬天是下雪的。只不过恰好全部被我错过了。大二那年，我刚回家不过两天，武汉就下了雪。电话的那头，他兴奋地同我讲述雪的降落过程，落在鲲鹏广场上，落在奥林匹克操场上，美得静谧，美得纯粹。我无法认同他的观点，却违心地附和。他是大西南长大的孩子，有关雪的记忆稀疏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常为冬天穿不穿秋裤争论不休。天刚转凉的时候，他第一次带我去外面吃饭，问我要不要放辣椒，我说少放一点，结果被他端过的食物辣得泪流满面。后来，我来到杭州，时常埋怨菜不够辣，汤没味道，却早已忘记为什么无辣不欢了。

因为种种司空见惯的原因，我们最终分开了，且一直到毕业都没有见面，也未曾道别。毕业离开那天，我最后一次检查宿舍，在抽屉的角落发现了一个挂着我们合影的钥匙链。那是三年了，他和我都年轻极了。我把它挂在门后的挂钩上，最后看了一眼。也许这间屋子未来的主人会看到，会想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欢笑，她的难过，她的爱，她的遗憾……她最终选择把一部分记忆永远留在这里，然后远走高飞。

一阵沸腾带来的咕噜声突兀地响起了。是充电暖水袋热了。这



份四年前的礼物，在四年后飘雪的冬天依然有温度。闹钟指向八点半，是上班的时间了，一切的一切，早就随着无数个下雪的冬天结束了。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13 级校友）



改革初年的启蒙老师

田 源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进入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5年8月，从温暖和煦的春城昆明来到湖北襄阳隆中的武大分校，令人难忘的大学生涯便由此开始。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田源（潘石屹摄影）

隆中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三国时代刘备为邀请诸葛亮加盟“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出自这里，而诸葛亮那篇脍炙人口的评点天下英雄的传世之作《隆中对》，更是让这个地名誉满天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考虑到战备的需要，为了防止苏联对中国突然袭击造成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全面启动了“三线”工程，把一些重要的战略性工业企业从城市搬进大山，也把一些战略性教育资源疏散到小城



市。武汉大学按照上级要求选择了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重要的文科系，搬到隆中这个古代名人汇聚的地方，创建了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两系师生才重新迁回武昌珞珈山回归总校序列。我有幸在隆中这个地方开始上大学，师从早年从哈佛、耶鲁、康奈尔大学回国执教的经济学家大师，与一批充满睿智思想的武大老师结下了终生友谊。我后来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裕宜教授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对我的关心爱护和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良师的鼓励树立信心

与许多今天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子不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初中毕业没有机会升入高中，16岁就离开城市到农场开荒种地、打井盖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知识青年生涯。在经过多年劳动锻炼和社会生活历练之后，被推荐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在那个年代，学习深奥的经济学原著，对我来说犹如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由于过去的文化基础太差，学习中困难重重，压力极大。记得有位从昆明军区来的纳西族同学，由于根本无法读懂深奥的经济学原著，学习压力太大，久而久之，竟然得了精神分裂症，我至今还记得亲自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情景。后来他实在无法学习下去，只好退学退伍回家。当时，由于进大学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一起学习的同学们水平差别很大，有的高中毕业，有的小学都没有毕业，学习同样的课程，每个人的感觉差别自然是天上地下。我当时的文化及综合知识底子也非常薄，学习时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许多经济学原著深奥难懂，往往读几遍还不得要领。记得第一次参加学习讨论会时，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有条理地发言，不知道什么叫论点和论据，更不知道如何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常感到与那些年纪偏大、富有社会经验的同学差距极大。

所幸的是，多年知青生活的历练，让我非常珍惜难得的大学学习机会，我坚定了从头再来的信念，默默地按照老师的要求精读经



典著作，认真听各科老师的讲课，做好每次布置的作业，认真应对每次或大或小的测验与考试，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一步一步地从似懂非懂的朦胧中走出来，逐步培养了伴随终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具备了认知现实经济的知识系统。



1975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1975级学员开始到工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二班三组被分配到宜城东方化工厂。大家边劳动边考察，了解了许多生产第一线的社会知识。在此基础上，我第一次执笔撰写了一份关于建立工业生产责任制的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里，我运用自己学习的经济学知识，分析了这家“三线”化工厂的管理体制，总结了该企业在建立责任制方面的经验。这份普通的学习实践报告是我的处女作。这次实习完成之后，每位同学都将自己的报告作为学习成果交给老师。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系主任李裕宜老师居然亲自看了我的这份报告。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李主任称赞我的调研报告是这次实践活动中最好的。听到这个评价，我感到非常地意外和高兴，它一扫我入学以来的心理阴霾，极大地树立了我在学习方面的信心，这个时候我才确切地感受到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了。

以爱才之心指点方向

1978年五六月间，我们1975级学生即将毕业，大家开始盘算毕业后的工作与生活。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后的首届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了，这个消息虽然在我们这一届学生中传开了，对我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并没有打算报考研究生。因为这



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首次招考研究生，很可能是大学招生史上最难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按照当时招生规定，这一次是10届大学毕业生全国联考，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前上学的5届大学生与“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5届大学生将要激烈竞争有限的名额。这对于我这种没上过高中、“文化大革命”中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说，考试胜算的概率是很低的。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不多，硕士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有着高大上的形象，几乎是高级研究专家的别称。因此，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报考研究生这件事，准备毕业后返回原单位工作。

当时经济系召开了一次大会，全系师生在一个大教室里听系主任李裕宜老师做招考研究生的动员报告。李老师全面介绍了国家设立研究生制度的必要性，这种制度着眼于培养高级人才，对于未来经济学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都有重要意义，他热情地鼓励全系年轻教师和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做完激动人心的动员报告、从讲台上下来之后，李老师问我：“田源，你准备报名考研究生吗？”我回答：“没有，我这水平是考不上的。”



1982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

他非常认真且肯定地说，“你应该报考，你有这个能力。再说，考不上也不损失什么，为什么不试试呢？”李老师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让我很受触动。这次动员大会之后，我给未婚妻打电话，告知了李老师的评价与建议，她告诉我，她本人也要报考研究生，希望我按照李老师的建议立即开始复习准备。就这样，在既有老师鼓励又有未婚妻督促的情况下，我内心的激情被点燃，马上确定了报考研究生的目标。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武汉三镇骄阳似火，我每天在宿舍、资料室、图书馆里挥汗如雨地复习功课，不仅把三年来学习的功课全部复习了一遍，还看了很多以前没有认真读过的经济学文献。功夫不负有心人，最



后，我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的笔试与面试，专业课居然还考了第一名，最终幸运地被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

终生的良师益友

考上研究生之后，我开始了系统的知识深造过程。我们在大学里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个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大时代。1978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从北京开始，逐步影响全国。那是一个举国上下讨论真理标准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极度活跃、争论不断的年代，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各种讨论新思想、新观点的讲座，我非常尊敬的董辅弼老师（后来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就在武汉大学做过一场关于所有制改革问题的讲座，他分析了传统国家所有制的弊端，大胆提出了“政企分开”与“政社分开”的改革建议。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董老师的演讲给我带来的犹如石破天惊、醍醐灌顶的震撼。这次讲座之后，研究生同学们经常在教室、宿舍里争论各种理论问题，诸如实践标准、商品经济、国家所有制改革乃至苏联、东欧的改革道路等。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开始走向不同的思想流派，有的激进改革，有的因循守旧，当时的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你到底信什么？

非常庆幸的是，研究生开学不久，李裕宜老师成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因此开始有机会经常到李老师家请教问题。在那个时期，李老师在思想上坚定地站在支持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边，他的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种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深刻理解和不断地再认识，帮助我迅速扩展了对当时关于经济改革必要性的认识。我经常在他家里与他一起探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常常探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大胆提出关于经济改革的各种观点。在师从李老师的三年间，我在思想上深深地受到他的改革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记得有一次，李老师从深圳经济特区考察回来，把我叫到他的家里，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在那里看到的各种创新性事物，讲到高兴之处，几乎是绘声绘色，使我如临其境，这些都更进一步加强了我对从事中国经济



改革理论研究的信心。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就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具有坚定改革意识和信仰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贯穿了改革的思维，虽然不够全面深刻，但从这时起，我已经开始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致力于经济改革方面的经济学学术研究。毕业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开始不断地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知名全国性学术刊物上。

正是在李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加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大潮中，不仅在思想上逐步成熟——坚定地信仰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开始关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与挑战。我运用经济学原理与研究方法，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个时候，我几乎读遍了各种有关改革的经济学著作和有影响力的论文。后来，我有机会转到国家经济改革的决策研究部门工作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一切都源于李裕宜老师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的言传身教，是他渊博的知识与先进的改革观，对我的世界观和理性思维能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裕宜老师在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还一直关心我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有着深厚的师生友谊。我多次到他家中看望他，知道他一直以我为骄傲。无论在大学做教师、在中央政府做研究、还是在企业做管理，我都在一直不断地学习和努力，去成就新的事业，希望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作者系经济系 1975 级校友）



说说被淡忘的民国武大工学院

涂上飙

现在武大的行政楼，曾是民国武大工学院的办公及教学所在地。20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时，武大工学院被整体调整出去。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当时的工学院慢慢淡忘了。当时工学院设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冶4个学系，有教员百余人、学生近千人。民国时武大工学院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对现在的大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断进取的学院发展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组建以后，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综合性大学可以设立文、理、法、师、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必须有三个学院以上者才能称其为大学，且三学院必须设有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不满三学院者为独立学院。学校在组建之初，先行设立了社会科学院、理工学院、文学院三个学院。1929年3月设立工学院，与理学院分立。6月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1947年建立医学院。最终实现了王世杰校长把武汉大学建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愿望，后来还建立了水利学院。

1929年3月，学校宣布设立工学院。经过准备，1931年设立土木工程学系，1933年设立机械工程学系，1935年设立电机工程学系，1938年设立矿冶系。石瑛、邵逸周、谭声乙、余炽昌先后担任院长。



石瑛(1879—1943年),字蘅青,湖北省阳新(今通山县)人。曾公费留学比利时、英国,回国后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国立武昌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前身)。曾任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他是工学院的开创者,曾明确要求工学院应该充实设备、明确规则,要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



邵逸周,安徽休宁人。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务学校毕业,获 A. B. S. M. 及 D. I. C. 学位。曾任英国坎诺契司煤矿测量科长、缅甸矿务公司工程师等职。1930年12月到校,此后一直为工学院院长直到1941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在武大任教期间,讲授过“工程材料”“冶金学”“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构造材料”“矿物学”等课程。还兼任过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矿冶工程系系主任。



当时的工学院可谓人才济济,四个学系都有不少知名学者。土木工程学系的邵逸周、陆凤书、余家洵、沈友铭都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教授有丁燮和、丁人鲲、王敬立、俞忽、涂允成、余炽昌、石琢、鲍鼎、陶述曾等。机械工程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邵逸周、郭霖、白郁筠、陶延桥、刘颖,教授有笄远伦、谭声乙、程干云、曾锐庭、崔克明、叶芳哲、庆善骅、蔡名芳、赵学田、高潜、周明瀚、吴礼义等。电机工程学系主任为赵师梅、陈季丹、周开基、周则岳、叶允竞、朱木美,教授有陈季丹、陈炳基、王子香、张仲俊、白郁筠、许宗岳等。矿冶系的邵逸周、黄培云都先后担任过系主任,教授有王若怡、丁道衡、许道生、周开基、周则岳、解寿缙、葛翔、华凤喆等。

许多教授都有海外背景,如: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陆凤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郭霖,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海军建筑科学士,在格拉斯哥大学研究院当过潜艇研究员;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赵师梅,是美国理



海大学机械电气科毕业。

教授中最有学术名望者要算俞忽。俞忽(1894—1959)，号子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1913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深造，1919年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后任职上海沪杭甬铁路局、平沈铁路局。1931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教授。1955年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改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后，担任建筑力学教研室教授兼主任。1955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毕生致力于结构力学的教学与研究，在钢架、拱桥、悬桥、拱等结构的强度和振动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专家，如著名机械工程专家郭霖、土木工程学专家缪恩钊、著名的桥梁专家余炽昌、著名矿冶学家邵逸周等都住在珞珈山东南边的教师第一住宅区，即现在俗称的一区“十八栋”。一区的生活是十分优越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部部聘教授、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宓，因为不能入住十八栋曾经耿耿于怀。他在日记中写道：夫宓在武大，不能与一区仙山楼阁(指十八栋)同处共乐。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郭沫若也曾在此居住。



20世纪30年代“十八栋”全景图

工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掌握工程领域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技能，毕业后能够担任工程领域高级技术人员、中等以上工业学校的师资、科学技术研究机关的研究人



员等。

土木系是工学院成立最早的系，服务国家的建设工程成绩卓著。设有测量仪器室、道路材料实验室、土壤实验室及模型室。在工学院主楼前排东边附楼办公。机械系初设有动力工程及生产制造两组，后又将动力工程组分为蒸汽动力组及内燃动力组，设有实习工厂、材料试验室、机械工程实验室、油料燃料试验室、模型室、绘图室、放映室等。办公及教学在工学院主楼。另有实习工厂一所在湖滨一带，占地 38 亩。电机系设有电力及电讯二组。后电力组再分为制造小组及发电小组。电讯组再分为无线电小组及有线电小组。设有电机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有线电视实验室、电磁测验室。矿冶系是 1938 年在理学院地质组的矿石标本金相仪器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设有地质矿物实验室、选矿实验室、试金实验室、分析实验室、金相实验室、高温实验室、容变实验室、矿山测量仪器室。该系在主楼外的西南附楼有三层大楼一座（内有地下室一层），大半学生在工学院大楼里上课。

工学院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和专业人才。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官至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34 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35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 年 2 月入党，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革命烈士聂之俊，1935 年考入工学院。在校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进步活动。1937 年 7 月，到应城汤池参加陶铸主办的第一期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学习，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4 月，被党组织派往竹溪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被国民党逮捕。1939 年 1 月 22 日被秘密杀害，时年 23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的郭佩珊，1935 年插班考入工学院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武汉大学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36 年，他参加了武汉大学进步组织——“九一八公社”和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1937 年 9 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后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工委组织委员。

著名城建专家潘基磧，1934 年考入工学院土木系。公路桥梁专家林祥威，1938 年毕业于工学院土木系。水利学家张瑞瑾，



1939年毕业于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赵耀东，1940年毕业于工学院机械系。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兴铃，1942年毕业于工学院矿冶系。被认为世界级权威的火箭航天专家黄孝宗，1942年毕业于工学院机械系。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效祥，1943年毕业于工学院电机系。理论电工和电子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1944年毕业于工学院电机系。两弹一星一飞船功勋专家庄国绅，1944年毕业于工学院机械系。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嗣瀛，1948年毕业于工学院机械系。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予，1948年毕业于工学院电机系。航天测控与遥测技术专家史长捷，1948年毕业于工学院电机系。

独具特色的办公大楼

当时工学院教师办公和学生学习都在著名的历史建筑——工学院大楼里面。工学院位于珞珈山北面中部，与火石山交接处，是学校第二期建设的主要工程。大楼正面与理学院相望。1934年11月—1936年1月建成，上海六合公司承建。建筑面积8 140平方米，总造价40万元。其中，1934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工学院主楼及四栋附楼



管理中庚款董事会协助建造工学院建筑设备费 12 万元。

工学院融欧式建筑风格与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于一体，四隅相对，雍容华贵，典雅大方。主楼为五层高的内回廊式方形建筑，外墙带有明显的侧角，四角重檐攒尖玻璃大屋顶，与外围的四座歇山顶附楼和正前方的两座罗马式碉楼相组配，形成了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工学院的后面是华中水工实验所，用于工学院教学实习之用。位于珞珈山北麓，面对工学院大楼南面，背靠珞珈山北坡，1935 年 8 月—1936 年 4 月建成，建筑面积 2 197 平方米，工程造价 9.89 万元，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35 年 10 月，湖北省政府、江汉工程局协助建造华中水工实验所 16 万元。该建筑屋面采用琉璃瓦歇山顶，屋内用弧型钢梁作屋别样，地面设有环型水道。但刚竣工两年的科研基地，在抗日战争中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厩。

工学院的学科在院系调整中被调整出去后，其楼就成为学校的行政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早期的工学院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1937 年 11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直到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失守，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成为指挥全国抗战的重要场所。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珞珈山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改变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作出召开国民参政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当时的工学院就是会议活动地方之一。

同时，为了整顿思想，集中抗战，国民政府还在珞珈山举办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分为高级将官班和低级校官班。蒋介石为团长，陈诚、万耀煌为正、副教育长，还有德籍顾问法肯豪森。每周一蒋介石都要在工学院下面的操场检阅军官，检阅前后都要在工学院里停顿休息。

此时的珞珈山还是共产党开展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成为共产党人联合南京国民政府协同抗日的重要场所。1937 年 9 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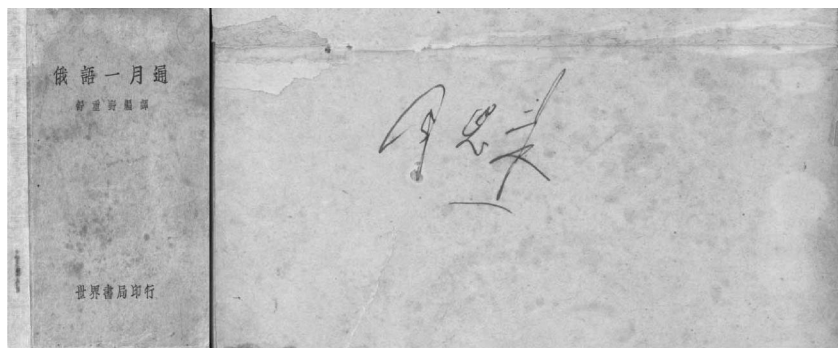
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工学院门前的操场检阅军官

央局。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等从延安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董必武、叶剑英等汇合，开展统战及抗战宣传工作。周恩来在武汉居住的10个多月的时间里，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武汉会战处于关键时期，为鼓舞斗志，1938年夏，周恩来在工学院前的大操场上进行了演讲。由于要讲的内容太多，连续讲了两个晚上。周恩来从晚七点开始，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据他的随从廖其康回忆：当时天气很热，周恩来上穿白衬衫，头戴灰色鹅蛋形凉帽。讲台设在工学院门前的石砌平台上，桌上铺着白布。听众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学校教师、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成员以及中学教师等，这些人都站在操场上。周恩来讲了抗日形势和统战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谈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中，学生们不时提问，如希望讲一讲延安的情况等。周恩来高兴地说：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是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模范根据地。那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他希望广大青年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为抗日服务。在讲演中敌机来袭，周恩来毫无惊慌之色，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还为学生签名。一个学生带了本《俄语一月通》，周恩来就在书的扉页上签下“周恩来”三字。如今这本小册子，一直珍藏在学校档案馆，成为留给全



校师生的珍贵纪念品。



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工学院操场作抗战演讲给学生的签名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来到依山傍水的武大视察。9月12日下午7时20分，毛泽东主席在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党政领导的陪同下，从西南大门进入校园直奔学校东北面的实验区域。视察完试验区域，毛主席来到位于工学院与理学院之间的大操场，来自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四校的师生员工13 000余人早早来到这里，等候着毛主席的接见。7时50分，毛主席来到工学院外面高高的平台上，亲切接见了四校的党政负责人并不断地向师生们挥手致意。7时55分，毛主席在众人的欢送声中乘车离开了珞珈山。为纪念这次接见，学校的大操场从此改名“9·12”广场。

毛主席之所以前往工学院接见广大师生，也许和他与武大的不少名人结下的深厚情谊有关，如李达、谭戒甫、陈文新等。他们或是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或有师生情谊，或为革命亲情。毛泽东与李达（1953—1966年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友谊既长远又深广，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友。毛泽东与谭戒甫（1928—1938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回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有着师生之谊。谭戒甫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英文老师。毛泽东和陈文新（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更是有着一种革命



的亲情。陈文新是烈士的女儿，其父亲是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同窗挚友，后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30年2月被反动派杀害。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学校工学院大操场接见武汉大学等四校师生员工

影响当今的学科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学院的实力可谓十分强大。当时土木系、机械系各有教授12人，电机系有教授7人，矿冶系有教授6人。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工学院各系都制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土木系内原先不分组，后分为结构、路工、水利三组。随着中南地区经济建设的开展，建筑人才极为缺乏，土木系于是延聘师资，添设了建筑组，准备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建筑系。

机械系自1951年起将动力工程组分为蒸汽动力组及内燃动力组，还受中南工业部的委托办理了两年制的机械制造专修科。在发展方向上，以动力及制造组为基础，配合全国及中南区经济建设计划，逐渐设立专业机械组和专修科，为工业建设培养工程师和专门技术人员。为适应中南区造船工业的要求，在系内增设有关造船课程，并拟逐步发展为造船工程组或造船系，拟将内燃组课程逐步充



实改进，配合武汉内燃机厂的建立。

电机系为配合国家今后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培养更专门的人才，将电力组及电讯组扩大。电力组再分为制造小组及发电小组。电讯组再分为无线电小组及有线电小组。此外，在 1952 年还增设电力专修科（修业期限二年），迅速培养中级以上电力技术人员，以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为配合教学及研究，电力方面准备增添高压实验设备及自动开关设备，电讯方面准备增添微波设备及电声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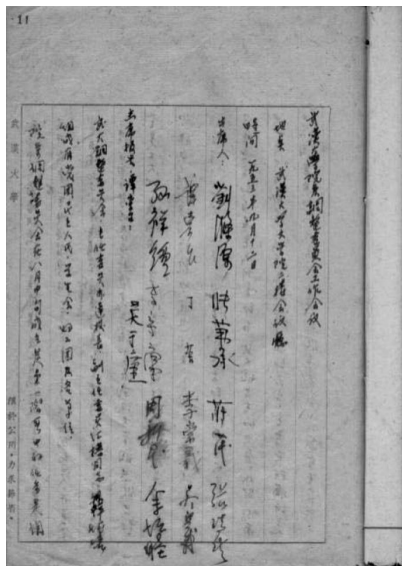
矿冶系为了配合新中国矿冶建设的需要，培植合格的中级、高级矿冶技术干部，准备增设探矿地质系或地质工程系，在此基础上设立一所矿冶学院。就矿冶学院的地点问题，认为应该有适当的政治氛围，保证受教育、陶冶的学生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要在有较好基础的理工学院附近，因为矿冶工程是需要很好的理工基本学识为基础的；要接近大规模矿区与新式的冶炼厂，以便就近学习、掌握新式大规模矿冶工业技术；要与教育部、工业部的办公地点较近，以便直接联系、随时接受领导与检查；要交通方便，便于同学四处实习。矿冶系的教师们认为在武汉建立一所矿冶学院条件是较好的，应该积极争取在武汉大学附近发展一个矿冶学院。

1950 年 5 月，应国家建设需要，湖南大学水利系划归武大，与工学院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成立了水利系，有教授 5 人。新成立的水利系开展了水工试验与水力学试验。水工试验受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委托，开始从事荆江分洪工程和汉川闸的水工模型试验。遵照教育部的指示，正在计划扩大范围，创设水利学院。1952 年，中南地区的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院校原有的水利专业调整到武汉大学，不久又将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北农学院及沈阳农学院等院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并入，成立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4 年水利学院独立出去，成为一所独立高校——武汉水利学院。

从 1952 年开始，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953 年 9 月，武汉大学成立了院系调整工作委员会。工学院的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调往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工学院



的矿冶系与湖南大学、南昌大学(民国的国立中正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及中山大学的地质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当时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查谦派往华中工学院,成为首任院长。工学院的四大学科专业调整出去后,对所在的学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的机械、电机专业,中南大学的冶金、矿业专业以及湖南大学的土木专业,在全国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应该说武汉大学工学院调整出去的学科都为这些学校相关学科的强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学校召开会议进行院系调整

(作者系历史系1984级校友)



我为什么上武大

汪晓清

题记：35年前，我从麻城一中出发，走向武汉大学。这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珍重的记忆。那时候，我是误打误撞、糊里糊涂报考上武汉大学的。若干年后再回首，假如上天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一定会再次选择武汉大学。亲爱的武汉大学，是你给了我宽容、胸怀、理想与爱。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句“谢谢”可以概括得了的。

35年前，我也和学弟学妹一样青春年少，满怀少年的憧憬。那时候资讯很不发达，对于我们麻城这样的偏远山区而言更是如此。当时，从麻城到武汉差不多要在破旧的班车上哼哧哼哧晃荡四个小时。冬天的时候，寒风从关不严的车窗以及其他众多的缝隙中飕飕地吹进来，双脚冻得生疼。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我对大学一无所知，老师们也提不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时候，我要报考的大学呢，远在天边遥不可及，更不用说有学校会派招生人员答疑解惑了。无知则无畏，所以当时一点都不像学弟学妹们和你们的家长这样千回百转、纠结万分。不过，我父亲还是很负责的，给我买了本《高考填报志愿指南》。那厚厚的一本书，我很认真地学习了，但还是弄不清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的区别。

就这样糊里糊涂而幸福无比（因为免去了选择志愿的纠结）地填报了武汉大学，从麻城山区来到了武汉这个大都市，来到了武汉大学历史系。



那时候班车只能先到汉口，然后学校派校车集中接回。那时学校接送车辆很少，当我们终于搭上人货混装的敞篷校车时，天完全黑了。车过长江大桥，武汉这个大都市第一次袒露在我面前，辉煌的灯火在长江两岸肆意绵延，令我这个山区的孩子惊奇不已。此后若干年，这个令人难忘的画面经常在脑海中闪过。

那时候，12路公共汽车开到武汉大学里面，沿路是高高的梧桐树、小书店和饭馆（这些都是当时武汉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在宿舍放下行李后，和家人找了个饭馆胡乱吃了点。回来时，找啊找啊，竟然在校园中半天找不到回宿舍的路。武大校园之广、道路之曲折可见一斑。就我个人而言，不喜欢横平竖直、一览无余，特别喜欢武汉大学这样的曲折有致，所谓曲径通幽，所谓柳暗花明，所谓处处有惊喜，便是我喜欢的武汉大学特有的境界。

那时候我觉得麻城一中（那时候一中还在南正街）已经够大了。当我第二天醒来，从宿舍到历史系办公室报到，第一次看到珞珈山，感觉武汉大学好像是没有边界的。我在校园走动，就像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树木葱郁，秋阳烂漫，这还是我印象中的、像麻城一中一样有围墙的校园吗？

后来我才知道，武汉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她的喜怒哀乐，她所肩负的责任担当，她的每一段历程，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缩影。武汉大学的创立要追溯到1893年，我们特别需要铭记、感恩清朝的张之洞老先生，而正式以武汉大学命名则在1928年。说起新的武汉大学，人们总会称道她无限的美丽和浪漫。而赋予她美丽和浪漫的，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我们黄冈人。是黄冈人李四光先生骑着毛驴，踏遍武昌的山山水水，又租了一架飞机，在蓝天翱翔，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之后，才选定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水宝地；而另一个黄冈人闻一多先生，把这座山更名为珞珈山，从此让这座山拥有了灵性、诗意和浪漫。作为一个黄冈的孩子，在这里读书学习，一种天然的亲切和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

在这么一所古老而浪漫的校园，每一棵高高的树木，每一条幽静的小径，都会让你肃然起敬。你会不由自主地想：是不是曾经有



一伟岸的身影在这里伫立？是不是曾经有一位伟大的哲人从这里经过？走进武汉大学，就和中国高校悠久灿烂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和许许多多辉煌绚丽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你的精神得到无限延展，你的境界骤然得到提升；因为，有他们和你同在，有他们给你勇气和力量。这是一种无声而独特的精神涵养，是很难用言语形容，也是很难比拟的。这些独特的体验，瞬间让人就觉得更加高大，更为自信，进而更加明确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目标以及肩负的使命。

武汉大学的独特，她与众不同的气质，通过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可以有真切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最热门的专业。我的理想是中文系，但担心分数不够，就填报了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这可能和现在有些学弟学妹们想的一样——先考上武汉大学再说。不同的是，那时候，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到可以转系，可以曲线救国。那时候，转系转专业少之又少（武汉大学算开风气之先，有少量转系），上历史系后，想上中文系的心依然蠢蠢欲动。当时有同学异想天开，说我们去找找刘校长吧。当时，武汉大学敢为人先、锐意改革，被誉为“中国高校的深圳”。武汉大学引领全国改革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就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先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刘校长自然不可能认识我。但心横胆子壮，感觉无路可退的我，莽莽撞撞闯进刘校长办公室说出了自己的诉求。刘校长和蔼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学生，因公务太忙，就让我把作品和材料转给中文系老师看看，再把意见转给他。得到中文系老师肯定的意见后，我又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几经辗转放在刘校长家门口纸糊的信箱里（敲门他不在家）。第二天，年级主任来找我，让我到教务处去一趟。我接过教务处老师递给我写给校长的信一看，信上有铅笔批示：“请教务处考虑作特殊情况处理。刘道玉。”幸福来得太突然，一时百感交集，几近虚脱。现在想来，我那时候敢去找校长，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肯定是自由开放的武大文化的激励。很难想象，在别的高校，有哪个校长会这么认真倾听一个普通学生的诉说；可能你连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校长会这么快给你处理结果。想想那时候转系转专业之难，现在的孩子是不够



幸福的了。

武汉大学有着最为齐全的学科体系，这也是单科或偏科高校很难比拟的。在这里，可以尽情领略独擅绝技、卓尔不群的诸多大师独特的魅力，他们与众不同的视角与睿智，让你豁然开朗，打开思维的另一面，发现世界的另一面。在这里，众多学科交叉融汇，同学们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锐。激荡智慧，砥砺思想，乐何如哉？

珞珈山的美丽自不待言。我曾经在《武汉赋》《珞珈赋》中，对武汉和武汉大学有着由衷的赞颂。在这个古老、美丽、浪漫、广阔的校园，有多少令人怦然心动的初体验值得去探索与发现！老图书馆那斑驳的桌椅，谁曾坐过？珞珈山上那弹痕累累的石头，又有怎样一段壮怀激烈？坐上春天的校巴，从烂漫的樱花树下驶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学是一段历程，除了知识的提升和学业的精进，更重要的还有视野、境界的升华。

作为一个从麻城、从黄冈走出的孩子，我深觉幸运，满怀感激。我在武大的校园中生活，在校园中慢慢变老，幸福着自己的幸福。

祝愿更多的孩子，走出家乡，走向武大，并从武大走向更远的远方！

（作者系历史系 1983 级、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七七忌日缅怀萧先生

吴根友

萧蓬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里，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个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发此文时，我更加深刻而真切地体认到，作为人师的萧先生对我的巨大塑造力。先生在世，授我以业、以道，并时常解惑；先生离世后，他的人格风范、道德情操，对武大、对自己专业的深情，继续感召着我。仅以此旧文纪念萧蓬父先生。“一个人的精神高度是一个城市的高度”。萧先生配得上如此的赞颂。

今天(文章写于2008年11月6日)凌晨4点20分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仔细数了一下日子，正是萧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四十九日。依照安徽农村的习惯，于七七之日凌晨起，在一块空地上献上后人给逝者的最重要祭品——灵屋，里面装满一切日常需要的物件，还有少量逝者生前最喜爱的物品，最后一把火把这些纸扎的东西烧掉，让它们通过缭绕的轻烟送给逝者，以便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过上没有风雨侵蚀、衣食无忧的生活。逝者的家属围绕火堆哭泣，并用桃树枝在周围不停地拍打，防止阴间的其他孤魂野鬼来抢夺这些物品。后人的哭声在另一个世界就是欢笑声，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仍能感觉到后继有人。这些习俗当然是中国民间质朴的宗教情怀，体现了阴阳两界的连续。这种质朴的宗教情感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就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气化论哲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些质朴的宗教情感逐渐被改造，再加上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形成



与发展，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亚文化传统里各种各样的关于阴阳、鬼神(仙)两界的宗教想象世界，从而对痛失亲人的人们的尘世悲痛给予情感上的慰藉。

萧先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诗人哲学家，在此世里他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反而经受了各种令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果有的话)，先生应该在诗人白玉楼里继续与夫人卢文筠教授的“萧诗筠画”的艺术情怀的浪漫。予生也晚，有幸追随萧先生问学求道十九年，自认为是萧先生门下一个永远没有毕业的学生。虽然早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也在现行的体制下评上了所谓的教授达七年之久，但无论在古典诗词的创作，还是哲学思考、教育学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等方面，都不及先生成就之万一。特别是在深入学问之堂奥的时候，越发觉得自己根柢浅薄，难堪大任，常常在心灵深处有一种深深的自我失望之感！由此，有时会产生放弃的念头。幸先生的门生中有深得先生之精髓者在，常予以鼓励，勉强继续问学求道之业。

相对于早先追随先生的门人而言，我是较晚进入先生门墙的。其时恰逢先生的第三次华盖之运时期。由于当时自己阅历浅薄，人生苍白，从学校到学校，经常无法理解先生的种种深微之意，但先生对于我的关怀、爱护、培养之情还是深深铭记于心的。大约是1991年春天的某一个日子，先生郑重地把我叫到他家中，非常含蓄地讲了自己的心情，最后说他都不想继续带博士生了，但出于对学生负责，还是要把我送出门。此事对我触动非常大！当时萧先生的门下只有两人，一人即是现在的师兄兼同事徐水生教授，另一个就是我。徐师兄因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没有就业之虞，而且其时正在日本留学，而我则是应届生，如果不能按期毕业，就无法找到工作，连生存都有问题。那是一个蔑视知识分子的特殊时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穷教授，苕博士。”(在武汉话中，苕就是蠢、傻的意思)听了萧先生的一席话，我这个“苕博士”(正确地说只是博士生)从内心感到了温暖。毕业论文的开题，先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仅开题的提纲先生就修改了三遍，从论文题目的拟定，到其中每个章、节、目的标题的表达，先生都仔细地推敲、斟



酌过。在进入写作过程中，还从整体上规定了论文的内在逻辑层次与外在章节结构的关系，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分成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各分一章，加上第一章绪论，最后一章结束语，共五章。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非常仓促的时间内完成的，当时的电脑业在武汉还是处于初步发展时期，打字员的水平有限，我的校对能力也差，论文的送审稿有很多错、别、漏字，然而我面临毕业找工作的生存压力，萧先生非常在乎我的毕业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帮我看稿子，并电话联系评阅导师，亲自写信给外地评审专家，让我送论文上门。现在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先生处在巨大的亲情痛苦中完成的，但当时我却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

由于当时已在武汉成家，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导师提出留校的事情。对此，萧先生不仅没有推脱，反而极力推荐，郑重地向系领导写了推荐信。其时的政治环境之下，萧先生深知自己的推荐不一定起作用，但他已经不在乎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了。最后，系里勉强答应我留校的要求，但不能留在中国哲学教研室，只能留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对于这样的决定，先生以他的“曲成万物”的智慧指导我，让我留在社会学教研室。为了家庭之故，只好再改一次行。其时，我心里非常地别扭与恐慌，因为我从中文系跳到哲学系，刚刚对哲学有了一点感觉，又要跳到社会学系，从事一个相当陌生行当的工作。说实话，做完博士论文后我才对哲学有了点理解，而社会学又是一个与哲学相当不同的行业。在这个领域里，萧先生仍继续指导我，首先为我找了一本陈定宏先生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并将他自己收藏的《中国荒政史》、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等著作送给我，还指导我看吴晗等人编写的《皇权与绅权》等著作。可以这样说，哲学博士学位获得后，我又继续跟随萧先生拿了一个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博士学位。因为，在萧先生的指导下，我花了五年时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最终以一本非常粗糙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材初步确立了自己对这门新学科的认知体系，而这本教材的出版，还是先生从他自己的课题经费里挤出了三千元的印刷出版补贴。要知道，当时他主持的教育部课题总共经费才三万元，而我并没有参与课题的任何工作，且并不具



备参与研究的能力。

1997年校内院系专业调整，社会学系要求归属于法学专业门类的一级学科，从哲学系分出去了。这时我终于回到中国哲学教研室，从此可以与先生一起工作了。在先生的关怀与培养下，我开始为教研室的老师们做一点服务工作，最主要的是回到了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领域来了，参与了由先生与许苏民教授主持的《明清文化名人丛书》的撰写工作。经过仔细讨论，由我撰写其中的郑板桥这个人物。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先生又像当年指导我写博士论文一样，对全书的立意、题目、章节目的标题拟定，都进行了严格的推敲，并把他收藏的有关郑板桥的著作借给我。

写完郑板桥一书后，1998年，我获得了一次竞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机会。此次竞选成功，主要的外在助因是先生向当时的哈研社主任杜维明教授的极力推荐，再加上郭齐勇教授的帮忙。竞选的学术选题也是与先生商量后确定的，继续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并深化这一选题的研究，以中西文化中个体主义的异同比较为题，希望能通过哈佛燕京的学术条件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研究提供方便。1999年9月，赴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做学术访问。这一年里，我的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为回国后修改博士论文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学术准备。虽然，目前出版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学术访问提供的资料与学术视野，博士论文至今可能还没有出版。而且，也正是这一年的学术访问，使我对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特别是对当时还在世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为我现在对中国政治哲学新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回想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每前进一步都与先生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生我养我，教我基本的做人道理者，是父母；让我成长，由文盲变成能识字、由识字变成有知识的人者，是老师；在知识的河流里，我们的人生每前进一步，每到达一个新领域，都是那些以生命作筏作舟的人师把我们送到了新的地方。用“师恩浩荡”来表达我对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的感恩之情，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而最终



把我引进学术殿堂，以学术研究为职志，把一个偶然的生命存在纳入一个与民族精神慧命“传薪”活动相关的历史行列里的，是先生！大恩不言报，不是不言，是不能用一般的文字所能言，而是要求受恩者时时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体认、反省，并以自己认识的高度与精神的深度来体知先生的恩德泽惠，使这种亦私亦公、即私即公的人类深度情感通过那些少数觉悟者，代代相传。

先生之学堂庠广大，思想深邃，他所著的《吹沙集》三卷是中国社会、也是人类的公共精神财富，自有他人去研究、评说，见仁见智、深浅自得，非得门人而私赞。然先生与诸门生之间的特殊感情，则因人因时而异而别有领受，非亲炙者难以体知。在工业化、程序化、官僚化日趋严重的现代教育大厂房里，像先生这样寓民族慧命传承于富有人文情谊的师生情谊之中的教学模式，益发显得珍贵。平生受业于两位恩师，一是中文系硕士生导师蔡守湘先生，再者就是萧先生。蔡先生为人生性豪爽，待人慈厚，视学生如亲子。那时研究生上课在先生家里，经常是上课后就在先生家吃饭。学生期间，食堂里的饭菜没油水，又是年轻能吃消化快的时期，嘴特馋。老师家的一顿饭能解三天之馋。蔡先生曾经与萧先生同在襄樊农场劳动过，生性好酒。据萧先生说，蔡先生曾经怀里挟着酒，看见他在放牛，就招呼他说：“老萧，过来，我这里有酒。”后来我报考萧先生的博士生，多得力于蔡先生的推荐。博士论文送审时，萧先生特别要求我送一份给蔡先生。蔡先生很谦虚，说看不懂。但还是用非常工整的钢笔小楷写了满满的两页评语。与蔡先生相比，萧先生待人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也非常关心学生，但更是寓情于理和礼之中。学生毕业时，他特别关注所有学生的就业问题，到处帮助联系单位。学生的家里出现了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大知识分子的宽裕。1989年之后，他的家庭在经济方面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然而，他对学生的关怀并不因此而减少。1997年3月至1998年1月，家母、家父先后去世。不到一年之间，我回安徽奔丧两次。由于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形成的城乡之隔，作为地道农民的父母亲是不在城里人的视野里的。双亲病故后，哲学系一级的单位是没有任何慰问的。但萧



先生两次都赠与赆金，以示慰问，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先生对曾经教授过自己的老师是特别尊重的。记得萧先生唯一到我家的一次，就是他闻讯中文系周大璞先生仙逝后托我给中文系送去吊唁周大璞先生的长长的黑色挽联。当时我住在武汉大学北区某栋的五楼，家里没有电话，先生亲自来到我家门口，上楼到我家后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后来，他给我讲他如何领受周先生的教育，对于周先生不拘一格识人才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件事在先生的《吹沙集》中也用诗文予以赞颂。先生当年收我为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拘一格的。以我当时那浅薄的哲学知识，何以能考进先生的门墙呢？在面试时，我竟然凭着自己刚刚读到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早期启蒙思想的相关文章，滔滔不绝地回答萧先生以及李德永老师、唐明邦老师提出的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尤其令人惭愧的是：在博士论文开题提纲的最后确定过程中，我竟然与先生展开辩论，让先生几次从椅子上站起。最后，先生非常激动地说：“今晚你听我说！”我听先生慢慢剖析后，基本上全面接受了先生的意见，只是写作过程中稍有小的调整。

当我动手写这篇文字时，正是特里尔大学附近的 Taffer 小镇教堂钟声敲响之时。每天早晨六点半，教堂的钟声准时响起。对于教区的人们来说，也许习以为常了。可对于我这个他乡之客，钟声却唤起了别样的感怀。汉语里有“晨钟暮鼓”一词，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却少了响彻村庄的“晨钟”之声，整个社会充斥着种种颂扬之声、歌唱之声、批斗之声、流行音乐之声、商贩叫卖之声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的轰隆声与喇叭声，唯独没有一种清脆悦耳、令人深省的钟声，而在精神界更是缺少黄钟之音。

我不敢说，也不愿说，像萧先生这样的黄钟之音已经绝于人寰。我写下这些点滴的闻钟之音的感受，并不是要向世人炫耀什么，只是以此来表达我个人生命的幸运，以非常拙劣的文字表达一种问学求道的足迹。

斯人已逝，德惠常青；凝为正气，四季赋形；春兰秋菊，各具



性情；桃李梅薑，百卉峥嵘；慧命之流，浩浩无竟！吁戏呜呼，仁智且诚。

（本文写于2008年11月6日，2009年7月31日改订几个错别字，2018年9月2日与9月16日再次编辑修改）

萧萐父(1924—2008)，著名哲学史家，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四川井研；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6年受邀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是现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并开创了“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独树一帜的珞珈中国哲学学派；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纪程》《大乘起信论·释译》等，编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鹏鹏飞》等。

萧萐父先生既是一位正直不阿、特立独行、儒道释兼容的智者，亦是一位敢恨敢爱、能哭能歌、富于激情的诗人，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是萧萐父先生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他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萧先生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执着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他自叙以诗歌升华人生、歌哭由我的超迈：“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

（作者系哲学系1989级博士生校友）



烽火 8 年，珞珈文脉在这条老街上 绵延

杨 琳

乐山市市中区陕西街，是一条充满闲适、幽静的生活气息的老街。不过，若时光倒转 80 年，这条街却热闹无比——抗战期间，众多机构内迁乐山，国立武汉大学众多教师就居住在此。这条仅几百米的街上，住了十几位教授，还走出过两位院士。除了陕西街，师生们还在文庙、白塔街、三育学校（现为乐山师范学院所在地）等地，度过了 8 年的烽火岁月。

时光流转，武大西迁乐山的往事渐行渐远，但也在被文化传承者们钩沉、打捞。2017 年，湖北作家张在军出版了《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一书，记录下了当年武大教师在此地生活的点点滴滴。2018 年 5 月，《乐山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建设 2018—2020 年行动方案》则提出要在校内建设一个“武大西迁历史文化带”，铭记这段历史。



当年的武大校门牌坊——棣星门（乐山师范学院宣传部供图）



壹 诸多名家带动炽盛文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全国高校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在乐山复课，众多武大教师在陕西街学习生活，这里为中华文明守住了一方文脉。

6月15日，背倚老霄顶、面朝大渡河的陕西街，“烟火气”十足：道路两旁眼花缭乱的饭店敞开大门迎客，菜农纷纷将新鲜的蔬菜一排一排摆在地上，老年人坐在活动室里悠闲地玩着棋牌……

陕西街得名于清朝，彼时，乐山这个水陆交通重镇吸引了大批秦晋商人，在此街建秦晋会馆，其中又以陕西人影响力大。久之，这街也就被乐山人唤作陕西街了。

1938年1月，武汉抗战情势危急，武汉大学派人到四川各处视察。根据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原校长王星拱的文章显示，当时乐山因无专科以上学校、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公私建筑多等原因，被认为是适合迁校之地。

1938年2月，武汉大学决定西迁乐山。3月，600多名教职员分批乘船溯江而上，2000多公里，一路栉风沐雨，在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均遭到日军轰炸，迁校物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4月29日，师生就正式在乐山复课，此时距决定迁校



当年的武大工学院大教室，亦名梅庄（乐山师范学院宣传部供图）



仅两个月。之所以复课如此迅速，是因为在2月武大的校务会议后，经济系教授杨端六与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便立即到乐山勘定城内外的文庙、龙神祠、三清宫、李公祠、三育学校等作为校舍，为迁校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乐山人民也对颠沛流离的武大人鼎力相助，修文庙，葺神祠……“在当时的环境中，乐山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乐山师范学院宣传部干事任志文告诉记者。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有文、法、理、工四大学院，学校本部、文学院、法学院、图书馆等设在文庙，工学院及实习工厂设在三育学校，理学院设在李公祠，至于师生宿舍，就分散在城内外各个地方，陕西街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处。

著名才女、作家苏雪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有“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之誉，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攒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她当时便任教于武大，租住了陕西街49号一所名为“让庐”的中式楼房，一住就是8年。在这里，她潜心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与她比邻而居的，还有众多的武汉大学教师，包括经济学家杨端六一家、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登恪以及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杨弘远等人，一时间，陕西街上文风炽盛。

贰 武大教授的老街生活

走在陕西街，当记者问询当年武大教授在此居住的旧址时，几乎无人知晓。不过，湖北作家张在军的《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让人们得以管窥武大教授们在这条街上的日常。

从陕西街步行至文庙武大本部，只需要十来分钟。在“让庐”，住着苏雪林和杨端六、袁昌英夫妇，以及经济系韦从序教授一家。

在乐山，教职员生活艰苦，薪水打了七折，还得自己租房，有的还要养一大家子人。1940年，物价因战争飞涨，苏雪林无法接受房租大幅上涨，于是搬离了“让庐”，住在陕西街一处小山坡上的屋子里。在新家，她不忘苦中作乐，在屋子周围空地上，种起了蚕豆、莴笋、苋菜、萝卜、番茄……从前的荒地经苏雪林之手摇身



一变成了长势喜人的菜园。此外，苏雪林还在家里做起了泥水匠、瓦木匠的工作，除了上课，苏雪林把兴趣投入到了“体力活”中。

虽居陋室，苏雪林依然笔耕不辍，仅在1941年，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散文集《屠龙集》，一本是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此外，她还潜心研究屈赋。

两年后，苏雪林又搬回“让庐”，但生活依然艰苦，经常和臭虫“开战”。教授们平日里喝水也是个问题，虽然门口就有一口井，但得出钱向老百姓买水。

武大教授的生活日常在乐山时期武大化学系学生、著名漫画家



位于文庙大成殿左边的崇文阁，为当年的武大文学院旧址（乐山师范学院宣传部供图）



武大学生在工学院留影（乐山师范学院宣传部供图）



方成的漫画《教授日记》里大致被勾勒了出来：清早被孩子吵醒、趁早买菜、上课、快跑回家、生火煮饭、带孩子、偶尔找人谈谈天……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也还算闲适。

但这份宁静在 1939 年被降落在乐山的炮火打破了。8 月 19 日，日机第一次轰炸乐山，炸死武大师生员工 15 人，炸伤 20 多人，学校图书馆资料 1 000 余册被炸毁。“乐山经历了‘8·19 大轰炸’，房屋受损严重，几乎没有一间像样的好房子。”任志文说。

杨端六、袁昌英一家的院子就在“8·19 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 1942 年，空袭少了，他们一家才搬回城里，住进陕西街的“让庐”，与苏雪林成为邻居。

但并非所有教授都能挨过这 8 年。住在陕西街 22 号大院的工学院教授郭霖就在其中。在张在军眼中，郭霖是一个“抗战未捷身先死”的英雄。1937 年，郭霖拿出三分之一的积蓄支援抗日，“为满足抗战的需求，还设计压机、活性炭炉，由武大工厂较快地制造出钢盔、防毒面具等供前方抗日战士使用。”张在军写道，“他还为学生开战时课，如舰艇知识、航空工程等，提高大家的有关知识，以积极应对”。但正是因为长期劳累，生活清苦，郭霖积劳成疾，患上了黄疸肝炎和肝硬化病，1942 年在乐山病逝。

叁 弦歌不辍 薪火相传

如今，陕西街尽头，曾经“让庐”的旧址，一幢幢电梯公寓拔地而起。历史虽已远去，但抗战时武大师生不忘民族危难、坚守读书人风骨，肩负起潜心学术、抗日救国历史使命的精神，却传承与发扬至今。

张在军对陕西街的兴趣，来源于他读了杨端六之女杨静远所著的《让庐日记》和苏雪林的《浮生九四》。“一开始我没想过要写书，只是对让庐有点好奇。”张在军根据书中文字描述以及照片，找到了位于陕西街尽头的“让庐”的位置。当他右转时，发现了附近有一口井，一个老伯告诉他，那是一口很老的井，为了安全，前两年将其盖住，除此之外，老伯也不知道更多了。“附近的居民也没人



知道这里曾经居住过武大的教授。”而记者此行乐山，已完全找不到武大教授当年向老百姓买水的那口井了。

张在军初次造访陕西街时，“让庐”先前的门牌“陕西街 49 号”已变成“陕西街 163 号”，但 2010 年年底，当张在军再次去到陕西街时，那里已经被列入棚户区改造范围。

“乐山当年那条陕西街就成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文化符号，我总想为她写点什么。”张在军说。为了梳理珞珈文脉，近年来除了出版《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外，他还出版了《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等反映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往事的书籍，累计 100 多万字。

走出陕西街不远处，武大教授工作过的现乐山师范学院等地，也勾起人们对 8 年峥嵘岁月的回忆。珞珈路、武珈山……这些地名无一不与坐落在湖北武汉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紧密相连。任志文介绍，为了纪念武大西迁乐山这段历史，乐山师范学院用武大的元素重新命名了一些道路和建筑物。在校史馆内建有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展出武大乐山时期大量影像、学生课堂笔记、教学实习机床等珍贵实物。

在校园旷怡楼背后，伫立着一块国立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2013 年，在武汉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这块高 8 米、台基长宽 8 米的纪念碑揭幕，镌刻着武大乐山时期校舍分布以及碑记，铭记武汉大学西迁乐山血与火的 8 年。

2018 年 5 月，在《乐山师范学院校园文化建设 2018—2020 年行动方案》中提出，要在学校建设“武大西迁历史文化带”。根据《方案》显示，学校将逐步完成以“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国立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旷怡楼——松柏楼——梅庄”为主线的武大西迁历史文化带的建设。抗战时期，乐山同胞热情地接纳了颠沛流离中的武大师生。如今，为传承乐山精神，武大反哺，与乐山师范学院合作紧密。2009 年与乐山师范学院签署了《武汉大学支持乐山师范学院协议书》，2012 年正式纳入教育部“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2017 年两校又签署了对口支援第二轮合作协议。



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乐山师范学院官网图)

纪念碑背后的碑文道出了武汉大学与巴山蜀水的情谊：“蜀山苍苍，楚水茫茫。文脉贯通，共饮一江。嘉州八载，松柏傲霜。珞珈百年，桃李芬芳。劫波度尽，学道恒昌。乐山精神，地久天长。”

(原载《四川日报》2018年6月22日)



白首丹铅，自具光华

——记恩师宗福邦先生

于 亭

人生如朝夕，回想我初次拜见宗福邦先生的那个下午，只觉这二十六年时光，不舍昼夜，倏忽而去。我负笈珞珈之后，先是应其赐命，留校工作，随后又拜入他门下从学，侍侧日久，目睹先生渐渐老去，而犹殚精竭智，耕耘不辍；我也从未经人事的韶华学子，成了顶有二毛、沉郁忧患的中年人。

1991年，我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考虑到与女友的恋爱关系，颇思南下报考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询于班主任高路明老师。高老师想了想说，武大有个古籍所，所长是宗福邦先生，曾在古委会有一面之缘，并说愿意斗胆给宗先生奉函介绍。于是，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古籍所。

第一次见到宗先生，在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气，高老师寄出推荐信之后，命我赴汉先行拜谒，以全恭敬。至今还记得老理学院翼楼那间简陋破落的大房间，20世纪70年代的办公家具风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电扇如同虚设，一排排的木质书架上堆满了手抄的卡片，还有在斑驳陆离的枣色油漆桌案前忙碌碌碌的一群衣装朴素的老师。

当我说明来意，询问哪一位是宗福邦先生的时候，从书架后面侧出一张和气的脸，继而走出一位着蓝色中山装的微胖中年人，手上满是灰尘，拿着几张卡片，团面大耳，说话极慢，一字一声腔。那时候宗先生大约五十出头，还是满头黑发。我诧异地问起，这些书架上怎么都是卡片，这十几位老师都在翻检卡片是在做什么。



宗先生告诉我，他们在编一本大书，叫作《故训汇纂》，正在按计划花两年的时间，为辑录的六十万张资料卡片做校对和按字目分类的工作。当时我倒吸一口凉气，虽然在北大上学时曾参与过《全宋诗》的编写工作，已备知文献资料搜罗比列考稽翻检之苦，但是数十万张卡片手抄笔录和校核，对于当时的我，仍是无法想象的工程。

那天除了我的好奇相问和先生淡淡的客套之外，说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来到武大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武大古籍所的文献学科与“章黄之学”的渊源，而且在宗先生的设计开辟之下，以传统语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为特色，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的二十个所和中心中独树一帜。我也从此从本科时纯粹文献学的训练，转向了中国古典小学和古代音韵训诂之书的研究。研究生二年级开始，我也成为《故训汇纂》编写团队的年轻一员，在宗先生的带领下，从成千上万的卡片着手，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

宗先生为人不事声华，诚笃简朴。我先是从他问学，继而侍其门下，又与他共事，前后近二十六年，时时能够感受到他的沉静涵潜，洁身自好，自抱胸怀，不与世俛仰。与他相处既久，觉其“温而厉，威而不猛”，由陌生敬畏，逐渐亲近，不仅耳濡目染，终致事之如父。我自己感到，他身上保有老一代学人的可贵气质，这些气质，与我们当下“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赤膊攘臂以争先的时代特征相比，显得勇于自守，不务自显。其一生学行正心诚意，爱惜羽毛，朴素微实，不趋时阿世，务正学以闻。其实，他这个年岁的人，遭际坎坷，命途多舛，能保有这种品质的人寥寥可数。这也是我敬仰他，愿踵武其先后，追随其左右，效仿他的缘故。

尝读吕思勉先生《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谓“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



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心中感动不已。我从宗先生身上看到的，正是这种“严义利之辨”的品质。初与他相处，觉其迂阔，相知渐深，方知他数十年守正不移，宠辱不变之不易。

1991年我告别燕园，负笈珞珈，师从陈世铎先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紧密，那时候电话是稀罕设施，我经常未经请问，就冒昧叩门，到二位先生简朴逼仄的家中做不速之客，闲谈和请益问学，现在想想，真是唐突的举动。陈先生温润斯文，雅好艺文，人也好奇多思，明快敏捷，如同年长投缘的友人；宗先生则显得羞涩而威重，每次我不召而至，他都仓促更衣坐回到客厅里，如同上课，严阵以待的样子。言谈间不苟言笑，不稍懈颜色，也不附和我的戏谈谰言，有长者之风，其淡如水，而有山林之肃。但与他相处日久，慢慢感受到他内里是羞涩和平易可亲的，同时深深感受到老一辈学人“居处恭，执事敬”的儒者之风。

我个性跳脱，迅捷多言，宗先生不善言辞，说话慢慢吞吞，行事风格也周至烦琐，这种慢条斯理的节奏“折磨”了我很久。有一次，我读李新魁先生《汉语音韵学》，其中关于古代汉语介音问题的分析，与我在北大时师授有所不同，难以理解李新魁先生为什么把介音与声母联系起来谈，左思右想，不得要领。遂又贸然登门请问。宗先生为我从广州人的发音音感上介音更靠近声母讲起，层层条析李新魁先生做此处理的深层理据，其中说要言不烦，极为明晰透辟，令我疑窦涣然冰释，也窥见他学问之深厚颖锐和思维明快的一面。多年后，我投入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为我开设“清代古音学”一课，上课时他腋下夹着一大卷“课件”曳曳而至，讲授的时候，一张张海报一样的大白纸挂起来，将清儒古音之说一一件系而表解之，娓娓而谈，学问之富，理解之精，剖析之深，说解之透辟，令人心生敬畏，进而敬畏学问，以学问为清高绝美之道场。

我拜入他门下前后八年，其间一边参与管理和编写《古音汇纂》，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他一再告诫我，学问正途，如人之立身，要在诚谨笃实，刚忍有恒，开阖方正，务去浮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拖拖拉拉了多年，草创初成，恰当



他身体最不好的时候，他抱病审阅修改，拖着疲倦的病体与我论谈竟日，毫不容情、声色俱厉地在电话中大声训斥我从二手资料转引和不认真调查之处。我顺利获得学位之后，他还不忘在病中催促我修订书稿，争取早日出版，并且为促成此事劳心劳力，推荐联系。先生教示我的，远不止于授业解惑。追随他左右，我看到的，是学者的清守和自尊。我之立志做一名有操守的学者和教师，皆因敬爱他如父，愿效仿遵循他一生矻矻自守的道路。

宗先生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品质是专注。我之所以对此首先揭出，是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大相径庭。我是个趣味主义者，精力投入往往视乎爱好，而且追逐趣味，不免好高骛远，贪多务得。而宗先生不仅与我相反，为了自己沉重的责任放弃了几乎所有个人爱好和趣味，而且他较之一般做事专注的人，也显得特别持久坚韧。这个品质，他常常归之于个性，自嘲说自己笨拙，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只能自始至终选择一件事情努力做好它。他大学时颇好文学，然而毕业留校后的工作安排，却使他走上了审音考古的语言研究和爬梳考辨的道路。我曾经问他，这样的转向，他是否感到痛苦。他笑着说，那个年代，哪像你们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挑挑拣拣，嫌这嫌那的。让我做什么，我就应该想着做好它，而不是想喜欢还是不喜欢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认真投入了热情和精力，自然会爱上它，甚至终身以之。

宗先生描述自己大学时代操一口广州话，普通话也不会说，毕业留校却要他教汉语，又被安排去参加音韵学讲习班，从音标和发音学起，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罪，就这样进入音韵学和古代汉语的世界，慢慢爱上了这门旁人视为畏途的绝学。我追问他，是否心中痛苦，他说遗憾想必是有过，但是人生遭逢时变，不断面对挑战，很多事情不是因了遗憾和痛苦就可以回避的。他跟我谈到读书人不能读书、教师不能教书的那段日子，说那才是彷徨无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百无一用。那时他被遣送到沙洋农场，分配他养猪，形同劳教，他觉得他从此就是做农民了此一生了。然后笑着说起一天晚上母猪要生仔了，可是就他一个人守在猪圈里，计无所出，又急又慌，最后只能祭起思想法宝，迎着困难上，折腾了